

國際問題研究

2025 年第 4 期（总第 228 期） 双月刊 2025 年 7 月 15 日出版

■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 | | | |
|----|------------------|---------|
| 1 | 论全球南方精神与中国的实践作为 | 吴志成 刘培东 |
| 22 | 亚洲安全模式的文明根基与实践创新 | 刘 卿 |

■ 区域与国别

- | | | |
|----|----------------------|-----|
| 41 | 中东地区新格局的特点、成因及影响 | 牛新春 |
| 63 | 印度互联互通政策的升级：进展、动力与前景 | 吴 琳 |

■ 全球治理

- | | | |
|-----|-----------------------|---------|
| 88 | 全球深海竞争态势、影响及治理 | 李雪威 于宗耀 |
| 107 | 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及其对全球安全格局的影响 | 王高阳 刘辞源 |

Table of Contents

The Global South Spirit and China's Practices *WU Zhicheng & LIU Peidong*

Asian Security Model: Civilization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LIU Qing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Order in the Middle East: Dynamics and Impacts

NIU Xinchun

The Upgrading of India's Connectivity Policy: Progress, Motivations and Prospects

WU Lin

The Global Landscape of Deep-Sea Competition: Trends, Impacts, and Governance

LI Xuewei & YU Zongyao

The Rise of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and Their Impacts on Global Security

WANG Gaoyang & LIU Ciyuan

Abstracts

论全球南方精神与中国的实践作为

□ 吴志成 刘培东

〔提 要〕 全球南方精神蕴含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全球南方”国家推进现代化的精神指引。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凝练全球南方精神既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有可能性和现实性。践行全球南方精神是增强“全球南方”凝聚力和行动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与加快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事业的迫切需要。联合自强的历史记忆、群体性崛起的现实基础、团结协作的精神传承与中国发展的积极赋能有力促进了全球南方精神的生成发展。这一精神包含独立自主、平等互尊、发展振兴、公道正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等核心要义，其实质是以共同历史记忆为纽带、以联合自强为内核、以发展振兴为目标的规范性力量。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始终是践行全球南方精神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中国致力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凝聚“全球南方”合作共识和力量，拉紧“全球南方”利益融合纽带，提升“全球南方”话语权和代表性，打造“全球南方”务实合作的多边平台，筑牢“全球南方”和合共生的文明根基，以实际行动为践行全球南方精神贡献智慧和力量。

〔关 键 词〕 全球南方精神、百年大变局、“全球南方”发展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
刘培东，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1, D8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 (2025) 4 期 0001-21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1]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整体低迷，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全球南方”逐渐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参与者转变为重要塑造者。同时，伴随国际力量对比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横行，全球性问题此起彼伏，“全球南方”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全球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面对“全球南方”内部差异引发的矛盾冲突和外部势力的分化挑拨，总结和凝练全球南方精神，凝聚“全球南方”发展的共识与力量，对于拉紧“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纽带、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凝练全球南方精神正当其时

精神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和能动反映，也是推动社会实践向前发展的强大力量。全球南方精神蕴含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价值追求，是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振兴和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精神指引。在“全球南方”快速崛起但美西方国家仍占国际格局主要地位的新的动荡变革期，凝练全球南方精神既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有可能性与现实性。一方面，“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凝练全球南方精神具有扎实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3]，伟大精神是激励事业前行的强大动力。

（一）凝练全球南方精神的必要性

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深受认知、理念、价值取向等精神因素的影响。科学的认知、坚定的信念、积极的价值取向，能够激发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

[1] 习近平：《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 年 10 月 25 日，第 2 版。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97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98 页。

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转化。全球南方精神是塑造“全球南方”国际形象和道义声誉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唤醒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历史记忆与共享未来的情感联结，有利于增进彼此的信任和依赖关系，降低集体行动成本并增强协同发展效能。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凝练和践行全球南方精神是加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增强“全球南方”凝聚力和集体行动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必然选择。

第一，全球南方精神是“全球南方”国家增强集体凝聚力和行动力的价值纽带。共同认知是共同体存在的根本特征，也是增强集体行动有效性的重要来源。“任何社会制度都依赖共同性，并且实际上通过其所利用、组织和创造的共同性而得到规定。”^[1]“全球南方”是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合体，政治体制多样，发展阶段各异，文化传统不同，发展战略也不尽相同。这种成员数量规模大且异质性突出的超大群体，如果缺乏稳定的群体共识，利益协调的复杂性与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可能放大成员合作惰性，使群体合作陷于集体行动困境。尤其是随着大国博弈加剧，外部势力频繁介入低凝聚力群体，制造各种异己形象，通过冲突性话语叙事与“伪多边主义”拉拢分化变革力量。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基于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大肆渲染所谓“全球东方”“中国冲击”“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等话语陷阱，^[2]构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印太经济框架”等机制，企图弱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天然联系，造成“全球南方”的思想混乱与阵营分化。究其本质，这种无限放大多样性引发的“异己性”不是既定的，而是被制造出的”^[3]。在资本全球化制造的“差异政治”时代，面对“全球南方”内部多样性和差异性，凝练和践行全球南方精神，有助于

[1]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页。

[2] 杨洁勉、沈若豪：《“全球南方”的历史轨迹和时代使命》，《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5期，第35-40页。

[3]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把团结协作的历史基因外化为群体合作的自觉行为，为高度异质化群体架起通往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桥梁。

第二，全球南方精神是“全球南方”国家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撑。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列强通过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等系统性剥削机制，将南方国家纳入不公正不合理的依附性国际体系。二战后，经过艰难奋战取得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并未给“全球南方”带来公道正义，新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仍是束缚“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沉重枷锁。“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一种凭借强权来直接进行统治的制度，那么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以让予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1]一些西方国家重拾旧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控制、干涉、掠夺发展中国家，不断压制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发展空间，强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外部压力。具体来说，西方国家掌控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通过生产依附、技术依附、进口依附和出口控制等手段垄断高附加值环节，将南方国家锁定在中低端制造业。在南方国家内部，殖民时期的边界划分、经济结构和制度残留短期难以消除，国家间领土争端、族群冲突等问题深刻影响着南方国家的发展振兴。回望历史，旧殖民主义时期备受压迫的历史构成了全球南方精神觉醒的底层驱动，反抗殖民压迫的斗争精神也是“全球南方”国家从依附发展到快速崛起的精神动力。面对后殖民主义给“全球南方”发展带来的结构性束缚，践行全球南方精神是打破依附性发展的关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也需要以共同精神塑造集体身份、支撑集体行动。

第三，全球南方精神是“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的精神指引。全球化深入发展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历史机遇，“全球南方”国家也是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变革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与国际权力结构变动，全球性问

[1]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迟越、王红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6页。

题加剧、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大国战略博弈升级等呈现长期化态势，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性突出。但是，部分西方国家仍然抱持阵营对立的冷战思维，固守意识形态对抗和地缘政治竞争逻辑，拒绝赋予发展中国家相应的权力地位，现行治理体系的民主赤字、效能赤字、合法性赤字不断加重。当前，西方主导的多边机制的非中性局限愈加明显，全球治理的合法性遭受严重侵蚀。无论是机制合法性赤字导致不同领域的决策瘫痪，还是规则公平性缺失带来的隐性霸权与双重标准，或是理念包容性不足引发的公共产品私有化问题，多元行为体共同参与都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基础和关键。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和美国“退出主义”盛行的当下，借助全球南方精神凝聚南方国家治理共识，激发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全球治理变革方向，是构建包容性国际秩序的历史必然。伴随南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增强，只有将全球南方精神的核心要义内化为全球治理的价值遵循，才能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生态，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第四，全球南方精神是中国携手“全球南方”国家推进现代化事业的战略需要。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南方”追求发展振兴的集体诉求具有内在价值共鸣，中国与南方国家在发展融资、气候治理、脱贫减贫等多领域的务实合作也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面对美西方国家的遏制打压，如果依靠基于单纯物质利益交换但缺乏共同精神内核和价值观基础的传统合作模式，南南合作容易受到短期利益波动、外部势力干预或具体议题分歧的影响，陷入利益分散化、议题碎片化的现实困境，最终将制约“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发挥作用。无论是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还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都需要构建一种超越传统经济合作模式的共同价值规范，将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的紧密合作关系与互补优势升华为更具韧性、更可持续、更有感召力的集体身份认同。凝练和践行全球南方精神是“全球南方”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国际秩序的合作塑造者的鲜明体现，也是推动南南合作从实体性协作迈向理念性建构的重要行动，有助于推动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合

作从由发展需求和外压驱动的外部合作网络,转变为基于共享价值、共同身份和共同未来的命运共同体,确保在全球秩序变革进程中共同探索现代化新路径,共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新模式。

(二) 凝练全球南方精神的可能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精神生产是复杂因素交织叠加的现实结果。全球南方精神作为引领“全球南方”发展的重要标识,其生成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从依附发展到快速崛起的主体自觉。联合自强的历史基因、群体性崛起的现实基础、团结协作的精神传承与中国发展的积极赋能,为凝练全球南方精神作了实践上思想上的准备。

第一,联合自强的历史基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遭受过殖民压迫的深重灾难,在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发展振兴的斗争中,携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与推进南南合作的实践进程,塑造了“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集体记忆,成为凝练全球南方精神的历史基因。新航路开辟后,西方国家凭借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先发优势,建立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面对殖民者的掠夺和压迫,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奋起反抗,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以民族独立为旗帜的美洲独立战争,到19世纪中后期亚洲兴起的反殖民和反封建斗争,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席卷全球,共同抗争的经历铸就了南方国家同舟共济的友谊。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以联合自强为核心的南南合作成为塑造全球南方精神的重要实践场域。万隆会议首次表达了亚非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共同诉求,发出“不得干涉他国内政”“主权平等”“彻底铲除殖民主义”等号召,凝聚了“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集体共识。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兴起,开始改变由超级大国和西方国家垄断世界事务的局面,第三世界作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全球南方”的共同抗争历史和联合自强的实践探索,证明了广大发展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中国家可以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形成共同立场，厚植了“全球南方”追求平等和重视团结的集体记忆。

第二，群体性崛起的现实基础。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促进国际权力结构深刻调整，极大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共同目标和已有合作成果，强化了超越地理边界的利益共生纽带，为凝练全球南方精神奠定现实基础。伴随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全球南方”国家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市场、人力等要素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竞争，迅速走上产业结构升级、贸易规模增长、综合国力增强的发展“快车道”，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全球南方”转移。2008 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2023 年这一比重又提升了 7.6%，达到 58.9%。^[1] 预计 2026 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将达到发达经济体的 2 倍以上。^[2] 这种“南升北降”“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彰显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潜能，削弱了西方主导的“中心—边缘”体系的控制力，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注入强大动能。同时，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世界进入“颠覆性变革新阶段”，^[3] 跨境远程服务、数字平台经济、区块链技术等新技术持续消解阻碍国家间合作的地理边界，显著提升世界互联的速度与质量。“全球南方”国家充分利用数智技术带来的便利条件，围绕地区安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粮食安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的互利合作深入推进。从跨越太平洋的钱凯港项目不断拉近中国与拉美国家距离到连续举办四届中非文明对话大会深化民心相通，从中国同巴西等国发起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推动沙特和伊朗外交关系改善，日益加深的经济互嵌、政治互信、文明互鉴催生超越地域差异的共生

[1] 王栋、高丹：《“全球南方”崛起推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学习时报》2024 年 8 月 9 日，第 2 版。

[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 Critical Juncture amid Policy Shift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5, p.12.

[3] 克劳斯·施瓦布、尼古拉斯·戴维斯：《第四次工业革命——行动路线图：打造创新型社会》，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 页。

性利益纽带，成为深化“全球南方”团结协作、建构“全球南方”发展共同体的重要动能。

第三，团结协作的精神传承。在反帝反殖反霸和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创造性提出并积极践行“万隆精神”、“上海精神”、“中国—中亚精神”、“丝路精神”以及“不结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商共建共享”等原则，构建起引领南方国家团结自强的精神谱系，为凝练全球南方精神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在亚洲民族独立国家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矛盾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运而生，并从亚洲智慧上升为各方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开启了“全球南方”主动塑造国际规则的实践历程；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关键期，以“反帝、反殖、团结、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成为引领亚非拉国家超越现实差异、聚焦团结合作的精神旗帜；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广大发展中国家掀起以独立、自主、非集团为核心原则的不结盟运动，第三世界成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冷战结束以来，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全球南方”持续深化团结合作，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东盟、非盟、阿盟、南方共同市场等南南合作机制涌现发展，“上海精神”、“中国—中亚精神”和“东盟方式”等理念原则持续增进“全球南方”国家间的信任与理解。从以开放包容为核心的“东盟方式”引领开放的地区主义到“上海精神”塑造区域合作新模式，从“丝路精神”绘就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图景到“中国—中亚精神”谱写南南合作新篇章，这些经由南方国家提出的理念、精神和原则，传承了南方国家追求独立自主的历史基因，承载着南方国家共谋发展的集体记忆，彰显了南方国家联合自强的团结力量，为总结凝练全球南方精神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第四，中国发展的积极赋能。作为“全球南方”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中国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与中国外交的国际影响力，为凝练全球南方精神提供了现实条件与历史机遇。中国在物质、理念和实践上提供的关键支持，使得全球南方精神从南方国家的历史记忆与抽象理念，转变为拥有强大实力

支撑、明确理念蓝图和有效实践路径的现实可能。在物质层面，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世界体系边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商品消费国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增强了“全球南方”的整体实力。没有这种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倡导全球南方精神便难以摆脱边缘化和表面化的困境，甚至可能异化为道德呼吁或理论构想的“乌托邦愿景”。在理念层面，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图景，为全球南方精神注入体系化的理念内核与话语框架。这一理念呼应了“全球南方”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普遍价值追求，为凝聚“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与价值共识提供思想引领。在实践层面，中国提出并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一系列中国方案，搭建了覆盖广泛、形式多样、包容开放的合作平台与制度框架，使抽象的价值原则能够在具体合作项目中得以践行并形成共识，为全球南方精神的生成发展提供现实土壤和实践动力。这种共同参与的实践塑造力，不仅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往来、科技合作等有形层面的互联互通，也在深层次上推动了政策沟通、规则协同和理念交流，为“全球南方”国家深化团结协作、探索共同价值、形成集体认同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可以说，中国在物质、理念与实践上的系统性赋能，成为推动全球南方精神从抽象可能迈向具体现实的动能基础。

二、把握全球南方精神的核心要义

全球南方精神是南方国家在反殖反帝反霸运动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遵循，也是“全球南方”国家从国际体系的被动适应者转向主动塑造者的主体自觉。其实质是以共同历史记忆为纽带、以联合自强为内核、以发展振兴为目标的规范性力量，旨在捍卫“全球南方”国家的生存权、发展权与话语权，维护和扩大“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与发

展空间，成为引领“全球南方”发展方向的思想旗帜。基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历史境遇、现实国情与共同目标，全球南方精神包含独立自主、平等互尊、发展振兴、公道正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等核心要义。这一精神承载着对传统“中心—边缘”叙事的批判性反思，致力于重塑国家间合作理念与模式，推动构建普惠包容的“全球南方”发展共同体。

一是独立自主。“全球南方”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潮流中兴起，在反殖反帝反霸的斗争实践中发展壮大，“全球南方”发展史就是独立自主的共同奋斗史，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历史上，南方国家曾经长期受困于西方主导的依附性体系中。伴随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幽灵依然作祟，恃强凌弱、巧取豪夺的行径不时发生，经济胁迫、文化渗透等侵犯主权的行为多发，“全球南方”国家捍卫独立自主的任务依然严峻。在沉痛历史记忆与紧迫现实压力的双重影响下，坚定的主权意识和强烈的自主精神深深植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意识之中。独立自主决定国内事务与主权平等参与国际议程，二者相互关联统一，共同构成南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障。在国内维度，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将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点牢牢置于自身力量之上，摆脱对任何外部力量或他国意志的盲目依赖与被动服从，坚持发展蓝图必须依据本国国情绘制，发展路径必须由本国人民自主选择。但是，这并非意味着闭关自守或排斥国际合作，而是强调在开放合作中始终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导权和控制权。在对外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坚决反对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霸凌行径，不论国家大小、强弱、贫富，都有自主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都有公平享有全球化收益的权利。

二是平等互尊。这一理念根植于“全球南方”国家遭受殖民压迫的历史记忆，立足内部成员多样性和差异性现实，旨在超越传统国际关系中的等级秩序与强权逻辑，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是“全球南方”发展壮大的根本前提。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殖民者通过“文明与野蛮”叙事剥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和平等地位，使其在资本造就的等级结构中沦为被动从属的“落后”角色。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国家鼓吹历史终结、唯我独尊，将“华

盛顿共识”标榜为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标准。但是，西方发展模式在全球推广过程中遭遇严重不适应，不仅未能如期实现经济增长，还衍生出许多新的全球发展难题。历史证明，平等互尊既是“全球南方”实现内部整合与发展壮大的组织原则，也是变革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秩序的规范性主张。这一理念将主权平等、相互尊重视为群体合作的逻辑起点和行为准则，以求同存异超越具体分歧，以发展振兴凝聚合作共识，成为推动不同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国家团结协作的最大公约数。同时，平等互尊也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承诺与践行。坚持平等互尊，就是要坚持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使平等性复归国际关系，以尊重差异、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筑美美与共的共同体；就是要维护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反对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傲慢与制度偏见，在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实现共生共存；就是要承认并尊重不同国家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等方面的差异性，反对输出本国模式、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行径，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权利，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就是要将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原则落实到国际交往中，以共商共建共享促进全球发展利益的公平分配，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主动性、参与感和获得感。

三是发展振兴。发展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共同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应有状态，也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但是，在资本统摄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自主进程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势打断，被迫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商品倾销市场与资本输出地，经济结构在依附性发展体系中被严重扭曲，自主发展能力在武力侵略的显性掠夺与体系主导的隐性控制中遭到系统性剥夺，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也将南方国家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低端位置。历史地考察，从安东尼奥·葛兰西讨论意大利南北问题时提出带有反剥削意义的“南方”话语，到卡尔·奥格尔斯比讨论越南战争时提出“全球南方”概念，再到威利·勃兰特提出划分富裕北方与贫穷南方的“勃兰特线”，^[1] 贫穷、落

[1] 吴志成：《“全球南方”的兴起与中国的立场担当》，《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13-14页。

后、被剥削成为“全球南方”的“代名词”。近年来，伴随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与全球化负面效应凸显，资本无限增殖造就的“虚假繁荣”被日益拉大的发展鸿沟击碎，全球化发展势头受到严重削弱。一些国家构筑“小院高墙”、鼓噪供应链“去风险”、强推“对等贸易”，“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外部环境面临进一步恶化风险。“全球南方”为发展而起，因发展而兴。无论是挣脱遭受殖民剥削的历史枷锁，还是突破依附发展的现实困境，抑或是促进全球经济繁荣发展，发展振兴都是“全球南方”的使命责任。坚持发展振兴，就是将发展置于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加强不同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全球南方”国家在贫困治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以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强化南南合作的有效性与持久性；就是要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普惠性与包容性，积极落实二十国集团减债倡议，以更为有效的发展援助增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脆弱国家的经济造血功能，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就是要坚持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借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成果，培育和扩大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制约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瓶颈与难题。同时，要将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让清洁美丽成为“全球南方”现代化的明亮底色。

四是公道正义。这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尺，也是“全球南方”的价值遵循。坚持公道正义，既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对殖民遗产的系统性矫正，也是确保未来国际秩序免受霸权侵害的必然选择。在“全球南方”国家被迫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主权平等的基本准则被弱肉强食的等级秩序取代，共同发展的理想愿景被赢家通吃的残酷现实扼杀，相互尊重的基本准则被霸权干涉的单边行动消解，从主权和领土遭受武力侵害到被迫束缚在西方中心的规则体系，“全球南方”国家长期被困于资本主导的等级化结构，承受着非中性国际体系衍生的系统性暴力。特别是在单边霸凌行径频发的情况下，这种不公正不平等的历史创伤和现实压迫，更加塑造了“全球南方”国家对公道正义的本能追求。坚持公道正义，就是要坚持以国际权力结构变

动为依托，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着重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国际机制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更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的正当权益；就是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增强多边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反对“双重标准”和“退出主义”倾向，做到责任、权利、义务有机统一；就是要坚持正确义利观，统筹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以国际发展的公利消解个体主义阴霾，以合作共赢的普惠性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让世界各国人民在开放合作中共享发展机会与成果，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繁荣和发展，在确保长远利益的过程中满足短期利益诉求。同时，还要承认各国发展阶段、模式、战略等的差异性和多样化，理性看待别国的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以公平公正的良性竞争助力全球包容发展。

五是开放包容。这是“全球南方”的基本原则，源于“全球南方”国家相似的历史经历、发展诉求与秩序理念，旨在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封闭性与排他性逻辑，构建开放、包容、共赢的国际交往新模式。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通过界定和排斥“非我”来确立自身、凝聚共识、达成目标。这种冲突法则统摄下的交往模式以“中心—边缘”结构塑造全球等级秩序，以封闭排他的集团政治加剧全球紧张关系，削弱国家间合作共识。开放包容是南南合作发展壮大的理念基础，“全球南方”概念的生成也正是缘于对“主导—依附”结构的理论和实践反思。“全球南方”所倡导的开放，并非指被动融入由少数西方国家主导的非中性国际体系，而是强调反对意识形态偏见、集团政治图谋或任何形式的文明优越叙事，打破技术壁垒、知识垄断与发展鸿沟，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全球南方”所坚持的包容，并非指模糊立场或放弃原则的绝对妥协，而是在承认差异、尊重选择的前提下，共享发展资源、创新成果、增长机会，构建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发展共同体。坚持开放包容，就是要反对以各种名义搞封闭排他、恶性竞争，反对将国际合作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的倾向，更不能放任少数国家以“开放”为名控制规则标准，以“发展”为名构建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就

是要承认各国发展的差异性多样化,客观理性看待别国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共同发展;就是要承认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提升各国经济发展的包容性,通过各国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凝聚推动全球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就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通过针对性的议程设置充分考虑和照顾多样性发展诉求,以过程的参与性、成果的共享性增强合作的持久性。“全球南方”以开放包容为基本原则,不仅为“全球南方”追求公道正义、合作共赢目标提供方法论基础与价值支撑,也为共建美好世界贡献新的视角和方案。

六是合作共赢。这是“全球南方”国家超越依附性发展体系的共同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共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理性选择。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依赖性和脆弱性显著增强,国际合作本身也应该建立在追求共同利益、共同克服困难的基础上。但是,具备先发优势的西方国家长期垄断国际收益,“全球南方”国家的应得利益和合理诉求被有意忽略。这种单向获利的“独赢”模式,以独占取代共赢、以单一取代多元、以对抗取代合作,零和博弈、你输我赢、以邻为壑的冲突观念根深蒂固,违背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加剧了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浪潮,造成全球发展的“双输”“共输”局面。同时,此起彼伏的全球性问题凸显单一国家能力的有限性,人类生存发展的严峻挑战也要求以合作共赢新模式超越赢家通吃的私利模式,凝聚全球有效治理的共识力量。坚持合作共赢,就是要以“同球共济”精神为指引,建立以参与为前提、以发展为导向、以互利为引领的全球化新模式,寻找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契合点,增强经济全球化成果的共享性,让全球化成果真正惠及所有个体;就是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零和博弈思维,将共赢共享的合作理念落实到国家间交往的方方面面,以协商、协作、协同的多边方式回应多样化利益诉求,反对动辄采取单边制裁、长臂管辖、集团对抗等加剧冲突的行径,以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合作模式增强全球发展的稳定性;就是要打破以资本逐利为核心的国际合作旧逻辑,以共享发展的新模式构筑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以双赢、多赢和共赢的正

向激励引领国际合作，努力实现各方受益获利的有效治理，增强全球治理的公正性、合理性和持久性。^[1]

三、践行全球南方精神的中国实践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与“全球南方”国家拥有相近相似的历史记忆、现实发展挑战与全球治理诉求，始终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识，拉紧“全球南方”利益融合纽带，提升“全球南方”话语权和代表性，打造“全球南方”务实合作的多边平台，筑牢“全球南方”和合共生的文明根基，以实际行动为践行全球南方精神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一，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南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是全球南方精神最生动的实践诠释，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超越了单一线性论和依附发展论等西方现代化的既有逻辑，拓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为“全球南方”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启示。中国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现代化发展理念与经验，为推动“全球南方”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从发起国际民间减贫合作网络、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中非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等多边平台，到举办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全球发展倡议数字合作论坛、国际发展合作阳光论坛等重要多边活动，中国携手“全球南方”国家打造经验共享、规则共商、成果共享的多边平台，致力于促进“全球南方”发展振兴。截至2024年7月，中国推动成立的全球发展项目库总数超过1000个，已完成和正在实施的项目达500多个，为发展中国家举办1000多期能力建设项目，培训各类人才4万

[1] 刘培东、吴志成：《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普惠包容的中国视角》，《南开经济研究》2024年第5期，第11页。

多名。^[1]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成就，也为“全球南方”现代化提供关键助力。中国拥有完整产业体系、科技创新能力和超大规模市场，能够为“全球南方”发展提供重要的产能、技术与市场支撑。近年来，通过产能合作、技术援助、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等方式，中国持续深化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务实合作，积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与开放红利。截至2024年12月，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82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2]截至2024年9月，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3]从菌草、旱稻技术援助到青蒿素、鲁班工坊等品牌项目建设，从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到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创新培训基地，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坚实支撑。

第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全球南方”的合作共识和力量。理念共识是支撑国际合作的基本前提，也是引领合作实践的内在动因。当前，百年大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性风险挑战层出不穷，“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应答的时代命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高度依存的客观现实，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最大程度地凝聚了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创美好未来的信心与决心。这一理念秉持“同球共济”精神、开放包容胸襟和合作共赢愿景，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阶段的现实差异与崇尚冲突对立的主客二分思维，以共商共建共享纠偏资本建构的等级秩序，以命运与共、公平正义超越赢家通吃、零和博弈的传统合作模式，推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由相互依存的客观现

[1] 王毅：《在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第二届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2024年7月12日，<http://www.cidca.gov.cn/20240712/676e5706f7bf4ab9a63c3f078fa0f54e/c.html>。

[2] 《同球共济 砥柱中流——习近平主席引领2024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述评》，《人民日报》2024年12月31日，第1版。

[3] 王毅：《协力促发展 携手向未来——在“全球发展倡议支持全球南方—中国在行动”主题发布活动上的致辞》，外交部网站，2024年9月27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2409/t02040927_11498458.shtml。

实升华为应然层面的和谐共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也是引领“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重要旗帜。在中国的积极倡导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认同，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球南方”共同体稳步推进。从中非、中阿、中拉、亚太、中国—太平洋岛国、中国—东盟、上合组织、中国—中亚等多边命运共同体的全面展开，到中国与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古巴、南非、越南等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从同中亚五国双边命运共同体全覆盖，到同非洲大陆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不断走深走实，到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共同体持续深入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成为凝聚“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第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拉紧“全球南方”的利益融合纽带。共同利益是促成国家间合作的前提基础，也是实现“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重要保障。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目标与相近的秩序理念，构成全球南方精神生成的初始性因素。推动团结协作的历史记忆转化为持续发展的实践动能，必须超越简单朴素的情感纽带与价值宣示，以共同发展的现实利益纽带将理念认同的合作潜力外化为联合自强的实践创造力，推动构建“全球南方”利益共同体。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逆流的深度调整期，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恶性膨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多发，全球化前行的结构性压力持续累积。面对全球发展赤字的不断增加，面对“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共建“一带一路”始终把促增长求发展作为重要考量，持续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着力将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的互补性转化为“全球南方”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增强共建国家的经济造血功能，构建起全方位、复合型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搭建了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十余年来，中国携手“全球南方”国家，坚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致力于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全球南方”发展振兴

的繁荣之路，为筑牢“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物质基础。截至 2025 年 4 月，已有超过 150 个国家和 30 多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以战略对接实现共同发展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实践抓手。据统计，2013 年至 2022 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超过 19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达 6.4%，双向投资累计超过 3800 亿美元，^[2]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拉动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投融资方面，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多元化项目融资渠道，致力于增加低收入国家获得投资和金融支持的机会和能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利用自身基建优势，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从雅万高铁、中老铁路、蒙内铁路到孟加拉帕德玛大桥、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中国基建为加速相关国家工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必要支持。^[3]

第四，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升“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和代表性。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既是人类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充分发挥“全球南方”战略影响力的落脚点。^[4]冷战结束以来，伴随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凸显，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全球治理成为促进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关键。但是，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脱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权力格局，西方中心的滞后性和不适应性凸显，难以有效凝聚治理合力，不断加剧全球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全球治理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5]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

[1] 和音：《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人民日报》2025 年 4 月 3 日，第 3 版。

[2] 国务院办公厅：《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人民日报》2023 年 10 月 11 日，第 11 版。

[3] 吴志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发展治理》，《当代世界》2022 年第 4 期，第 65 页。

[4] 赵可金：《百年变局中的“全球南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 年第 23 期，第 9 页。

[5]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 2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61-262 页。

系改革和建设，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话语权、议程设置权和规则制定权，以主体平等性、过程开放性、合作互惠性增强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推动“全球南方”国家从全球治理体系的“边缘带”进入“中心区”。近年来，中国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促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的公平化合理化改革，提升“全球南方”在规则制定、资源分配、标准设定等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推动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增加了6%，中国、印度、巴西等南方国家跻身前十大份额持有国；^[1]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中国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框架内，中国践行“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携手77国集团推动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助益。^[2]

第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打造“全球南方”务实合作的多边平台。多边主义以普遍原则协调国家间关系，多边机制是促进国家间合作的实践抓手。当前，“小圈子”“小集团”等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义”大行其道，“全球南方”振兴之路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国际局势日益增强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携手同行才是“全球南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正确选择。“全球南方”协调内部成员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诉求，也需要秉持多边理念、维护多边原则、体现多边实效。中国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创建了金砖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平台，为推动南方国家联合自强贡献中国方案。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从开启金砖合作到推动金砖机制历史性扩员，从成立新开发银行到提出“金砖+”合作模式，从阐述金砖国家“四大伙伴关系”到推动建设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中国始终是推动合作机制稳步发展的重要引领者。截至2025年7月，扩

[1] 黄仁伟、朱杰进：《全球治理视域下金砖国家机制化建设》，《当代世界》2022年第7期，第30页。

[2] 孙吉胜：《“全球南方”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及前景》，《当代世界》2024年第7期，第38-41页。

员后金砖国家人口超过全球人口的 50%，以市场汇率换算的 GDP 占全球份额约 30%，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50%，^[1] 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典范和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塑造者。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中国作为发起国和创始成员国，提出并积极践行“上海精神”，全面推进安全、经贸、人文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发挥战略引领作用。上合组织成为当今世界覆盖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树立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共同发展的南方典范。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中国充分发挥股东国、捐款国和东道国作用，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筹资、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截至 2025 年 6 月，亚投行成员已覆盖 81% 的世界人口和 65% 的全球 GDP，批准 300 多个项目，批准融资总额超 600 亿美元，惠及 38 个亚洲域内外成员。^[2]

第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筑牢“全球南方”和合共生的文明根基。多样文明共存是“全球南方”的客观现实，文明交流互鉴也是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化解当今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既要依靠物质手段攻坚克难，也需要依靠精神力量诚意正心。建立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有助于减少隔阂、凝聚共识、共享经验，为深化双多边合作扩大共识基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文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既是促进世界文明百花园繁荣兴盛的重要路径，也是凝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共识的文明基底。近年来，中国将人文交流置于国家间交往的重要位置，通过教育、科技、文化等不同领域的沟通对话，为“全球南方”携手同行贡献中国智慧。从提出并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到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从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非文明对话大会、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欧文明论坛、文明古国论坛等文明交往活动，到牵头成立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中非发展知识网络和中非研究中心；从与“一带一路”共建

[1] 韩维正、王雯雯：《“把握发展机遇，合力克服挑战”》，《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 年 7 月 26 日，第 1 版。

[2] 和音：《树立国际多边合作新典范》，《人民日报》2025 年 6 月 28 日，第 3 版。

国家开展联合考古项目、丝绸之路国际剧院、“丝路之旅”，到同东盟、希腊等举办数十个大型文化和旅游年（节），中国以实际行动为加强“全球南方”文明交流对话搭建新平台、注入新动能。

四、结语

回望历史，“全球南方”从被动依附到群体性崛起的奋进历程，既是反帝反殖反霸的抗争奋斗史，也是全球南方精神的构筑传承史。立足当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与多边主义、开放主义激烈竞斗，逆全球化思潮与全球化支持力量相互较量，全球范围内扩大开放与闭关内顾两股力量持续拉锯，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凸显，“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任务更加艰巨。展望未来，“全球南方”崛起深刻影响国际秩序的潮流趋势不可逆转，但世界和平和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振兴，既拥有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也面临新的动荡变革带来的艰难挑战。

“全球南方”国家自觉的精神凝练与理念升华，促使“全球南方”国家在平等互尊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推进现代化进程，推动南南合作从物质层面的互利共赢升华到价值层面的命运与共，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坚实的价值基础。面对现代化发展的机遇与困境，“全球南方”国家要坚定弘扬和践行全球南方精神，共同发出和平发展之声、共同谋求发展振兴之路、共同夯实合作共赢之基，协力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事业，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全球南方”的贡献。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的重要成员，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以实际行动弘扬和践行全球南方精神，携手南方国家在实现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道路上互帮互助，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密切协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膺担当。

【责任编辑：肖莹莹】

亚洲安全模式的文明根基与实践创新

□ 刘 卿

〔提 要〕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孕育于亚洲多元文明共生性土壤，凝聚了亚洲国家对共同安全的价值追求，并在亚洲国家安全实践中不断得到淬炼和升华。在理论特色上，该模式以安危与共的共生安全观超越西方同盟体系的对抗性和排他性，以求同存异的包容性替代西方同质化诉求，以对话协商的实践理性突破强权政治逻辑，构建了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范式。亚洲安全模式不仅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东方方案”，更通过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文明包容性的制度创新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重构，突破零和博弈思维的认知局限，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安全理论的范式超越。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这一反映亚洲文明特性、回应亚洲需求的安全模式，将为推动国际社会凝心聚力应对安全挑战注入强劲的思想动力。未来，随着亚洲国家在安全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化，亚洲安全模式的理论内涵将不断丰富和完善，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关 键 词〕亚洲安全模式、和合文化、共生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刘卿，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3, 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5) 4 期 0022-19

亚洲，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洲，其安全与稳定对全球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亚洲地区整体性崛起同时，也面临着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复杂交织的局面。尤其是近年来，在乌克兰危机、中东乱局之下，亚洲国家深刻思考国际安全困境，反思如何汲取亚洲文明精髓，为世界安全与稳定注入正能量，用自己的稳定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在此背景下，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1]明确回答了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符合本地区历史文化特点的安全解决方案，即以安危与共为核心目标、以求同存异为基本原则、以对话协商为根本途径。这是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周边地区的具象，是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的最新体现。这一模式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基于亚洲深厚的和平文化底蕴，是二战后八十年亚洲安全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亚洲安全模式的提出，标志着亚洲安全主体性从理论自觉上升到理论自信，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亚洲智慧。

一、文明根基：亚洲多元文明智慧的融合

地区安全模式根植于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土壤，是地区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抽象出的一种框架。不同文明形态对安全的解读既有共性也有自身的特点。亚洲安全模式建立在亚洲深厚文明的基础上，是地区国家在长期实践中对安全理念不断浓缩、提炼和升华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安全模式，体现亚洲人民的价值观、道德准则、伦理思想。它既是一个长期实践过程，也是一种理想追求形态。概括地讲，亚洲安全模式的核心内涵包括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是中华和合文化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平文化集体智慧的结晶。

[1]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外交部网站，2025年4月19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504/t20250409_11590690.shtml。

（一）“天下观”的共同安全伦理

亚洲文明是由中华、印度、伊斯兰、东南亚等多种古老文明交织而成的璀璨图景。这些看似迥异的文明传统蕴含着“安危与共”共同体意识，成为亚洲安全模式最根本的伦理支撑。

中国儒家“天下观”，将安全视为共同体存续的基石。《论语》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伦理观，将安全责任扩展至超越血缘与国界的范畴。孟子“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的推己及人思想，奠定了安危与共的道德基础。《左传》提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意为亲近仁德、友善对待邻邦，是立国法宝。《礼记·礼运》强调“讲信修睦”，主张以诚信为基础，建立和睦关系。这些思想均体现了中国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友善态度与包容胸怀，在当代则转化为“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实践，强调与周边国家共建“安危共担”的责任共同体。

佛教“缘起论”强调万物相互依存，与儒家“天下观”共同强化了安全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意识。佛教教义核心概念之一是“慈悲”，即对所有众生的无私关怀和爱，强调众生平等、尊重生命、尊重他人。印度教“梵我同一”就是“小我”与“大我”命运相通。于微观而言，个体国家是“小我”，但于世界整体而言，是命运与共集体的“大我”。“梵我同一”融于今天的国际关系当中，强调无论哪个国家，都是“一”的存在，都有共同的命运，都应当将彼此的命运视作共同的存在。^[1]“梵我同一”的哲学思想是安危与共的理论源泉之一，更是中印文明互鉴、互融的体现，也从历史和思想上说明亚洲国家命运与共。

伊斯兰教强调“认主独一”的核心信仰，同时也倡导人类的整体性。《古兰经》中提到“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2]这一表述蕴含着人类同源、命运相连的思想，

[1] 戴永红、张琳、王俭平：《金砖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当代中国与世界》2025年第1期，第94页。

[2] 杨发明：《伊斯兰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力量》，人民政协网，2017年4月6日，<https://www.rmzxw.com.cn/c/2017-04-06/1463875.shtml>。

主张不同群体应在平等基础上相互理解、和睦共处，体现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圣训》倡导“兄弟情谊”，强调穆斯林之间应视彼此为兄弟，这种兄弟情谊并不仅限于信仰共同体内部，也延伸到对全人类的善意。伊斯兰“乌玛”理念（穆斯林共同体）主张摒弃对立、寻求合作，通过包容差异实现多元共存，也体现命运与共的思想。

东南亚深受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影响。这些宗教教义中普遍包含“众生平等”的理念，与本土“共生互助”理念相融合，为“命运与共”“安危与共”提供了思想基础。比如，印尼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理念Gotong Royong，意为“互助合作”“共同承担重担”，本质上是个体与社区命运绑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印尼前总统苏加诺常引用“多样性中之统一性”说明印尼社会现状，倡导“亚洲是一家”理念，^[1]呼应了中华文化中的“天下大同”理想，为区域集体认同注入思想源泉。

尽管亚洲各个文明对共同体的理念表述各异，但均贯穿着个体与集体相连、区域内各国相依的核心逻辑，强调个体与集体密不可分，破坏他者的安全最终将危及自身。这种植根于文化基因中的安危与共思想，是亚洲安全模式超越狭隘民族利己主义的底层逻辑。

（二）东方文明的多元包容特质

亚洲并非单一文明实体，而是世界上最具宗教、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区域之一。历史上，不同文明在此交汇、碰撞，也相互学习、融合。在处理这种极致的多样性方面，亚洲文明发展出了独特的包容智慧。

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是一部多元文化持续碰撞、交流、融合的宏大史诗。中华文明的“多元”不是简单的“多元并存”，而是“和而不同”的有机融合，既保留了各文化的独特性，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这种融合不是被迫的同化，而是基于“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追求“美美与共”。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为处理不同政治制度、发

[1] 张学继：《东亚被压迫民族之良师：孙中山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团结报》2023年11月16日，第5版。

展道路、文化传统国家间的关系提供了哲学指引。道家“阴阳论”的辩证思维，为处理个体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方法论启示。《道德经》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哲学命题，揭示了事物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这种阴阳交融的辩证思维，成为“求同存异”原则的源头活水，在安全领域体现为承认矛盾与寻求共识的动态平衡。

印度是世界上宗教最多元的国家之一，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长期共存、相互渗透，构成其显著的包容特征。印度教本身就是一种融合了多种信仰和哲学思想的宗教，包含了一神教、多神教等多重特征。印度教没有统一的教义或教会组织，而是以“梵”为最高本体，包容了无数神祇如湿婆、毗湿奴、梵天等。它允许不同教派甚至非印度教信仰的存在，这种“多神合一”的观念为多元信仰共处提供了空间。这种观念使得印度教能够接纳不同的信仰和修行方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印度历史上如阿育王、阿克巴大帝时期对不同宗教的宽容政策是其体现。

东南亚的宗教版图堪称“全球文明的活态博物馆”。万物有灵论作为东南亚最古老的信仰底色，为外来宗教提供了兼容土壤。印尼爪哇的“阿邦甘”信仰将伊斯兰教的“顺从真主”与本土祖先崇拜结合，信徒在清真寺祈祷后仍会向家族祖灵牌位献祭。菲律宾的天主教徒在圣诞节时，会用香蕉叶包裹礼物，浑身涂泥、披着香蕉叶参加庆典活动，保留部分本土农耕仪式。^[1]马来西亚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宪法明文保障宗教自由，佛教的卫塞节被列为全国性公共假日。中南半岛也具有多元性文化基因，印度教、佛教、伊斯兰、基督教在这里交汇融合。柬埔寨吴哥窟最初是印度教毗湿奴神庙，后被佛教徒改造为混合信仰场所，浮雕中既有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故事，也融入高棉人对自然神灵的崇拜。^[2]

亚洲本身就是一个由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组成的区域人文地理概念，区域内各国在处理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时，往往更倾

[1] 《菲律宾“泥人”披香蕉叶庆祝圣约翰节》，中国发展门户网，2014年6月25日，http://cn.chinagate.cn/news/2014-06/25/content_32768149.htm。

[2] 顾佳赞：《东西融通中的柬埔寨文明》，《光明日报》2019年5月13日，第14版。

向于寻求包容性的解决方案而非强制同化。“求同存异”是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这种“求同存异”的哲学使亚洲国家在面对分歧和争端时，更倾向于采取克制、务实的态度，寻求最大公约数，而非走向对抗与冲突升级。它为亚洲安全模式提供了处理复杂差异、构建合作框架的智慧钥匙。

（三）浸润千年的“和为贵”传统

中华和合文化为亚洲安全模式提供了核心哲学支撑。“和合”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强调世间万物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尚书》中多次出现“协和万邦”“神人以和”等。儒家文化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主张通过道德约束而非武力扩张实现秩序稳定。墨家强调“兼相爱”是“交相利”的基础。《礼记·中庸》提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提倡“中庸之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强调“和实生物”，在矛盾中寻找平衡点，避免极端化。这种文化基因为对话协商的安全理念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中道思想是《古兰经》和伊斯兰圣训的核心价值观，主张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中实现宗教功修与社会生活的平衡，反对极端主义。该思想强调天启与理性、前定与自由的辩证关系，倡导公平正义与和谐共处，形成独具特色的协商文化。^[1] 伊斯兰教的经典将对话协商确立为信仰实践与社会治理的核心原则，为多元共处提供了神圣性依据。《古兰经》第42章的名称就是《协商》，明确将“协商”列为信士的义务：“他们的事务，是由协商而决定的。”^[2] 在伊斯兰教中，协商不仅在政治领域受到鼓励，还体现在社会生活各层面。

东南亚地区深受多种文明影响，协调、协商成为该地区文化传统重要组成部分。印尼的建国五项原则“班查西拉”（Pancasila）明确将“协商一致”作为国家决策原则。^[3] 泰国文化中的“kreng jai”（顾及他人感受），强调沟通中的“非对抗性”，避免直接冲突、照顾对方颜面，通过委婉表达、

[1] 丁俊：《〈古兰经〉和圣训中的中道思想》，《中国宗教》2016年第8期，第38-40页。

[2] 马明良、马保兴：《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伊斯兰教中国化》，《中国穆斯林》2019年第1期，第56-58页。

[3] 宋秀琚：《潘查希拉在印度尼西亚对外交往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7月20日，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07/t20230720_5669271.shtml。

第三方调解达成共识。东南亚传统村落普遍存在的“协商共识”决策机制，强调通过充分讨论寻求共识，避免多数对少数的强制。宗族或部落纠纷往往通过“长老会议”如印尼的“adat”习俗法会议进行协商，由德高望重者主持，各方陈述诉求后寻求折中方案，而非依赖强制裁决。^[1]这种议事方式深深植根于尊重个体与社群平衡的文化土壤，强调内部和谐与共识，为处理区域间关系提供了智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亚洲文化“和”的思想在当代的生动转化。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首次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得到印方的赞同。1954年，中印、中缅分别发表联合声明，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确认这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印、中缅通过对话协商达成的原则共识，这一重要创新性理念不仅成为三个邻国的和平相处之道，还逐渐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1955年，万隆会议在拓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形成和平共处十项原则，成为发展中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指南，彰显了化解冲突的东方智慧。

二、核心内涵：亚洲安全模式的三大支柱

亚洲安全模式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为核心内涵，三大核心要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共同构建“目标—原则—方法”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

（一）安危与共：共生安全观的理论重构

“安危与共”强调共同安全这一核心目标。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世界各国同乘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大家共

[1] 《印尼游戏出海合规指南：法律框架、税务政策与运营挑战》，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网站，2025年6月3日，<https://www.gegia.cn/newsinfo/8400583.html>。

同生活在亚洲这个大家园里，利益交融、安危与共，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1]

“安危与共”强调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主张安全不可分割，强调邻国间的安全利益相互依存，反对以邻为壑、将一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之上。习近平指出：“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2]

亚洲各国地缘相近、利益相融，安全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安全威胁如领土争端、军事冲突，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公共卫生危机等，都具有跨国性和外溢性，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要实现自身安全，就不能漠视别国的合理安全关切；追求绝对安全而损害别国正当安全，只会导致自身的不安全。因此，亚洲各国必须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将自身安全与地区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携手应对各种安全挑战。

这一理念摒弃独享安全、阵营对抗的过时观念。习近平深刻指出：“事实再次证明，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平框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集团对抗只会加剧 21 世纪安全挑战。”^[3] 亚洲安全模式突破西方传统安全理论的零和博弈逻辑，努力将“对抗型安全”转向“共生型安全”，推动地区国家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二）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方法论创新

“求同存异”强调多元包容这一基本原则。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君

[1]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4 年 5 月 21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4-05/21/content_2684055.htm。

[2] 同上。

[3]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国政府网，2022 年 4 月 21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424.htm。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的命题，即“和而不同”思想，强调“和”不能否认或抹杀不同或差异，而必须承认、尊重和包容不同或差异。“求同”和“存异”是亚洲安全模式应有之义。亚洲地区文化、宗教、制度差异显著，安全利益和诉求多元。对此，各国要体谅包容，努力疏导化解，尽可能在分歧中寻找合作最大公约数，不断增加共识。习近平指出：“安全应该是包容的。应该把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恪守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1]

“求同存异”强调在尊重多样、多元的基础上求同，在共同安全议题上优先达成共识，推进合作，对暂未达成一致的问题保持沟通，避免激化矛盾；尊重各国国情、历史文化和治理模式的差异，认可各国对“安全”的定义和需求存在差异，不强行输出单一安全模式；不片面强调自身安全，而要从整体和全局出发，认识到安全的相互关联性质，要顾全大局、宽仁相待；通过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将多样性转化为合作的动力，实现共生安全。

“求同存异”是对万隆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强调要跨越意识形态藩篱与文化隔阂，排除外部势力干扰，抛开分歧、搁置争议，为了共同利益而加强合作。这一路径与西方“价值观同盟”形成鲜明对比。

（三）对话协商：分歧化解的模式转换

“对话协商”强调政治谈判这一根本途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历史和现实启迪世界，战争和制裁不是解决争端的根本之道，沟通协商、对话谈判才是化解矛盾的有效之策。坚持合作安全，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首要的是强调平等、尊重和理解。习近平深刻指出：“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

[1]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

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1]

“对话协商”强调通过外交途径而非对抗方式，寻找可以满足各方需求、让各方共同受益的解决方案；在对话中形成共识、解决问题，体现的是互惠互利的原则。习近平指出：“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2]各方要积极斡旋、推动政治对话和谈判，以对话建互信、解纷争、促安全。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困难和复杂因素。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将使安全问题更加恶化，强化安全困境。

亚洲国家经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入侵，类似历史遭遇使其在处理纠纷时更懂得和平谈判的可贵，反对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就双边而言，主张通过平等对话、友好协商，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就地区而言，主张通过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机制，加强战略沟通与安全互信，化解矛盾，管控分歧。

三、理论超越：对西方安全范式的反思与重构

西方安全理论可溯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强调通过军事同盟和权力平衡维护安全，以集体防御为核心，将军事威慑作为应对安全问题的主要手段。亚洲安全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与亚洲文明多样性所承载的治理理念差异密不可分，内在地兼顾儒家、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文化，安全观念远超西方“主权—霸权”简单的二元框架。亚洲安全模式承载亚洲和平文化基因，汲取了亚洲地区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殖民历史记忆引发的对干预主义的警惕，普遍珍视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同时，亚洲安全模式来源于亚洲安全

[1]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

[2]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实践创新，强调发展优先的实用理性，亚洲国家将经济发展视为安全根基，形成了“以发展促安全”的独特路径。

（一）解构零和博弈思维的认知局限

西方安全理论以现实主义为核心传统，其内涵植根于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认知，强调安全的竞争性、稀缺性与国家的自助逻辑。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的“自然状态”为这一传统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安全资源稀缺性与自助安全逻辑则是其核心假设与行为准则。由于国际社会不存在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国家处于“自然状态”中，彼此缺乏信任，生存与安全是最高目标。这种“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的预设，成为西方安全理论的核心前提。鉴此，现实主义安全观片面强调自助原则，忽视和怀疑规则的作用和善意的构建，主张增加军备或结盟，通过武力威胁和征服实现自身安全。

西方安全理论认为，由于安全资源有限，一国对安全资源的获取必然以另一国的损失为代价，这种稀缺性导致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思维指导下，西方建构集体安全模式，以同盟体系为核心，典型如北约，本质上以非此即彼的冷战思维划分阵营。这种模式将安全建立在“敌人界定”的基础上，通过预设外部威胁凝聚内部共识，天然具有排他性。例如，北约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安全空间，激化地区矛盾，印证了“集体安全”演变为“集体对抗”的悖论。其理论缺陷在于，过度强调自身安全，漠视他国安全，将安全简单等同于军事同盟，也忽视了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气候变化、传染病）的跨界性，难以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安全框架。

这种思维模式导致军事联盟的不断扩张，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美西方常以“基于规则的秩序”为旗号设置安全议程，却奉行明显的双重标准。例如，美国在亚太推动“四边机制”“奥库斯”等小圈子，名义上维护地区安全，实则服务于霸权扩张，甚至为盟友的军事挑衅背书，却对其他国家的正常国防建设贴上“威胁”标签。这种“规则由我定，安全为我用”的逻辑，本质上是将集体安全异化为地缘政治工具。

亚洲的安危与共安全观根植于命运共同体意识，认为各国安全相互依存，安全不可分割，打破了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将安全视为“非零和”。亚洲国家认识到，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安全，才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本途径。共同安全思想并不否认安全困境的存在，承认国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靠自己维护。但是，它肯定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强调合法的安全利益，反对无限度的安全关切，鼓励寻找安全利益的交集。^[1]安全不是某些国家的独享，而是地区各国的公共产品。只有秉持安危与共理念才能走出共同安全之道，而固守零和安全观只会陷入重复式的安全困境。

亚洲安全模式突破国家中心主义，将个人、社会、国家、区域视为安全整体。其优势在于以包容共生取代对抗分裂，追求普遍安全，摒弃阵营对立思维。当前，全球安全挑战呈现复合型特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亚洲安全模式蕴含的合作共赢理念，为破解西方理论困境、构建新型全球安全秩序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文明优越观

西方安全理论长期以西方文明为价值坐标，将西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安全观念视为“普世标准”，对非西方文明的安全诉求和传统文化存在系统性漠视。这种思维模式源于近代以来西方在全球霸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其理论建构往往以西方利益为出发点，将非西方世界视为需要被“规范”或“改造”的对象，而非平等的对话主体。主要有三种典型谬论：

一是文明冲突论，夸大文明差异与对立的理论框架。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冷战后的国际冲突将主要表现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尤其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此论将文明视为静态、封闭的实体，忽视文明多样性和跨文明交流的历史事实，隐含“西方文明优越论”，将西方视为“理性”“民主”代表，而将其他文明标签化为“非理性”“威胁性”。该论为西方干预非西方世界提供理论依据，

[1] 李开盛：《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特征与实践贡献》，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1月12日，https://www.cssn.cn/skwxsd/gjhy/202301/t20230112_5579450.shtml。

被认为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其错误在于静态切割文明联系，绝对化放大差异，窄化人类合作的可能性，激化不同文明群体间的对立。

二是民主和平论，在意识形态偏见下进行安全叙事。该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主张推广西方民主制度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将“民主”定义窄化为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忽视非西方社会对民主的多元理解，比如亚洲国家强调的协商民主、共识民主。此论以“民主”标准划分国家阵营，诋毁非西方民主的合法性，为西方“民主输出”、干涉主义张目。历史表明，西方民主国家对世界各地的战争从未停止。美国独立调查记者诺顿引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公布的数据指出，1789 年到 2022 年，美国在海外发动了 469 次军事干预行为，仅冷战结束后至今的短短 30 年间就发动了 251 次，数量远超冷战结束前 190 多年的总和。^[1] 该理论忽视了经济依赖、国际制度等对和平的影响，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工具。

三是历史终结论，实际上是西方制度霸权的理论宣言。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宣称，冷战结束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模式的普遍化。^[2] 此论完全否定非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和制度创新价值，将西方现代化模式绝对化、唯一化，无视发展中国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此论隐含“西方拯救世界”“非西方模仿跟随”的叙事，忽视文明发展多元性。进入 21 世纪以来，西方民粹主义崛起、政治极化加剧，以及中国等国家的发展成就，已从实践层面证明“历史终结论”破产。该理论本质上是西方霸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自我确证，而非客观的历史哲学分析。

亚洲安全模式的提出，标志着国际安全治理范式从西方中心论向多元共治的深刻转型。亚洲安全模式尊重文明多样性，强调求同存异，尊重亚洲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倡导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为超越西方中心

[1] 《2022 年 9 月 20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2 年 9 月 20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209/t20220920_10768479.shtml。

[2]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 页。

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这一安全模式认为多样性是安全的活力之源。其创新价值体现在文明包容性治理，尊重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拒绝制度输出，以文明对话替代意识形态对抗。上海合作组织堪称树立了文明包容互鉴的典范，它吸纳不同制度类型的国家共同反恐，将多样性转化为治理资源。这种“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使上合组织在 10 年内从 6 国扩员至 10 个正式成员国。

（三）摒弃强权政治与单边主义逻辑

西方安全理论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强国凭借其军事、经济和技术等实力优势，对弱国进行干涉和控制，以实现自身战略利益最大化。这种做法违背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损害了国际公平正义。

在强权政治逻辑下，西方国家通过胁迫手段来实现自身安全利益。在亚洲地区，尽管冷战已经结束多年，但强权政治的阴影仍未消散。美西方仍然习惯于通过经济制裁、军事威胁甚至不惜发动战争的手段，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国，谋求地缘政治利益。这种强权政治行为严重破坏了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恶化地区安全形势。比如，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介入和政治干预频繁引发动荡。

单边主义是一种典型的霸权主义行径，在国际事务中霸权国家鼓吹所谓的“例外论”，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他国核心利益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近年来，美国、以色列多次绕过联合国的授权，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肆意对他国进行轰炸，严重破坏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权威性。单边主义的行为不仅损害了亚洲国家的合法权益，也削弱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安全挑战的能力，使亚洲地区的安全环境恶化。

亚洲安全模式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强调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在对话谈判中寻求共识。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通过与直接当事国的友好协商，依据国际法妥善解决争议问题，同时积极与东盟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通过制定共同的规则制度，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这种以协商为特点的亚洲方式，与西方安全理论中的以实力求

和平形成鲜明对比。

亚洲安全模式的兴起，本质上是对西方霸权安全秩序的批评与超越。它以亚洲文明中的“和合”智慧为根基，以后殖民时代的主权意识为核心理念，通过建立多元对话平台的实践来证明：安全治理无需依赖强权主导，可通过平等协商、互利合作实现共生。尽管亚洲地区还面临外部干预与内部协调的挑战，其倡导的“共同安全”理念已成为全球安全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在单边主义抬头的今天，亚洲安全模式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东方方案”。

四、实践创新：亚洲安全治理的特色路径

亚洲安全治理以亚洲文明内在价值为动力源泉，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为核心要素，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和平共处之道。中国是亚洲安全模式的积极倡导者，也是积极践行者，在亚洲共同安全构建中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一）信任建设的亚洲方式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国家天然存在“安全焦虑”。克服这种焦虑，需要建立互信关系。当国家间存在基本信任时，双方会倾向于将对方的行动解读为“防御性”而非“攻击性”。反之，信任缺失会放大猜忌。国家间信任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结果。面对信任缺失、局部动荡的情况，亚洲国家着力加强信任文化和信任措施建设。

一是坚持坦诚对话交流，强化信任文化建设。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要“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1]，“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2]。亚洲国

[1] 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9年3月26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80351.htm。

[2] 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人民日报》2014年7月5日，第2版。

家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平台，既包括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东盟地区论坛等官方机制，也包括博鳌亚洲论坛、香山论坛、亚太圆桌会议等二轨对话。这些对话平台让各国可以分享彼此想法、感受，倾听和理解对方的诉求，建立心理共鸣和情感连接，培育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文化，厚植诚信底蕴，以信用文化涵养信任关系。比如，中国与中亚国家通过元首会晤机制、总理定期会晤、外长磋商、地方合作论坛等，建立多层次对话机制，明确方向、共享信息，在对话协商中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推动信任关系从政府间共识向制度性保障深化。

二是开展文明对话，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亚洲国家崇尚和合包容，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以开放平等的心态尊重不同文明，倡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观。2019年，中国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搭建文明互学互鉴、共同发展的平台，增强亚洲文化自信，促进亚洲协作互信。202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得到亚洲国家积极响应。自1995年首届“儒伊对话”以来，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机制化交流已有30年，为文明多元共生提供借鉴。此外，中国分别与东盟、中亚等举办了不同形式的人文交流年活动，促成域内民众双向流动，推进民心相通，培育社会信任。

三是弘扬多边主义精神，摒弃排他的伪多边主义。亚洲国家以尊重多样性为思想前提，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各国的利益平衡为基础，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比如，以亚洲国家为主体的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搞阵营对抗和排他性小圈子，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四是创新信任措施建设。亚信会议作为亚洲覆盖范围最广、成员数量最多的地区安全合作论坛，致力于通过制定和实施信任措施，增进亚洲国家之间的互信与合作。再比如，上合组织通过“和平使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等，深化军事领域的互信水平。

（二）危机预防的协商式管控

一是建立直接或间接的沟通渠道。针对棘手的热点问题，亚洲国家设立多样化沟通渠道，包括利用第三方平台，倾听和尊重各当事方的意见，消除在相关领域产生的误解、不信任和错误判断。比如，中菲在南海存在争议，但两国海洋对话机制没有停滞。东盟积极斡旋缅甸内部冲突，基于“东盟方式”发表“五点共识”，即“停止暴力，各方对话，任命特使，人道援助，特使访缅”，成为目前最受联合国和各主要国际行为体认可的外部方案。中国、东盟积极斡旋柬泰边境冲突，促成直接对话沟通，使局势迅速降温。中国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设立了外交、国防“2+2”机制，中越设立了外交、国防、公安“3+3”机制，通过年度对话，讨论彼此关切，从低敏感领域入手，循序渐进，探索建立解决问题的沟通机制和特殊安排。

二是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植根于“和实生物”的哲学智慧，中印为降低边界争议升级的风险，建立军长级对话机制，通过脱离接触、建立缓冲区、部署无人机监控替代前沿哨所等渐进措施，降低擦枪走火风险，成功管控1962年以来最严重的边境冲突。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建立澜湄合作机制，举办水资源部长级会议、成立澜湄水资源中心等，通过水资源数据共享预防生态争端，成为水资源治理的典范。

三是建立地区行为规则。建立各方均遵守的规则是防止冲突和争端升级的重要途径。中国与东盟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即开启“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并于2002年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各方承诺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争议解决前，各方承诺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分歧。为推进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1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并于2018年形成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迄今已完成三读，各方一致同意力争在2026年内完成磋商。此外，2016年9月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为中国和东盟国家海军

的船舶和航空器在南海意外相遇时的应急处置和操作规程提供了明确指引。

（三）以发展促安全的融合模式

西方个体主义安全观导致“安全私有化”，其政策后果就是军工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安全。而亚洲在集体主义精神指导下强调构建安全共同体，即安全并非个体或单一国家的孤立诉求，而是通过群体协作、责任共担形成的“连带安全”。亚洲安全模式强调整体安全观，坚持国家—社会—个人三位一体安全。比如，中国为了帮助金三角地区走出毒品经济的怪圈，积极推广替代种植，既保障边境安全，又改善民生，实现安全与发展的统一。

亚洲安全模式主张“生存权、发展权、安全权”的渐进保障，将安全扩展至经济、能源等领域，回应“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诉求。2016年，中国设立规模为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为联合国维和、反恐、能源、农业、基建等领域工作提供支持。中国多次在联合国相关会议上强调发展对和平的重要性，支持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作为帮助冲突地区实现和平稳定的重要举措。^[1]2023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11月份轮值主席，倡议举行了“共同发展促进持久和平”的公开辩论会。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实践中，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经济互利、合作共赢降低安全风险，体现了共同安全的智慧。东盟也将发展作为安全基础，通过共同发展来谋求共同安全，比如推动对话伙伴国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创建“10+3”、《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合作机制，推动对话伙伴在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讨论共同安全问题，将经济一体化与安全合作相结合。

亚洲安全模式强调综合安全观，提升非传统安全治理的重要性。基于佛教“依正不二”的生态观，亚洲国家强调生命与环境一体，倡导构建生态安全共同体。比如，中国倡建东盟+3（中国、日本和韩国）清洁能源圆桌对话，促进东盟与中日韩在清洁能源政策规划和技术发展领域的对话协作。中国还

[1] 《中国代表：应强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促进可持续和平》，中国政府网，2018年12月6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8-12/06/content_5346257.htm。

发起成立中国—东盟清洁能源中心，助力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建设光伏电站集群，推动绿色发展。这种将生态安全融入发展路径的模式，超越了西方气候政治的对抗逻辑。在澜湄合作机制下，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在水资源治理与环境保护领域深度协作，建立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共享水文数据，中国为下游国家提供汛期预报，共同应对湄公河季节性水位波动。同时，六国还联合开展“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设立自然保护区、打击非法捕捞、推广可持续农业技术。这种合作既尊重各国水资源主权，又通过技术共享、联合治理破解生态挑战，将地缘差异转化为协同治理的合力，成为区域生态合作的典范。

五、结语

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既是中华和合智慧的当代呈现，也是亚洲多元文明共同探索的结晶。这一模式通过共生安全观的理论重构、文明包容性的制度创新、协商导向型的治理实践，为人类共同安全开辟一条对话而非对抗、结伴而非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道路。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亚洲安全模式的全球价值日益凸显：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垄断，证明安全道路的多样性；弥合全球发展与安全鸿沟，通过共同发展促安全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方案；推动国际关系伦理的重塑，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替代强权即真理的霸权逻辑。亚洲安全模式为重构全球安全秩序提供思想资源，以发展权优先为治理序列，以文明包容性为价值基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追求目标，超越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现共同安全的“天下大同”。这一模式凝聚了亚洲国家的安全共识，超越了西方安全理论的局限，为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安全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思想参考。

【责任编辑：肖莹莹】

中东地区新格局的特点、成因及影响^{*}

□ 牛新春

〔提 要〕中东部分国家外交和解、经济改革的新潮流，巴以冲突、以伊博弈的老问题，特朗普中东政策的冲击波，共同推动中东地区新权力格局的形成。新格局中，伊朗因在战争中受挫而影响力下降，采取防御、收缩政策；以色列军事冒险有所斩获，野心膨胀，采取扩张主义政策；土耳其因叙利亚政权更迭而获益，采取谨慎的扩张政策；沙特因资金雄厚和外交中立而影响力凸显，采取求稳为主、稳中有进的对外政策。权力转移往往伴随着动荡，中东再次处在和平发展与战争冲突的十字路口。

〔关 键 词〕中东政治、中国对中东政策、沙特与伊朗关系、巴以冲突

〔作者简介〕牛新春，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中图分类号〕D837.02, D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5) 4 期 0041-22

2023 年 10 月加沙冲突爆发以来，持续外溢的武装冲突破坏了地区军事平衡；黎凡特地区的战乱与海湾地区的稳定形成鲜明对比，区域内经济失衡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一边倒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失衡与动荡。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新的中东权力格局正在形成。俄罗斯与美国的影响此消彼长，沙特、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之间的权

^{*} 本文为 202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交往史研究”（项目编号：23AZD0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力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各国相应调整对外政策，抢占有利战略位置。求稳和求变的两股潮流激烈博弈，中东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一、中东地区新格局的主要特点

中东地区权力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相关国家根据自身新的权力地位相应调整政策。在全球层面上，美国对中东的影响力扩大，俄罗斯地位被削弱。在地区层面上，沙特的影响力在和解潮中稳步扩大，以色列、土耳其则因加沙冲突和叙利亚变局而骤然崛起，伊朗因抵抗阵线受挫而失去发挥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渠道。以色列成为典型的改变现状的国家，对外政策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土耳其次之，相对谨慎，但也具有扩张主义的倾向和冲动；沙特则是求稳为主、稳中求进，中立主义的道路越走越宽。

（一）俄罗斯和美国对中东影响力此消彼长，美国变得更加专断

本轮加沙冲突前，大国在中东的影响呈现多极化态势，美国享有最强的综合影响力，欧盟、中国的经济影响突出，俄罗斯则主导个别国家的政局。加沙冲突爆发后，军事干预的重要性骤然上升，美国的地位因此更加突出。正如英国《经济学人》所言，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的形势证明，不管你喜不喜欢，美国仍然是中东唯一的霸权。^[1]特别是叙利亚政权更迭后，俄罗斯的军事影响断崖式下降，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更加凸显。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几近退出中东的权力游戏，仅保留了少量经济联系。2015年俄罗斯借美国战略收缩和叙利亚内战之机，强势重返中东，迅速在叙利亚建立主导地位。俄罗斯以叙利亚为支点，调动了同美国、以色列、土耳其、伊朗和沙特等国家的关系，再度回到中东政治舞台的中心。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无暇南顾，在中东已显疲态。2024年12月，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垮台后，俄罗斯失去了叙利亚这个支点，不仅无法在中东

[1] “Trump Should Try to End, Not Manage, the Middle East’s Oldest Conflicts,” The Economist, January 23, 2025,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5/01/23/trump-should-try-to-end-not-manage-the-middle-east-s-oldest-conflicts>.

长袖善舞，连自身在叙利亚的存在都是个问题。

美国虽然因一边倒支持以色列，政治和道义形象遭受沉重打击，但军事影响力反而在强化。美国目前在以色列部署了 2 套“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融入以色列防空体系，同以色列的军事、情报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在中东的驻军从日常的 3.5 万人增加到约 5 万人，包括 2 个航母战斗群、6 架 B-2 战略轰炸机。美国先后与巴林、阿联酋签署新的防务协议，同沙特的防务协议也在谈判进程中。2024 年 4 月以色列与伊朗互相袭击对方本土，约旦等阿拉伯国家默默参与以色列的防空行动。美国多年来一直鼓吹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构筑“中东防空联盟”，却没有实质进展，此次加沙冲突让美国的设想意外现雏形。

在中东权力格局中，美国、以色列等国家大体上是一个阵营，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及其抵抗阵线是另外一个更为松散的阵营。2024 年俄罗斯、伊朗阵营几乎全线受挫，美国的地区处境大为改善。美国中东研究所（MEI）研究员法迪·尼古拉斯·纳萨尔（Fadi Nicholas Nassar）指出，“这是华盛顿决策者多年来只敢在梦中想的事情，如今竟成为现实。”^[1]

随着实力地位增强，美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越来越专断，单边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之前，美英联手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现在美国独自空袭也门；之前，美法两国监督黎巴嫩停火进程，目前美国一家主导；之前，美国在加沙停火谈判中是配角，现在美国竟然抛开以色列单独同哈马斯谈判；之前，参与伊核问题谈判的是“伊核六方”，现在是美国一家。

（二）以色列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采取罕见的扩张主义政策

以色列的军事冒险主义、扩张主义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战略野心和信心持续膨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欢欣鼓舞地说，这是中东和平的黄金时代。^[2] 加沙冲突前，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政策是“管理”和“控制”，目前

[1] Fadi Nicholas Nassar, “Under Donald Trump, Washington Can Decisively Defeat Hezbollah,” December 17, 2024, <https://www.mei.edu/blog/four-years-tectonic-shifts-redrew-middle-east>.

[2] Lazar Berman, “Fate of Ceasefire-hostage Deal’s Second Phase in Balance as Netanyahu Heads to DC,” The Times of Israel, February 2,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fate-of-ceasefire-hostage-deals-second-phase-in-balance-as-netanyahu-heads-to-dc/>.

的政策是彻底消灭，且已经军事占领加沙 75% 以上的领土，甚至扬言要占领加沙全部领土。当年以色列对真主党采取“威慑”政策，现在以色列占领黎巴嫩南部五个战略要地，把真主党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决心在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武装。2002 年以来，以色列曾多次威胁打击伊朗核设施，但均未付诸行动。2025 年 6 月 13 日以色列悍然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12 天内对伊朗进行 1500 多架次的空中打击。^[1]不仅如此，以色列还威胁称，未来将随时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加沙冲突期间，叙利亚是唯一没有攻击以色列的抵抗阵线成员。然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垮台后，以色列在没有受到威胁和挑衅的情况下，对叙利亚空军、海军和导弹部队实施数百次空袭，摧毁了叙利亚至少 80% 的军事能力，占领了叙利亚 155 平方英里领土。一位美国学者观察，在以色列对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的轰炸行动之后，中东人民视以色列为最激进、最具破坏性的力量。^[2]

以色列不仅侵犯叙利亚主权、占领叙利亚领土，而且深度干涉叙利亚内政。2025 年 2 月，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不允许沙姆解放组织或叙利亚任何军队进入大马士革以南，我们要求叙利亚南部的库奈特拉省、德拉省和苏威达省全面非军事化。”^[3]内塔尼亚胡话音刚落，以色列战斗机就轰炸了大马士革以南 20 公里处的军事目标。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说：“作为平定叙利亚南部新政策的一部分，空军正在对叙利亚南部进行猛烈打击，其信息非常明确：我们不会允许叙利亚南部变成第二个黎巴嫩南部。”^[4]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约书亚·兰迪斯指出，“内塔尼亚胡正在玩一场非

[1] Emanuel Fabin, “The Stars Aligned: Why Israel Set Out for a War against Iran, and What It Achieved,” *The Times of Israel*, June 27,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the-stars-aligned-why-israel-set-out-for-a-war-against-iran-and-what-it-achieved/>.

[2] Maha Yahya, “The Fatal Flaw of the New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middle-east/fatal-flaw-new-middle-east-gaza-yahya>.

[3] Amberin Zaman, “Israel Exploits Divisions as Syria’s New Leaders Convene National Dialogue without Kurds,” *Al-Monitor*, February 24, 2025,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5/02/israel-exploits-divisions-syrias-new-leaders-convene-national-dialogue-without>.

[4] “Israeli Warplanes Strike South of Damascus,” *Reuters*, February 26,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low-airplanes-series-blasts-heard-syrian-capital-witnesses-say-2025-02-25/>.

常激进的游戏，目标是让叙利亚保持虚弱，这意味着继续制裁叙利亚，让美国军队留在叙利亚，防止库尔德人投降。”^[1] 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后，以色列与叙利亚、黎巴嫩之间的国境线发生了变化，以色列在加沙、约旦河西岸、叙利亚、黎巴嫩境内均有驻军。2025年3月，《经济学人》刊发了标题为《更多领土：以色列军队高风险的新战略》的文章。^[2]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高级主任阿夫纳·戈洛夫说，“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上，以色列首次迎来成为地区大国的契机。”^[3]

1973年阿以战争以来，“土地换和平”曾经是以色列的基本政策，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国家领土，换取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和解与和平。2024年以来，“土地换和平”的政策被彻底逆转，占领新领土以保护以色列的绝对安全成为以色列对外政策转折性的变化。这不仅让加沙冲突看不到结束的希望，巴以和谈的前景更加渺茫，而且会加剧叙利亚、黎巴嫩人民对以色列的仇恨，使阿以和解的道路变得更加崎岖。

（三）政治伊斯兰主义回潮，土耳其采取低调的扩张政策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着眼于2028年大选，充分利用中东格局变化的机遇，在中东采取一系列积极、主动和进取的外交政策，塑造自己全球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形象。从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到卡塔尔，土耳其与沙特竞争伊斯兰逊尼派的领导地位。土耳其支持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沙特则视穆斯林兄弟会为恐怖主义。加沙冲突亦成为双方竞争影响力的新边疆，土耳其主打政治号召力，沙特主要依靠经济影响力。2023年10月加沙冲突发生后，埃尔多安称赞哈马斯是“自由解放战士”。2024年5月，土耳其切断同以色列的一切贸易关系，成为世界上少数对以色列实施经济制裁的国家；

[1] Amberin Zaman, “Israel Exploits Divisions as Syria’s New Leaders Convene National Dialogue without Kurds.”

[2] “Israel’s Army Adopts a High-stakes New Strategy: More Terrain,” The Economist, March 3, 2025,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5/03/03/israels-army-adopts-a-high-stakes-new-strategy-more-terrain>.

[3] Dov Lieber, “Israelis See Chance to Remake Middle East in War’s Wak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6, 2024, https://www.wsj.com/world/middle-east/israel-regional-power-global-struggle-dfd9e694?mod=hp_lead_pos3.

同年8月，土耳其加入南非在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种族灭绝罪的行列。

在叙利亚，土耳其的优势更明显，政策也更具有进攻性。虽然埃尔多安所谓的“新土耳其”含义模糊不清，但是控制叙利亚是土耳其确定无疑的目标，只有这样土耳其才能成为中东通往欧洲的贸易、交通和能源枢纽。土耳其已经同叙利亚新政权建立紧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视叙利亚为政治伊斯兰扩张的新支点。政治伊斯兰曾借2010年“阿拉伯之春”达到巅峰，2015年后一度陷入低潮，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也随之起伏。沙姆解放组织在叙利亚执政后，土耳其、叙利亚、卡塔尔、阿富汗和索马里再度形成“政治伊斯兰网络”，约旦“伊斯兰行动阵线”在2024年9月选举中成为议会最大政党，时间似乎又倒流回2012年。据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指控，土耳其还伙同伊朗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经济支持。^[1]此事若属实，则是土耳其对外政策的新变化。历史上，土耳其同情、支持哈马斯，但是对真主党一直比较冷淡，主要原因是真主党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府。阿萨德政府垮台后，土耳其为了同以色列竞争，不排除改变对真主党态度的可能性。

但是，全球性大国和地区主要国家都对政治伊斯兰回潮高度警惕，对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政治伊斯兰属性也持怀疑态度，这让土耳其的立场非常孤立，也迫使土耳其不得不采取谨慎的态度。除积极介入叙利亚事务外，土耳其在地区其他国家的政治伊斯兰问题上态度低调。

（四）沙特游走于各方之间，采取稳中有进的对外政策

沙特外交越来越具有中立主义色彩，不仅在全球性大国间搞平衡，也游走于地区大国之间，积极斡旋各种热点问题。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中东问题专家哈桑·阿尔哈桑指出，人们通常认为，海湾国家同中国、俄罗斯走近是对冲美国的衰落或被美国抛弃的风险，但海湾国家实际上在充当全球性和地区性竞争对手之间的通道，担当一种新的桥梁角色。^[2]当其他国家视全球性

[1] “FM Sa’ar to US Senators: Turkey Cooperating with Iran to Smuggle Money to Hezbollah,” The Times of Israel, February 18,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fm-saar-to-us-senators-turkey-cooperating-with-iran-to-smuggle-money-to-hezbollah/>.

[2] Hasan Alhasan, “Bridging, Not Hedging: Arab Gulf States’ Ambitions in a Polarised World,” IISS, November 29, 2024, <https://www.iiss.org/online-analysis/online-analysis/2024/11/bridging-not-hedging-arab-gulf-states-ambitions-in-a-polarised-world/>.

大国竞争为风险时，海湾国家却视其为机遇。在全球层面上，俄罗斯是能源伙伴、中国是贸易伙伴、美国是安全伙伴，三者对沙特缺一不可。

在地区层面上，沙特同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三大国保持着非常复杂的平衡关系。对伊朗，沙特既要外交接触，也要战略遏制。接触可以让沙特成为以色列、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桥梁，避免双方恶斗伤及沙特。遏制可以削弱伊朗及其抵抗阵线的实力，消除胡塞武装、哈马斯、真主党对沙特利益的威胁。对以色列，沙特既要反对又要合作。同以色列合作是沙特获取美国更多安全支持的必要前提，也是遏制伊朗的必经之途。反对以色列则是沙特维护国内社会稳定，树立其阿拉伯世界领袖地位的需要。对土耳其，沙特既接触又警惕。土耳其支持政治伊斯兰，沙特非常担心。但是政治伊斯兰在叙利亚回潮已经是事实，沙特也只能在接触中施加影响力。

在地区热点问题上，沙特避免“选边站队”，但保持积极、建设性介入的姿态。2025年2月，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首次出访的国家就是沙特，他特别指出沙特和卡塔尔是叙利亚“大型项目”的潜在投资者。^[1]无独有偶，2025年3月黎巴嫩新当选总统首访目的地也是沙特，出访前他请求沙特激活2016年冻结的30亿美元援助。2025年2月，阿拉伯七国首脑齐聚利雅得讨论加沙战后重建计划，承诺未来三年为加沙筹措200亿美元资金。利用本国的石油财富积极参与战后重建成为沙特参与地区热点问题的重要手段。

发挥自身相对中立的优势，海湾国家成为冲突各方的调停人。仅2025年1月，海湾国家就成功斡旋五件事：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卡塔尔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的斡旋下达成换囚协议，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阿联酋的斡旋下达成换俘协议，黎巴嫩各派在沙特、美国、法国斡旋下选出新总统奥恩，也门胡塞武装在阿曼的斡旋下释放25名“银行领袖号”船员。同年2月，美国和俄罗斯在利雅得首次就乌克兰问题直接会谈。3月，美国与乌克兰会谈地点还在利雅得。

[1] “Warlord, Jihadi or Nation-builder?,” The Economist, February 3, 2025,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5/02/03/warlord-jihadi-or-nation-builder>.

在新格局中，沙特、土耳其对伊朗的担忧减弱，视以色列为最大的威胁。沙特同以色列改善关系的兴趣大大下降，同伊朗缓和关系的积极性持续上涨。土耳其和以色列两股扩张势力在叙利亚迎头相撞，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急剧恶化，短短两年内发生三次直接军事冲突，未来再次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大。

二、中东地区新格局的形成原因

2020 年以来，中东曾出现罕见的和解潮，构成和平发展的新潮流。然而，2023 年 10 月加沙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在加沙、约旦河西岸、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伊朗和也门等“七条战线”发动战争，动荡、冲突的旧势力卷土重来。和解潮没能阻止战火重燃，战争也未能中断和解潮，新旧两股潮流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正当中东处在新旧格局转换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多项离经叛道的政策，成为中东变局的新变量。这些共同构成中东地区新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加沙冲突外溢，抵抗阵线受打击，地区权力失衡

21 世纪以来，中东政治由四大权力板块构成：以伊朗为中心的抵抗阵线、受土耳其支持的政治伊斯兰主义、以沙特为首的保守逊尼派、同美国结盟的以色列。所谓中东权力结构变化就是这四大力量之间的实力对比和相互关系的变动。1948—1973 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是中东的主要矛盾，主战场在巴勒斯坦。1979—1988 年，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斗争是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主战场在伊朗和伊拉克。1990—2010 年，亲美和反美是中东的主要矛盾，主战场在伊拉克。2010 年“阿拉伯之春”引起中东四大矛盾同时爆发，即以色列与伊斯兰的矛盾、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政治伊斯兰与保守伊斯兰的矛盾和亲美与反美的矛盾，主战场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伊朗几乎是每对矛盾的主角。2020 年和解潮开始后，政治伊斯兰与保守伊斯兰、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均有所缓和。但是，伊朗与以色

列的矛盾却在不断恶化。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就开始着手组建抵抗阵线的网络，但 21 世纪前 20 年才是伊朗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黄金时期。抵抗阵线是伊朗“前沿防御”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朗支持阿拉伯国家境内的民兵组织，把战争和冲突推进到以色列家门口，形成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国防战略。21 世纪初美国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和塔利班政权，铲除了伊朗的两个地区竞争对手。“阿拉伯之春”导致多个国家内乱，伊朗大规模介入也门、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事务，号称能够控制五个国家的首都。一时间，如何平衡伊朗影响力成为域内外国家的棘手问题。2015 年美国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奥巴马劝沙特同伊朗共享中东权力。^[1]2019 年 9 月，沙特两处重要石油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美国认为是伊朗所为，却没有驰援沙特，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是对沙特的袭击，不是对美国的袭击”。^[2]

2023 年爆发的加沙冲突成为伊朗地区影响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抵抗阵线是一支反抗、改变现状的力量，近 10 年来采取进攻性策略，伊拉克民兵、真主党、胡塞武装的实力和影响都有所增长。加沙冲突爆发初期，抵抗阵线的影响力达到巅峰，哈马斯、真主党、伊拉克民兵、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都袭击过以色列本土，以色列在“七条战线”作战。但 2024 年 5 月战场形势发生逆转，抵抗阵线相继遭受重大军事挫折，伊朗更是受到双重打击。一是伊朗自身军事实力没有经受住实战考验。2024 年伊朗两次袭击以色列，以色列损失微乎其微。而以色列两轮袭击伊朗，伊朗防空系统、导弹生产能力和核研发机构受损严重。伊朗誓言报复以色列，迄今没有下文。二是抵抗阵线遭受毁灭性打击，且各成员间的互信受到破坏。当哈马斯、真主党和阿萨德政府面临重大危机时，伊朗似乎缺乏足够的意愿和能力保护他们。当伊朗准备

[1] Jeffre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The Atlantic, April 2015,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

[2] Dion Nissenbaum, “Response to Saudi Attack Poses Test for Trump’s Mideast Strateg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7, 2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response-to-saudi-attack-poses-test-for-trumps-mideast-strategy-11569595891>.

报复以色列时，抵抗阵线也无人响应。

叙利亚和真主党本是伊朗的左膀右臂，伊朗为此倾注过大量心血。据内塔尼亚胡指控，伊朗给叙利亚和真主党的援助分别达 300 亿和 200 亿美元。^[1]2024 年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黎巴嫩发生“小政变”，伊朗的地区战略框架几近崩溃。

在抵抗阵线的所有民兵组织中，真主党实力最强，同伊朗关系最密切。针对真主党在抵抗阵线中的作用，内塔尼亚胡说，真主党是轴心中的轴心，特别是 2020 年美军刺杀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更是成为抵抗阵线的灵魂人物。^[2]目前真主党遭受沉重打击，领导层几近团灭，武器 80% 被摧毁，作为一支抵抗力量被大大削弱。2024 年 11 月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后，以色列违反协议，几乎天天打击真主党，真主党从未还手，足见其抵抗的信心和实力都大不如前。真主党不仅是抵抗阵线链条上的关键一环，也曾是黎巴嫩国内最大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战场上的失败直接影响真主党在国内政坛的地位。2022 年黎巴嫩大选，真主党自己掌握 13 席，真主党联盟共获 41 席，虽然未在 128 个席位的议会中控制多数席位，但有足够票数阻挠议会通过决议。由于真主党否决，议会 12 次投票都未能选出总统。然而，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真主党接连在总统选举、总理任命和组阁中惨败，否决权荡然无存。特别是在议会批准总理任命的投票中，真主党以 9:84 票惨败，说明真主党的政治联盟已经分崩离析。在新内阁中，真主党联盟只获得 24 个部长职位中的 4 个，而之前则占据三分之一的部长职位，使其能够否决行政决策。真主党和阿迈勒作为什叶派最大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像以前能够任命 5 名什叶派部长，这意味着他们也不再是什叶派在政府中的唯一代表，真主党在什叶派内部的影响也削弱了。真主党影响力下降，直接导致伊朗在黎巴嫩的处境变得困难起来。

[1] Elliot Kaufman, “Benjamin Netanyahu: The Inside Story of Israel’s Victor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0, 2024, <https://www.wsj.com/opinion/netanyahu-the-inside-story-of-israels-comeback-victory-middle-east-change-dad847d8>.

[2] *Ibid.*

在以色列的压力下，真主党被迫把贝鲁特国际机场的控制权交给了黎巴嫩武装部队。2025 年 2 月，黎巴嫩宣布无限期停止进出伊朗的航班，因为以色列认为伊朗通过民航客机向真主党运送现金。根据黎巴嫩武装部队的消息，美国警告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空军将击落伊朗民航飞机。^[1] 同月，伊朗议长贾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克奇赴贝鲁特参加纳斯鲁拉葬礼，黎巴嫩政府特批一架次航班从德黑兰飞到贝鲁特。黎巴嫩政府从一名来自土耳其的男子手里缴获 250 万美元现金，据称这笔钱是伊朗送给真主党的。可见，黎巴嫩政府正在与以色列合作，切断伊朗与黎巴嫩之间的联系。

如果说真主党遭受重挫改变了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平衡，那么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则标志着整个中东地缘格局的重塑。叙利亚被称为中东的心脏，是唯一支持伊朗的主权国家，既是亲伊（朗）反以（色列）的堡垒，也是伊朗联通真主党不可或缺的桥梁和伙伴。2012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伊朗以叙利亚为基地培训战斗人员，制造、储存和运输武器，然后将武器和人员分配到中东各地。^[2] 在伊朗的号召下，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频繁出入于叙利亚，叙利亚成为抵抗阵线的集散地。然而，叙利亚政权更迭后，新政权外交大幅转向，宣布愿同除伊朗外的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叙利亚现政权接待过数十批外国代表团，包括美国代表团，但是没有伊朗代表到访。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出访沙特、土耳其、阿联酋，也绕过了伊朗。叙利亚现政权发布命令，禁止伊朗人前往叙利亚，伊朗驻叙利亚人员全部撤离，驻叙利亚使馆仍然关闭，伊朗与叙利亚之间航班停运。显然，叙利亚现政权视海湾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为主要合作伙伴。阿联酋政治分析人士马苏德·阿夫拉克断言：“叙利亚对伊朗关闭了大门。”^[3] 目前来看，伊朗完全失去了在叙

[1] “Lebanon Extends Iran Flight Ban after US Says Israel Might Shoot down Planes,” The Times of Israel, February 17,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ebanon-extends-iran-flight-ban-after-us-says-israel-might-shoot-down-planes/>.

[2] “Israeli Minister Says Iran Using Syria Facilities for Weapons Production,” Reuters, September 12,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israeli-minister-says-iran-using-syria-facilities-weapons-production-2022-09-12/>.

[3] Kian Sharifi, “Eyeing Regional Powers, Syria Is Freezing Iran Out,” Radio Free Europe, February 5, 2025, <https://www.rferl.org/a/syria-iran-saudi-rival-influence-russia/33303191.html>.

利亚的影响力。

受内外危机冲击，伊朗正在重新思考自己的国防外交政策。2024 年 10 月，以色列第二次袭击伊朗本土后，伊朗基本上置身于加沙冲突、叙利亚政权更迭、黎以停火、美国空袭也门等地区大事之外，似乎退出了中东权力游戏，集中精力防范美以打击其核设施，处于战略防御态势。伊朗或放弃抵抗阵线，改善同美国、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或干脆公开展核武器，同美国、以色列对抗到底；或维持现行政策不变，重建抵抗阵线网络，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

鉴于伊朗处在中东权力结构的中心位置，是每一对地区矛盾的主角，其影响力下降和政策转变，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美国、沙特、以色列和土耳其都因此而调整政策。

（二）和解潮没有被中断，海湾六国政局稳定，地区影响力稳步上升

战争与革命对权力格局的改变是剧烈、快速甚至是戏剧性的，往往能吸引广泛关注。经济发展、外交和解对权力格局的塑造则是平稳、缓慢甚至是润物细无声的，容易被忽略或轻视。近一年多来，加沙冲突引起全球关注，中东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外交和解却极少被提及。

和解潮是对“阿拉伯之春”的反弹，“阿拉伯之春”失败得越彻底，和解潮的反冲力就越强大、越持久。2010 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造成中东 10 年大动荡，不管是相关国家的“民主试验”还是地区大国的权力博弈，最终都黯然收场，其警示作用推动着和解潮向前发展。和解潮也是中东国家经济多元化改革的必要前提，经济改革的压力越大，成效越显著，和解潮的生命力就越长。2020 年和解潮开始以来，多数国家陆续退出地区冲突，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首要目标。十年前，阿联酋被称为“小斯巴达”，今天被称为“小新加坡”，形象地反映出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型。地区和平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相关国家深受其益。2024 年加沙冲突不断外溢，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深度卷入，海湾国家则保持中立，发展经济的目标岿然不动，形成所谓“两个中东”：一个是动荡的黎凡特地区，另一个是和平发展的海湾地区。

因为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和解潮没有被中断，反而在个别领域有新进展。加沙冲突期间，只有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出现明显倒退，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关系未受太大冲击。令人意外的是，2024 年沙特与伊朗关系还有新建树。沙特与伊朗在加沙问题上有分歧，沙特支持法塔赫，伊朗支持哈马斯，但是防止冲突扩大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加沙冲突爆发后，双方保持密切沟通，外交部长多次互访。2024 年 10 月，两国关系发展突然加速。沙特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伊朗、阿曼和俄罗斯在印度洋举行的联合军演。以色列打击伊朗本土前，沙特明确要求美国、以色列不得使用沙特领空。以色列袭击伊朗之后，沙特是中东第一个谴责以色列的国家，《纽约时报》以“中东巨变”为标题报道了此事。^[1]

海湾国家与以色列的政治关系因加沙冲突而恶化，但是经济和军事关系反而有所突破。加沙冲突期间，美国、以色列和沙特之间关于沙以建交的谈判没有中断。2024 年 4 月，伊朗袭击以色列，约旦等数个阿拉伯国家低调参与以色列的防空活动。2024 年前 9 个月，阿以贸易额不降反增，巴林与以色列的贸易额激增 10 倍，摩洛哥增长 53%，埃及 52%，阿联酋 4%。^[2]

海湾国家是和解潮最大的受益者，经济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中东全球事务委员会主席塔里克·尤赛夫认为，海湾国家与中东其他国家的差距在世纪之交开始扩大，“阿拉伯之春”后愈发凸显，已经成为中东格局的长期特征。^[3]若排除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近几年海湾国家的经济表现非常抢眼。海湾六国 2024 年 GDP 增长 1.8%，但非油经济行业增长 3.5%，说明经济多元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以沙特为例，2024 年沙特 GDP 增长 1.3%，其中非油经济增

[1] Maria Abi-Habib and Ismaeel Naar, “A Mideast Shift Is Underway, Without Israel,”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10/20/world/middleeast/israel-saudi-arabia-iran-gulf.html>.

[2] Mamdouh Al-Wali, “Israel Continues to Increase Trade with Arab and Muslim World,” Middle East Monitor, November 6, 2024,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241106-israel-continues-to-increase-trade-with-arab-and-muslim-world/>.

[3] Tarik M. Yousef, “Economic Divergence in the Arab World Accelerates,” January 13, 2025, https://mecouncil.org/blog_posts/mena-outlook-for-2025/.

长 4.3%，石油行业收缩 4.5%。^[1] 未来五年，海合会经济预计将以每年 4% 左右的速度增长，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多。2023 年，阿联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306.88 亿美元，年增长 35%。同年沙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256 亿美元，超过官方目标 16%。^[2]

当以色列、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受加沙冲突困扰之际，海湾国家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提升了影响力。目前，欧洲处于困难时期，美国受制于“美国优先”政策，对中东的传统援助难以为继，海湾国家的资金弥足珍贵。无论是加沙战后重建，还是叙利亚、黎巴嫩战后恢复，都离不开海湾资金。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估计，重建中东并提供足够的人道主义援助将耗资 3500 亿至 6500 亿美元。^[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仅重建加沙就需要至少 400 亿到 500 亿美元。^[4]

（三）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极具破坏性，成为新的不确定因素

特朗普上任伊始，就推出多项背离美国传统、令人错愕的中东政策，给地区局势投下了震撼弹。刺激而非约束以色列的军事冒险主义，是特朗普中东政策的主要特征，这将加剧地区局势动荡。

多年来，美国实施中东战略收缩，在中东“求稳怕乱”。从 1988 年巴以和平进程开始以来，美国虽然整体上支持以色列，同时也约束以色列右翼极端势力。拜登政府时期，尽管效果有限，美国还是向以色列不断施加压力，防范以色列在人道主义、战争规模、定居点修建等问题上的激进行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不仅不再约束以色列，反而火上浇油，比以色列走得更远，成为一股难以预测的破坏性力量。

[1] Jennifer Gnana, “Saudi Arabia Navigates Oil Cuts Amid Trump Pressure, Economic Strains,” Al-Monitor,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5/02/saudi-arabia-navigates-oil-cuts-amid-trump-pressure-economic-strains>.

[2] Staša Salacanian, “Saudi Arabia and the UAE Compete to be Hubs for Regional Business,” Stimson Center, January 24, 2025, <https://www.stimson.org/2025/saudi-arabia-and-the-uae-compete-to-be-hubs-for-regional-business/>.

[3] Maha Yahya, “The Fatal Flaw of the New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middle-east/fatal-flaw-new-middle-east-gaza-yahya>.

[4] *Ibid.*

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比历届美国政府更具进攻性和冒险性。同第一任期一样，特朗普仍然对伊朗实施威胁与谈判并行的两手策略，但两手都更具有挑衅色彩。谈判方面，美国主动积极，但要价更高。2024 年 11 月，特朗普刚当选就让马斯克同伊朗接触。2025 年 3 月，特朗普宣布，他已经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写信，希望同伊朗谈判。^[1] 同月，美国与伊朗代表实现 7 年以来的首次直接会面。但是白宫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提出，伊朗必须停止一切核活动，拆除全部核设施，这是特朗普的条件。^[2] 这些条件远高于 2015 年的核协议，当时伊朗保留了生产丰度 3.67% 浓缩铀的权利，也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核设施。

制裁方面，2025 年 2 月，特朗普再次推出“极限施压”政策，目标是把伊朗石油出口降到当时水平的 10%。^[3] 同时，为了增加军事威胁的可信度，美国对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的态度从反对、约束转向默许、鼓励甚至支持。一位以色列外交高层人士证实，美以在伊朗核问题上达成了“充分理解”，如果不能达成核协议，美国将支持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4] 3 月，以色列空军与美国空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色列的 F-15I、F-35I 战斗机与美国的 B-52 轰炸机共同出动，这是空袭伊朗核设施的配置，警告伊朗的意味非常明显。6 月 22 日特朗普突破历届美国政府对伊朗政策的底线，发动了对伊朗核设施的空中打击。

如果说特朗普的伊朗政策偏离了美国历届政府的轨道，那么特朗普的巴以政策则完全脱轨，几乎逆转了美国的传统政策。2025 年 2 月，特朗普在白

[1] “In Swift Reversal, Witkoff Says Any Nuclear Deal Must ‘Eliminate’ Iran’s Enrichment, Weaponization,” The Times of Israel, April 15,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n-swift-reversal-witkoff-says-any-nuclear-deal-must-eliminate-irans-enrichment/>.

[2] *Ibid.*

[3] Grant Smith and Kasia Klimasinska, “US Aims to Cut Iranian Oil Flows by More Than 90%, Bessent Says,” Bloomberg, February 14, 202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5-02-14/us-aims-to-cut-iranian-oil-flows-by-more-than-90-bessent-says?sref=kvKt2bF5>.

[4] Ben Caspit, “Trump, Netanyahu Have ‘Full Understanding’ on Iran as Israel Mulls Strikes on Nuclear Sites,” Al-Monitor, February 14, 2025,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5/02/trump-netanyahu-have-full-understanding-iran-israel-mulls-strikes-nuclear-sites>.

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要“接管”“清空”“拥有”加沙。根据特朗普的要求，加沙 230 万巴勒斯坦人都要移民国外，这同拜登政府“加沙人口不能减少、领土面积不能缩小”的政策背道而驰，甚至比以色列极右翼的政策更极端。上任仅仅三个月，特朗普已经提出“清空加沙”等可怕的设想。这或许是一种谈判策略，所谓“为哈马斯打开地狱之门”只是恐吓。2025 年 2 月，特朗普提出“接管加沙”计划，威胁取消对埃及与约旦的援助，向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释放所有人质。然而，对埃及、约旦和哈马斯的威胁均未收到预期效果，特朗普妥协了，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想到埃及、约旦会这样表态，我不会强推这个计划，只是坐下来提个建议。”^[1]

这或许是一种政治表演，只为满足特朗普个人的虚荣心。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上任后实际做的是“让美国看起来伟大”或“让特朗普看起来伟大”，这比让美国、特朗普再次伟大更容易。《纽约时报》评论员说，特朗普上任首月制造的人设是：“这是特朗普的国家，这是特朗普的政府，他的意志就是国家意志，他想做什么国家就做什么。”^[2]即便这仅仅是谈判策略或政治表演，但现实后果是非常真实而严重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说，特朗普的提议是美国总统提出过的最愚蠢、最危险的中东和平倡议；特朗普团队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他们对中东的观点都源自以色列极右翼和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的过滤镜。^[3]“清空加沙”言论鼓励了以色列右翼政党，破坏了加沙停火谈判，让沙特与以色列建交变得更不可能。驱赶巴勒斯坦人多年来一直是以色列政治中的禁忌。1993 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以色列把国内主张驱赶巴勒斯坦人的两个政党列为恐怖组织，1997 年美国也跟进。近年来随着以色列右翼崛起，这种思潮越来越向主流方

[1] Michael D. Shear, “With No Buy-in From Egypt or Jordan, Trump Appears to Back Away From His Gaza Plan,”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21/us/politics/trump-gaza-egypt-jordan.html>.

[2] Ezra Klein, “Don’t Believe Him,”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02/opinion/ezra-klein-podcast-trump-column-read.html>.

[3] Thomas L. Fridman, “What’s Most Frightening About Trump’s Gaza Raving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1,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11/opinion/trump-israel-gaza.html>.

向迈进。特朗普提出“清空加沙”后，以色列没有一位犹太政党领袖反驳。以色列最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戈维尔说，特朗普的计划比他走得更远，“我主张自愿移民，他要把加沙所有巴勒斯坦人移走”。^[1]在美国的鼓励下，以色列军事占领加沙领土、兼并约旦河西岸领土、军事打击伊朗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将给中东和平带来巨大风险。

三、中东地区新格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格局转变同时蕴含着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可能导致新冲突，伊朗的收缩性政策会形成权力真空，引发更大、更持久的动荡与冲突。另一方面，外交和解、经济改革的潮流也具有顽强生命力，中东的经济机遇在不断扩大。在中东 22 个国家中，和平发展与战争冲突比肩而立、相互竞争，机遇与挑战同时上升。

（一）中东蕴含的经济机遇全球瞩目，成为新的机遇之地

海湾国家凭借资金充裕、社会稳定、经济活跃和政治中立的优势，在全球贸易、交通和金融中心的建设方面已经小有成就，近年来在全球高科技市场也占有了一席之地。据《华尔街日报》消息，全球两大芯片巨头“台积电”和“三星电子”计划在阿联酋兴建超级芯片工厂，由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出资，金额高达 1000 亿美元，该项目被称为“中东和西方之间地缘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新模式”。^[2]普华永道估计，至 2030 年人工智能将为阿联酋国内生产总值贡献 960 亿美元，为沙特贡献 1352 亿美元，巴林、科威特、阿曼和卡塔尔的人工智能产值将达到 459 亿美元。^[3]海湾将成为继美国、欧洲

[1] Anat Peled, “Trump’s Vision for Gaza Revives an Idea Once Reviled in Israe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6, 2025, https://www.wsj.com/world/middle-east/trumps-vision-for-gaza-revives-an-idea-once-reviled-in-israel-9080c6d9?mod=article_inline.

[2] Asa Fitch, Alexander Ward and Jiyoung Sohn, “Chip Giants TSMC and Samsung Discuss Building Middle Eastern Megafactor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2, 2024, <https://www.wsj.com/tech/ai/chip-giants-tsmc-and-samsung-discuss-building-middle-eastern-megafactories-65adc854>.

[3] “Which Regions Will Gain the Most from AI?,” PwC, <https://www.pwc.com/ml/en/publications/potential-impact-artificial-intelligence-middle-east.html>.

和东亚之后全球第四大芯片生产中心，辐射非洲、中亚地区，国际人工智能格局因此将被改写。

海湾国家的经济繁荣提升了中东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传统上，中东被域外大国视为麻烦和问题，现在还代表着机遇和利润。据估计，仅阿拉伯国家的资金储备就高达 15 万亿美元，这必然成为各国争抢的大蛋糕。^[1]2017 年，特朗普第一任期选择沙特为首次外访目的地，号称达成 1100 亿美元的军售协议。沙特主权财富基金负责人亚西尔·鲁梅扬表示，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已经将 40% 的投资放在了美国，未来希望投资更多。^[2]2025 年 5 月特朗普访问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海湾三国，三国同美国签署 1.4 万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协议，承诺未来向美国投资 3.6 万亿美元。

同时，中东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攀升。政治上，2022 年首届中阿峰会在沙特举行；2023 年沙特和阿联酋受邀加入金砖国家组织；2024 年中阿双方决定 2026 年将在北京召开第二届中阿峰会。经济上，中阿双向投资大幅上升。2023 年，在中国对外绿地投资的五大目的地中，阿拉伯国家占据三席：沙特（168 亿美元）、埃及（83 亿美元）和摩洛哥（98 亿美元）。2023 年中国在全球的绿地投资总规模为 1680 亿美元，中东占比近 24%，表明中国对中东的投资出现井喷式增长。2022 年阿拉伯国家对华投资为 10.5 亿美元，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1.3%；2024 年前 10 个月对华投资额达到 90 亿美元，占比升至 16% 左右。^[3]

（二）伊核问题的风险持续升高，不确定性大增

2025 年 6 月 24 日以色列、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后，三方都宣布自己是获胜者、都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美以的战争目标是摧毁伊朗的核能

[1] 肖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投资及展望》，《中国投资》2025 年第 1 期，第 35 页。

[2] Jared Szuba, "At Pentagon, Saudi Defense Chief Pushes for Stronger US Ties, Talks Security vis-a-vis Iran," Al-Monitor, February 24, 2025,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5/02/pentagon-saudi-defense-chief-pushes-stronger-us-ties-talks-security-vis-vis-iran>.

[3] Niu Xinchun, "Endogenous Motivation," China Daily, February 26, 2025,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2502/26/WS67be5f29a310c240449d73fa.html>.

力，相关各方对伊朗核能力受损的程度颇有争议，但伊朗仍然保存了一定的核能力是事实。显然，军事打击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只有外交途径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停火第一天起，美国与伊朗就在探讨恢复核谈判的可能性。然而，核谈判的路更难走了，风险也更大了。

此前，美国与伊朗已经进行五轮核谈判，目前能否重回谈判桌是个大问题。伊朗不愿意无条件重回谈判桌，要求美以必须承诺放弃军事手段，且先采取表达诚意的举措。美国则认为伊朗核能力受损，距离核门槛更远了，时间在美国一边。即便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美国对谈判的要价也大大提高了。军事冲突前，对于伊朗能否在本土从事浓缩铀活动，美国态度含糊、矛盾，显示存在妥协让步的空间。目前，美国态度非常明确，伊朗不能在本土从事任何核活动。若未来一段时期，核谈判谈不起来，或者谈判破裂了，军事冲突再起的可能性非常大。

伊朗可能重新恢复浓缩铀生产。据估计，伊朗具备恢复核项目的知识、技术、材料和部分设备。^[1]若伊朗确信没有办法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重新恢复核项目的可能性较大。以色列威胁，一旦伊朗恢复核项目，一定会再次进行军事打击。更危险的情形是，伊朗国内要求“拥核”的声音越来越大。伊朗过去一直没有做出“拥核”决定，视核问题为与美国交易的牌，超越民用核能的水平，但是不迈过核门槛。2024年以色列与伊朗两次打击对方本土后，伊朗开始认真考虑“拥核”的选项。未来，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博弈将更加激烈，存在四种可能性：一是伊朗放弃核能力，美欧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二是伊朗继续发展核能力，遭受美以不间断的军事打击；三是伊朗制造出核武器，美以被迫接受，核俱乐部多了一名新成员；四是伊朗制造出核武器，美欧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未来一段时间内，伊朗将决定核与非核的成本收益，国际社会相关国家也会密切关注事态，做出自己的选择。正如一位政治评论家

[1] Agnes Chang et al., “12 Days of Attacks Later, Could Iran Make an Atomic Bomb?,”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7, 2025,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5/06/27/world/middleeast/iran-us-nuclear-weapons.html>.

所说：“既不战又不和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要么是战争要么是和平。”^[1]

（三）叙利亚再次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政治转型日趋复杂

伊朗、俄罗斯影响力退出叙利亚，美国撤出部分驻军，以色列采取扩张主义政策，土耳其成为对叙利亚影响最大的国家，大国在叙利亚的权力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大国对叙利亚内政的干预没有消失，而是在新权力格局下激烈展开。目前，美国军队驻扎在叙利亚东北部，土耳其军队在北部，以色列军队在南部，俄罗斯军队在西部。叙利亚现政权强烈呼吁，希望与各方和平相处。但是各方在叙利亚的利益是矛盾的，和平相处很难实现。土耳其支持沙姆解放组织和叙利亚国民军，美国保护库尔德人，约旦对叙利亚的“南方作战室”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以色列试图加强与叙利亚德鲁兹人的关系。以色列想要一个虚弱、分裂的叙利亚，一个没有伊朗影响的叙利亚；沙特想要一个稳定的叙利亚，但不想要政治伊斯兰主义；土耳其想要一个政治伊斯兰主义的、集中统一的叙利亚，但不要库尔德武装；伊朗想要一个阿拉维人拥有独立武装的叙利亚。2025 年 4 月初，土耳其根据同叙利亚政府的军事合作协议，在叙利亚境内考察未来的空军基地，以色列先发制人地摧毁了全部三个空军基地，以色列与土耳其在叙利亚的竞争已经抵达军事冲突的边缘。

2025 年 2 月，叙利亚召开首届“全国对话会议”，在土耳其的压力下，库尔德人被排除在协商会议之外；在以色列的阻挠下，德鲁兹人也没有参加协商会议。本来叙利亚政治过渡就非常困难，沙姆解放组织内部有激进派与温和派之争，叙利亚国内存在逊尼派、阿拉维派、库尔德人、德鲁兹人之争。多个国家的军事介入让过渡进程更加复杂，叙利亚重返动荡甚至内战的可能性增大。3 月，叙利亚军队和阿拉维人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大约 1000 多人死亡，这是政权更迭以来首次大规模族群冲突，给和平过渡投下了沉重的阴影。

（四）黎巴嫩可能因外部干预陷入内战边缘

30 多年来，黎巴嫩受叙利亚和真主党的双重控制，目前叙利亚阿萨德政

[1] “The Era of Neither War nor Peace is Over, It is a Period of Either War or Peace,” Nameh News, November 18, 2024, <https://tinyurl.com/4tks798v>.

府垮台，真主党实力削弱，黎巴嫩国内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被称为“小政变”。真主党虽然遭受沉重打击，但仍然是黎巴嫩最强大的军队，甚至强于黎巴嫩武装部队。贝鲁特圣约瑟夫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萨米·纳德表示，如果真主党不能用武器对付以色列，他们会用之对付黎巴嫩境内的人吗？这才是令人担忧的。^[1] 未来，解除真主党武装是黎巴嫩政治的核心问题，也是伊朗、以色列和沙特等地区大国博弈的关键目标。

对于解除真主党武装，黎巴嫩国内存在三种力量：真主党、激进派和温和派。真主党同意从利塔尼以南地区撤出，但坚决反对解除武装。“黎巴嫩力量”等真主党的政治对手属于激进派，要求立即解除真主党武装，并寄希望于以色列和美国的协助。总统奥恩、总理萨拉姆为代表的中间派主张，在承认真主党是一支主要政治力量的前提下徐图之，通过协商解除其武装。^[2] 这三派力量背后都有外部支持者，伊朗支持真主党，以色列支持“黎巴嫩力量”，沙特支持中间派。目前看，中间派占据上风。总统奥恩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只有黎巴嫩武装部队拥有携带武器的“排他性权利”。^[3] 新内阁在政策声明中指出，只有国家有权保卫黎巴嫩领土，这是 1990 年以来首次没有提及黎巴嫩人民（暗指真主党）抵抗以色列的权利。但是，奥恩也明确承诺不会采用军事手段解除真主党武装，迄今为止黎巴嫩武装部队也没有采取任何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相反 2025 年 2 月 8 日在组阁过程中新政府与真主党达成妥协，总理萨拉姆同意真主党提名财政部部长亚辛·贾比尔，财政部部长有权签署任何带有预算成分的行政命令，实际上赋予了真主党程序性的否决权。^[4]

[1] Christina Goldbaum and Euan Ward, “Hezbollah Stages Show of Strength at Funeral for Assassinated Leader,”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23/world/middleeast/hezbollah-nasrallah-funeral-lebanon.html>.

[2] “Containing Domestic Tensions in War-hit Lebanon,” *Crisis Group Middle East Briefing* N°94, February 27, 2025, https://www.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east-mediterranean-mena/lebanon/b094-containing-domestic-tensions?utm_source=mailchimp&utm_medium=email.

[3] “Hizbullah’s Decline is a Boon for Lebanon’s New Government,”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3, 2025,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5/02/13/hizbullahs-decline-is-a-boon-for-lebanons-new-government>.

[4] “How the Salam Government was Finally Formed,” *L’Orient Today*, February 9, 2025, <https://today.lorientlejour.com/article/1447168/how-the-salam-government-was-finally-formed.html>.

组阁前美国曾向黎巴嫩政府施加强大压力，公开宣布美国视真主党参与政府为“红线”。^[1]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法瓦兹·格尔盖斯说，美国的这一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黎巴嫩已处于一场“毁灭性新内战”的边缘。^[2]

四、结语

中东正处在新旧格局转换的剧烈变动中，全球格局、地区形势和国内政局三重因素交织互动，机遇与风险都非常突出，积极和消极趋势都值得高度重视。积极方面，尽管受战争冲击，中东的经济机遇仍然在不断扩大；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爆发正面军事冲突，但12天后实现停火；叙利亚、黎巴嫩政局变化，不排除向稳、向好的可能性。消极方面，美国与以色列采取进攻性、冒险性政策，是地区最不稳定的因素，也是地区和平最大的挑战；巴以冲突和平解决仍然看不到希望；也门胡塞武装与以色列的冲突还在持续；以色列与伊朗再度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小；受外部力量强势干预，叙利亚、黎巴嫩政治过渡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大。2025年2月，内塔尼亚胡访美前说，以色列“已经改写了中东版图”，美以合作能够“进一步改写中东版图”。^[3] 显然，美国与以色列还要继续扩大自己的战略优势，中东形势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责任编辑：宁团辉】

[1] Maya Gebeily, “US Sets ‘Red Line’ against Hezbollah Joining Lebanese Government,” Reuters, February 7,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us-has-set-red-line-that-hezbollah-not-join-lebanese-govt-envoy-says-2025-02-07/>.

[2] Sean Mathews, “How the US Dived into a War to Reshape Lebanon’s Balance of Power,” Middle East Eye, October 16, 2024,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how-us-dove-war-reshape-lebanons-balance-power>.

[3] “Netanyahu Leaves for Washington Looking to Deepen Ties with Trump,” Reuters, February 2,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netanyahu-leaves-washington-looking-deepen-ties-with-trump-2025-02-02/>.

印度互联互通政策的升级： 进展、动力与前景^{*}

□ 吴 琳

〔提 要〕近年来，互联互通在印度地区战略中的地位不断凸显。印度对次区域互联互通框架进行统合升级，并在南亚次大陆能源互联互通、印度洋枢纽港口和海上走廊、双多边互联互通伙伴外交、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海外布局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印度升级地区互联互通，主要源于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内生动力。莫迪政府对内发展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外奉行强势自信的“印度优先”政策，并提出“发达印度”的百年发展目标，互联互通因此被赋予多重意义和使命——助推民族资本对外扩张，复兴“海洋印度”身份，保障关键基础设施供应链安全，以及促进国家建构和地区塑造。尽管印度发展互联互通的能力和意愿都在加强，但自身战略能力不足、地区战略环境掣肘、大国竞争复杂化等因素制约了其效果的发挥。未来印度将强化互联互通的地缘战略作用，加快推进完善周边互联互通网络建设。中国既要做好风险管理，也应为中印在共有周边实现“共进式”发展创造条件。

〔关 键 词〕互联互通、“印度优先”、印度地区战略、中印关系

〔作者简介〕吴琳，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国家安全学院）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35.12, D822.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5）4 期 0063-25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大国竞争背景下南亚地区格局的演变及我国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2BGJ06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

2014年莫迪担任印度总理后,陆续提出“邻国优先”“东向行动”“西联”“连接中亚”等地区政策框架,并在这些框架下推出不少地区互联互通倡议,包括通过“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交通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与缅甸推进卡拉丹多式联运项目,重启印度—缅甸—泰国(IMT)三边公路,商讨“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STC)、印度—中亚天然气管道等。^[1]近年来,莫迪政府的对外姿态日趋自信,^[2]更加突出互联互通在其地区战略中的重要地位,^[3]整合升级次区域互联互通倡议,重塑对邻国政策。印度不仅在2023年与美国、欧盟等联合推出“印欧经济走廊”(IMEC),而且大幅提升与美西方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并行推进陆上和海上互联互通,数字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海外布局也呈现进取势头。印度互联互通发展能力和雄心的增强,势必对中印关系和“一带一路”合作产生影响。随着中印关系“重启再出发”,^[4]两国学术界应就中印如何在共有周边实现“共进式发展”加强研究和探讨。

一、印度升级地区互联互通的进展

近年来,印度对“邻国优先”“东向行动”“西联”“连接中亚”等次

[1] 参见楼春豪:《印度的地缘战略构想与地区基础设施联通政策》,《南亚研究》2019年第4期,第1-23页;林民旺:《印度与周边互联互通的进展及战略诉求》,《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4期,第56-63页;蓝建学:《印度“西联”战略:缘起、进展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第63-80页;吴兆礼:《印度“连接中亚政策”:推进路径与成效》,《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6期,第67-83页;冯立冰:《印度东北部基建动向及其对我国周边安全的影响》,《南亚研究季刊》2019年第1期,第8-15页。

[2] Rohan Mukherjee, “A Hindu Nationalist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April 4,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ndia/hindu-nationalist-foreign-policy>; Hartosh Singh Bal, “The End of Secular India: Modi’s Quest to Entrench Hindu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April 12,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ndia/end-secular-india>; Tridib Bhattacharya, “The Western Connect: Comparing Indian and Hindu Nationalism,” December 17, 2021, <https://blogs.lse.ac.uk/lseupr/2021/12/17/the-western-connect-comparing-indian-and-hindu-nationalism/>.

[3] Henry Storey, “India Doubles Down on Regional Connectivity to Counter China,” Lowy Institute, August 21, 2023,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or/india-doubles-down-regional-connectivity-counter-china>.

[4] 《王毅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 外交部网站, 2024年11月19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jzh/202412/t20241218_11496691.shtml.

区域互联互通框架进行统合升级，重点加强在南亚次大陆能源、印度洋海上、伙伴外交和数字基建等四个方面的战略布局并取得重要进展。

（一）打造南亚次大陆能源互联互通网络

2014年11月南盟峰会受挫后，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和尼泊尔四国（BBIN）的互联互通机制开始形成。四国启动专家会议，重点讨论在两个领域的合作：一是水电能源的贸易和电网联通，二是机动车和火车联通问题。四国在机动车联通问题上率先取得突破，2015年6月签订《BBIN 机动车协议》，但后来因不丹国内反对而拖延执行。^[1]近年来，印度关注重点转向 BBIN 水电能源贸易和电网联通，积极打造南亚次大陆能源互联互通网络。

尼泊尔、不丹和孟加拉国在印度的能源安全矩阵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尼泊尔和不丹水力发电资源丰富，孟加拉国则缺电且能源需求不断增大，孟加拉国若要从尼泊尔和不丹购电，必须通过印度的输电网络。近年来，印度调整国内政策法规，放宽对跨境电力交易的限制，加强输电线和水电项目的建设和发展，从而推动印度与上述三国之间的电力交易在 2016—2023 年大幅增长。^[2]2022 年初，孟加拉国提议与尼泊尔进行电力贸易，位于两国之间的印度积极回应了孟加拉国的提议。4 月，印度与尼泊尔签署《电力合作联合愿景声明》。8 月，尼泊尔和孟加拉国联合请求利用印度基础设施进行跨国电力运输。此后，三国就电力贸易安排进行谈判，最终达成三方电力销售协议，这是南亚国家通过印度电网相互进行电力交易的首个协议。^[3]2024 年 11 月 15 日起，尼泊尔向孟加拉国出口 40 兆瓦电力，正式开启两国之间的能源贸易。根据该协议，尼泊尔将在每年 6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之间，按每千瓦

[1] 林民旺：《印度与周边互联互通的进展及战略诉求》，第 57 页。

[2] 《印智库：印度与南亚邻国加强能源合作》，参考消息网，2024 年 9 月 24 日，<https://ckxxapp.ckxx.net/pages/2024/09/24/a2eb955586234f228eeaac8c1299e223.html>。

[3] Aditya Gowdara Shivamurthy and Sohini Bose, “Redefining ‘Power’ in South Asia: An Assessment of the Kathmandu-Delhi-Dhaka Nexus,”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August 25, 2023,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redefining-power-in-south-asia>。

时 6.4 美分的价格向孟加拉国出口电力，尼方在 5 个月出口期内预计将出口 144 万兆瓦时电力。这是尼泊尔首次向印度以外的第三国出口电力。此外，印度与尼泊尔还签订一项为期 25 年的长期购电协议，未来 10 年印度将从尼泊尔进口 10000 兆瓦水电，尼泊尔则计划到 2035 年生产约 28000 兆瓦水电，并将其出口至印度和孟加拉国。^[1]

在能源管道方面，印度与孟加拉国在 2023 年 3 月正式启用印孟友谊管道（IBFP），以连接印度西孟加拉邦的西里古里和孟加拉国的帕尔巴蒂普尔油库。此前，印度一直通过铁路网络向孟供应柴油产品，印孟友谊管道的启用将降低运输成本，缩短运输时间，有助于缓解孟国内面临的能源危机。^[2]此外，印度还计划建设连接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的管道，并参与 2015 年就已提出的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然气管道项目。前者因缅甸政局动荡而搁置。后者在 2024 年重启，阿富汗境内管道约 800 公里，2024 年 9 月开始建设；巴基斯坦境内部分正在推进，预计未来将与阿富汗段连接；印度段的建设尚未明确，但印度政府表示支持。

印度还加强与斯里兰卡的能源合作，并希望借由能源合作将其纳入“BBIN+”架构。2022 年 1 月，两国签署协议，共同开发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战略油库存在的亨可马里储油设施。印度还提议建设一条海底管道，将该油库与印度纳加帕蒂南拟建的新炼油厂连接起来，预计这条管道每年可在两国间输送约 350 万吨石油。^[3]2023 年 7 月，印度与斯里兰卡提出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签署可再生能源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建立高容量电网互

[1] Ballav Dahal, “Breakthrough in Trilateral Energy Cooperation,” The Rising Nepal, November 18, 2024, <https://risingnepaldaily.com/news/52150>.

[2] Sohini Bose, “Powered by Diesel: Pipeline Strengthens India-Bangladesh Energy Connectivity,”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April 25, 2023,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powered-by-diesel>.

[3] David Brewster, “India’s Takeover of the Trincomalee Oil Tank Farm Will Help Build Energy Interdependence with Sri Lanka,” Lowy Institute, April 16, 2024,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india-s-takeover-trincomalee-oil-tank-farm-will-help-build-energy-interdependence>.

联，实现斯里兰卡与包括 BBIN 国家在内的其他地区国家之间的双向电力贸易。^[1]2024 年，两国同意铺设一条价值 12 亿美元的海底输电线路，连接斯中北部阿努拉达普拉和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金奈的电网。

（二）布局印度洋枢纽港口和海上走廊

莫迪第一任期加强了与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关系，此后将升级与该地区的海上互联互通作为战略重点，积极推进枢纽港口和海上走廊建设。

首先，印度通过收购和运营恰巴哈尔港和实兑港，投资科伦坡港码头建设，增强“西联”和“东进”的港口联通性。恰巴哈尔港是伊朗离印度最近的海港，也是印度海上通道、贸易发展和地缘政治的战略支点。2015—2016 年，印度和伊朗先后签署《印度在恰巴哈尔港发展计划中的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和《恰巴哈尔协议》，以建立国际运输和过境走廊。印度港口全球有限公司（IPGL）于 2018 年 12 月接管恰巴哈尔港的运营。2024 年 5 月，IPGL 与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PMO）签署一份为期十年的合同，前者将负责装备和运营恰巴哈尔港的沙希德·贝赫什提（Shahid Behesti）码头。印度还持续对恰巴哈尔港进行开发援助和投资。截至 2024 年 11 月，印度用于供应该港设备的赠款累计 1.2 亿美元，并为其开发提供 2.5 亿美元等值卢比的信用额度。^[2]

缅甸若开邦实兑港是印度卡拉丹多式联运项目的一部分，它将印度东北部各邦与孟加拉湾连接起来，推进印“东进”政策并加强区域联通性。2023 年 5 月，实兑深水港正式开港运营，新港口可停泊 2 万吨货轮，运输能力显著提升。2024 年 4 月，印度外交部批准由 IPGL 接管实兑港的港口运营。实兑港成为印度继恰巴哈尔港后收购的第二个海外港口，且印度政府对其拥有

[1] “Promoting Connectivity, Catalysing Prosperity: India-Sri Lanka Economic Partnership Visio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July 21, 2023,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6864/Promoting+Connectivity+Catalysing+Prosperity+IndiaSri+Lanka+Economic+Partnership+Vision>.

[2] “Question No.44 Chabahar Port Project,”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November 28, 2024, <https://www.mea.gov.in/rajya-sabha.htm?dtl/38631/QUESTION+NO+44+CHABAHAR+PORT+PROJECT>.

完全运营权。^[1]截至 2024 年 7 月，实兑港已处理 10.9 万吨货物，促进贸易的潜力巨大。^[2]

在斯里兰卡，印度的私营资本展现出对科伦坡港的巨大兴趣。2021 年，印度阿达尼集团（Adani Group）签署一项价值超过 7 亿美元的协议，计划在科伦坡港西部建设集装箱码头。据称这份为期 35 年的“建设—运营—转让”（BOT）协议是斯里兰卡“港口领域有史以来最大的外国投资”。^[3]2025 年 4 月，阿达尼集团宣布科伦坡西部国际码头投入运营。^[4]

其次，印度启动“印欧经济走廊”和“金奈—符拉迪沃斯托克东部海上走廊”两大项目。“印欧经济走廊”由美国、印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欧盟领导人在 2023 年 9 月二十国集团（G20）新德里峰会期间公布。该走廊包括一条连接印度与海湾地区的东部走廊和一条连接海湾地区与欧洲的北部走廊，两段走廊将融合公路、铁路、港口及其他物流基础设施，构建一个可靠高效的跨境船运转铁路运输网络，以补充现有海上和公路运输方式的不足。^[5]“金奈—符拉迪沃斯托克东部海上走廊”是莫迪在 2019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经济论坛上提出的。莫迪在会上公布了印度的“远东行动”（Act Far East）政策，旨在加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并提出在金奈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建立一条直达海上航线，

[1] Subhomoy Bhattacharjee, “India Secures Second Overseas Port: Sittwe Agreement Approved by MEA,” *Business Standard*, April 7, 2024,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economy/news/india-secures-second-overseas-port-sittwe-agreement-approved-by-mea-124040700550_1.html.

[2] Dinakar Peri, “Amid Raging Fighting in Myanmar, 100th Shipment from India Reaches Sittwe Port,” *The Hindu*, July 24, 2024,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amid-raging-fighting-in-myanmar-100th-shipment-from-india-reaches-sittwe-port/article68426953.ece>.

[3] Kiran Sharma, “Sri Lanka Walks India-China Tightrope with Port Deal,” *Nikkei Asia*, October 7, 2021,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Sri-Lanka-walks-India-China-tightrope-with-port-deal>.

[4] “Adani’s Colombo Terminal Commences Operations,” *Adani Ports and Logistics*, April 7, 2025, <https://www.adaniports.com/newsroom/media-releases/adani-colombo-terminal-commences-operations>.

[5] 巴殿君、冯冠、左天全：《“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评估》，《和平与发展》2023 年第 6 期，第 39 页。

全长约 10300 公里，途经日本海、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等战略水道。2024 年 11 月，印度港口、航运和水道部长宣布该海上走廊正式投入运营。这条贸易路线与印度东海岸的维沙卡帕特南、帕拉迪普等港口相连，不仅将印度与俄罗斯远东地区间的货物运输时间从 40 天缩短至 24 天，还将距离缩短约 40%。^[1]

最后，印度推动孟加拉湾海上运输合作取得有限进展。孟加拉湾是印度发展海上互联互通的优先方向，也是连接上述枢纽港口和东西走廊的中枢地带。2016 年南盟峰会中断后，印度一直在 BIMSTEC 机制下推进环孟加拉湾及其与东南亚的海上互联互通。2019 年 11 月，BIMSTEC 在印度维沙卡帕特南召开首届港口峰会，提出加强海上互动和港口主导的互联互通。2022 年 3 月，在科伦坡举行的 BIMSTEC 第五届峰会通过《交通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成立《海上运输合作协定》工作组以推进协定谈判。2025 年 4 月，《海上运输合作协定》在 BIMSTEC 第六届峰会上通过，该协定的签署被视为使本地区海上贸易和运输更加高效协调的重要里程碑。印度是首个批准该协定的国家，并已提议在本国设立 BIMSTEC 可持续海上运输卓越中心（BSMarTC）。^[2] 该协定生效后，将为成员国（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缅甸、泰国）的各类货物提供优惠港口费，允许使用其他成员国的港口转运货物，有助于简化物流以促进区域贸易。^[3]

（三）利用双多边平台拓展互联互通伙伴外交

莫迪将互联互通伙伴外交作为重要平台，积极开展与西方国家的互联互通战略协作，不断深化与东盟、中亚等地区国家和组织的合作。

[1] Anisha Sharma and Melissa Cyrill, “India-Russia Economic Partnership: Strengthening Ties Across Trade and Investment,” India Briefing, November 26, 2024, <https://www.india-briefing.com/news/india-russia-economic-partnership-trade-and-investment-maritime-developments-35233.html/>.

[2] “Regional Maritime Cooperation Gets a Fresh Impetus at 2nd BIMSTEC Ports Conclave,” BIMSTEC, July 15, 2025, <https://bimstec.org/event/266/regional-maritime-cooperation-gets-a-fresh-impetus-at-2nd-bimstec-ports-conclave>.

[3] Harshit Prajapati, “Why BIMSTEC’s Maritime Transport Agreement Is Essential for India,” South Asian Voices, August 23, 2024, <https://southasianvoices.org/ec-m-in-n-bimstec-mta-08-23-2024/>.

印度与日本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启动较早，合作也最为深入。双方在2017年12月的领导人会晤后成立了“印度—日本东向行动论坛”(India-Japan Act East Forum)。近年来，日本借助该论坛深度参与印度东北部地区基建，对孟加拉国投资，以及日本与孟加拉湾的互联互通。2023年3月，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访印期间宣布日“自由开放的印太”新计划，并提议与印、孟合作建立“孟加拉湾—印度东北部产业价值链”，共同促进该区域发展。^[1]同年4月，印度智库“亚洲汇流”(Asian Confluence)在印东北部的特里普拉邦主办了第三届“印度—日本智库对话会议”，探讨日印孟三方在该地区互联互通中的合作机会。孟加拉国和印度两国的外交国务部长、印度东北地区发展部部长、日本驻印大使均出席了此次会议。^[2]2024年2月第七届“印度—日本东向行动论坛”前夕，日本驻印大使铃木浩在第四届“印度—日本智库对话会议”上阐述了“孟加拉湾产业价值链”构想与实施进展。^[3]

印度与欧盟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也得到快速发展，欧盟成为继日本之后又一个积极参与印度东北部和孟加拉湾互联互通的西方力量。印度与欧盟在2021年5月领导人会晤期间启动以数字、能源和交通为主要合作领域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2023年5月，双方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首届贸易和技术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将互联互通列为重点合作领域。同年6月，印度外交部、欧盟驻印度使团和“亚洲汇流”在印东北部的梅加拉亚邦联合举办“印度—欧盟互联互通会议”，探讨对印度东北各邦及其邻国（尼泊尔、不丹和孟加拉国）的互联互通投资。印度外交国务部长出席会议，并表达对印欧双方在南亚和“印

[1] Fumio Kishida, “The Future of the Indo-Pacific—Japan’s New Plan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Together with India,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ne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March 20, 2023,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477791.pdf>.

[2] “Third India-Japan Intellectual Conclave: Concept Note and Agenda,” Asian Confluence, April 11-12, 2023, [https://www.asianconfluence.org/pdf/1682607893FINAL%20AGENDA%20CN%20AN-Tripura%20\(1\).pdf](https://www.asianconfluence.org/pdf/1682607893FINAL%20AGENDA%20CN%20AN-Tripura%20(1).pdf).

[3] “Keynote Address by H.E. Hiroshi SUZUKI, Ambassador of Japan to India, at the 4th India Japan Intellectual Conclave in Shillong,” Embassy of Japan in India, February 12, 2024, <https://www.in.emb-japan.go.jp/files/100622214.pdf>.

太”开展第三方合作的期待。^[1]

同期，印度与美国、澳大利亚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也大幅提升。2022年5月，在美国拜登政府主导下，七国集团（G7）峰会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旨在建立政府、私营部门和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联盟，推动重要经济走廊建设和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印度积极参与包括“印欧经济走廊”在内的 PGII 合作项目，并获得美国对其可再生能源发电、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基金、电动交通多元化供应链、5G 开放无线接入网等的投资。^[2]在 2020 年 6 月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印度与澳大利亚的互联互通合作提速。双方建立了绿色钢铁合作伙伴关系、关键矿产研究和投资伙伴关系，还成立了“印澳基础设施论坛”。2023 年 3 月，澳总理阿尔巴尼斯访印期间，两国领导人决定共同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提供资金，支持其提高抗灾基础设施复原力，并承诺根据太平洋岛国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加强在该地区的合作。^[3]

在多方方面，印度积极推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和美印以阿“新四边机制”（I2U2）的互联互通议程，向“印太”和中东辐射影响力。在“印太”方向，2022 年 5 月举行的 Quad 第二次峰会成立基础设施协调小组，推动四国在数字联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清洁能源、气候复原力等领域加强互补性行动，并承诺未来 5 年为“印太”地区提供超过 50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援助和投资；2023 年 5 月，Quad 第三次峰会启动“四方基础设施奖学金计划”和“海底光缆联通与韧性伙伴关系”，印度借此机会增建本国海底光

[1] “India-EU Connectivity Conferenc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June 3, 2023, <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36645/India++EU+Connectivity+Conference+June+01022023>.

[2]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d Prime Minister Modi Host Leaders on the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9, 2023,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9/09/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prime-minister-modi-host-leaders-on-the-partnership-for-global-infrastructure-and-investment/>.

[3] “Joint Statement—1st Australia-India Annual Summit,”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March 11, 2023, <https://www.pm.gov.au/media/joint-statement-1st-australia-india-annual-summit>.

缆登陆站。^[1] 在中东方向，印度与美国、以色列和阿联酋于 2021 年联合创建 I2U2，推动“印欧经济走廊”成为该机制首个拟落地的合作项目。^[2] 印度在以色列和美国资助下，有望成为所谓的“可再生能源领域替代供应链的全球中心”。^[3]

在周边地区，印度升级与中亚和东盟的伙伴关系，并制定互联互通合作路线图。2022 年 1 月，印度与中亚五国举行首届线上峰会并发布《德里宣言》，提出加强地区联通。印度和“国际南北运输走廊”、《阿什哈巴德协定》的中亚成员国呼吁更多中亚国家加入这些互联互通倡议，印度关于将恰巴哈尔港纳入这些倡议并成立联合工作组的提议也得到中亚国家支持。同年 11 月，印度将其与东盟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连接互联互通”（Connecting the Connectivities）方针，探索《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与印度“东向行动”政策下的互联互通倡议对接。^[4] 双方将当前合作重点确定为：早日建成启用印缅泰三边公路并进一步延伸至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加强数字联通，启动《东盟—印度航空运输协定》（AI-ATA）谈判，推动签订《东盟—印度海上运输协定》（AI-MTA）等。^[5]

（四）推广印式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平台和规则

近年来，随着印度完善国内数字公共基础设施（DPI）建设，莫迪政府加强了 DPI 在周边国家的“在地化”发展，并以此为抓手推广印度数字发展

[1] The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ORF) and East-West Center, “Two Decades of the Quad: Diplomacy &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June 2024, p.16, <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6/Two%20Decades%20of%20the%20Quad.pdf>.

[2] 巴殿君、冯冠、左天全：《“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评估》，第 39 页。

[3] “Joint Statement of the Leaders of India, Israel,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2U2),” The White House, July 14, 2022,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7/14/joint-statement-of-the-leaders-of-india-israel-united-arab-emirates-and-the-united-states-i2u2/>.

[4] “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19th ASEAN-India Summit to Commemorate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ASEAN-India Dialogue Relations,” ASEAN, November 12, 2022,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2/11/3.-Final-CS-19th-ASEAN-India-Summit.pdf>.

[5] “ASEAN, India Reaffirm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SEAN, March 19, 2024, <https://asean.org/24th-meeting-of-asean-india-joint-cooperation-committee-convenes/>.

模式。数字基建成为莫迪政府升级地区互联互通的“新王牌”。^[1]

推广以“印度堆栈”（India Stack）为代表的数字治理系统是印度拓展数字互联互通影响力的主要方式。“印度堆栈”由基础身份认证平台（Aadhaar）、统一支付接口（UPI）和数字文件夹（DigiLocker）三个模块组成。以此为基础，印度根据合作对象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推动数字身份系统和移动支付系统在周边国家生根落地。印度开发出与 Aadhaar 类似的模块化开源身份平台（MOSIP），在菲律宾、斯里兰卡等 9 个国家正式投入运营。2023 年投入运营的 PayNow-UPI 连接实现了印度和新加坡之间的实时跨境贸易，是两国实现金融互联互通的关键一步。印度还与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阿联酋等周边国家整合 UPI 或建立跨境支付合作伙伴关系。此类双边合作还扩展到多边框架，例如印度储备银行（RBI）正与国际清算银行（BIS）以及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中央银行合作开展“Nexus 项目”，计划在 2026 年启动连接多国的即时跨境零售支付平台。^[2] 印度还计划通过参与“印欧经济走廊”项目，构建与中东和欧洲的数字联通。^[3]

印度还积极参与和主导全球和地区多边机制的 DPI 议程和规则制定。2023 年 11 月，莫迪在 G20 峰会上宣布启动“全球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存储库”和“社会影响力基金”。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主持 G20 数字经济工作组，通过谈判最终促成首个关于 DPI 的多边共识，包括建立 DPI 框架、为中低收入国家 DPI 筹集资金，以及创建全球 DPI 存储库以交流信息和最佳实践。“社会影响力基金”承诺提供 2500 万美元初始资金，用以加快“全球南方”国家

[1] 毛克疾：《印度数字基建：莫迪政府的“新王牌”？》，《世界知识》2023 年第 24 期，第 35 页。

[2] Sauradeep Bag, “Reimagining Regional Financial Systems: India and ASEAN’s Digital Leap,” February 20, 2025,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reimagining-regional-financial-systems-india-and-asean-s-digital-leap>.

[3]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PGII) & India-Middle 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 (IMEC),”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September 9, 2023, 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37091/Partnership_for_Global_Infrastructure_and_Investment_PGII_IndiaMiddle_EastEurope_Economic_Corridor_IMEC.

DPI 发展。^[1] 同年 12 月，在印度外交部与卡内基印度中心联合主办的“全球技术峰会”上，印方提议在 Quad 框架下设立 DPI 工作组，希望复制 G20 峰会成果，推动在印度举办的 2025 年 Quad 峰会达成新的 DPI 框架。^[2]

二、印度升级地区互联互通的内生动力

印度升级地区互联互通，与近年来“一带一路”在中印共有周边的积极推进有着密切关系。美国、欧盟、日本等将互联互通作为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抓手，竞相推出各自的互联互通方略，也促使印度不甘落后。但相比这些外部性因素，更为根本的动力来自印度自身。印度在 2023 年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随后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面对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大国技术竞争加剧，莫迪提出到 2047 年将印度建成发达国家的百年目标，把“印度优先”作为外交政策的立足点，一切对外行动以实现印度教民族主义世界观视角下的国家利益为依归。^[3] 依此逻辑，莫迪政府从资本扩张、海洋战略、经济安全、国内国际互动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地区互联互通的利益和目标，发展并升级了相关政策。

（一）扶持超大规模财团出海，助推民族资本对外扩张

自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改革以来，私营部门在印度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莫迪上台后大力扶植超大规模财团，政府与财团的政商关系日趋紧密。

[1] “Prime Minister Announces Completion of Global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Repository and Creation of a Social Impact Fund to Advance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 Global South,”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of India, November 23, 2023, <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IframePage.aspx?PRID=1979113>.

[2] Rudra Chaudhuri and Aadya Gupta, “A Quad Initiative on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Carnegie India, February 19, 2024, <https://carnegieindia.org/2024/02/19/quad-initiative-on-digital-public-infrastructure-pub-91668>.

[3] Aishwarya P. Sharma, “Under PM Modi, We Have a Bharat-First Foreign Policy: EAM Jaishankar,” The Sunday Guardian, May 5, 2024, <https://sundayguardianlive.com/top-five/under-pm-modi-we-have-a-bharat-first-foreign-policy-eam-jaishankar>.

超大型财团不仅把持印度国内基础设施和其他垄断部门，而且发展成一个具有国际化偏好的新兴商业阶层。^[1]它们承载着莫迪政府自信进取的外交冲动，不断进行海外资本扩张。从印度现代化发展路径的角度看，印度升级地区互联互通，是国家权力与新兴商业寡头高度绑定后资本对外扩张的必然结果。

在蓬勃发展的大型商业组织中，受到莫迪政府格外关注的是来自古吉拉特邦巴尼亚种姓的商业集团，其中最重要的是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创立的阿达尼集团和迪鲁巴伊·安巴尼（Dhirubhai Ambani）创立的信实工业（Reliance Industries）。在莫迪“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智慧城市”及国防现代化建设中，这两大集团得到大量港口、机场、电信和国防建设合同，业务和财富大幅增长。^[2]近年来，印度在周边国家开展的地区互联互通项目，都有这些超大型财团的身影。阿达尼集团不仅持续在尼泊尔和不丹发电输电的传统领域投资，而且加速进军不丹、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的可再生能源、机场、数据中心等新领域。科伦坡西部集装箱码头就是由阿达尼港口和经济特区有限公司牵头的财团参与运营的。信实工业是印度第二大财团，也是印度最大的私人联合企业，把持国内最大移动运营商，是莫迪政府在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不丹等国推广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持者和受益者。塔塔集团作为印度最大的商业集团，近年来也积极投资孟加拉国、尼泊尔、马尔代夫、不丹等国的电力、可再生能源、住房等基础设施。

（二）复兴“海洋印度”身份，构建贯通“印太”陆海通道

传统上，印度认为自己是印度洋的天然主导者，期望确保印度洋始终是“印度的洋”，但受战略重心布局、超级大国对抗及自身综合国力等因素影

[1] Trissia Wijaya and Kanishka Jayasuriya, “A New Multipolar Order: Combined Development, State Forms and New Business Class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0, No.5, 2024, pp.2133-2152.

[2] 陈金英：《莫迪政府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年第2期，第32-36页。

响，印度自独立后很长时期主要将战略重心聚焦于陆地。^[1]近年来，随着“印太”这一海洋地缘概念的兴起，大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洋竞争明显加剧。印度被拉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之中，更是为印度复兴海洋战略意识提供了外部动力。除了从战略和安全上复兴“海洋印度”身份，印度还将“通过互联互通实现发展”作为其海洋战略的新叙事，^[2]这集中体现在印度加强海上互联互通布局和建设，并积极发展贯通印度洋东西两端的陆海新通道。

印度发展海上互联互通，核心是实现孟加拉湾的互联互通。孟加拉湾是一条重要的海上走廊，促成了大量贸易，特别是从中东向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能源。该航线对连接南亚和东南亚也至关重要，有助于印度发挥连接东西方的中转枢纽作用，促进与中东和东南亚的合作。印度加强枢纽港口的建设，特别是2024年4月决定通过印度港口全球有限公司全面控制实兑港，充分体现了这一战略意图。^[3]在该公司的运营管理下，实兑港致力于缩短地理和经济距离，同时促进人文交流。通过促进以印度卢比进行的贸易和投资基础设施升级，该港口证明了印度建立兼具弹性和包容性的区域联通框架的雄心。^[4]

但海上互联互通不是孤立发展的，需要与陆上互联互通相互补充。在近两年的印度洋会议上，印度外长苏杰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述。他表示，恢复和加强印度洋海上流动是当今印度的首要任务，但发展陆上横向互联互通对补充海上流动至关重要；要兼顾发展陆上互联互通和海上互联互通，实现两者的相互加强。“这也是为什么建设通往印度西部的‘印欧经济走廊’和

[1] 张力、陶姗：《印度探索印度洋主导权的动因、举措与制约》，《南亚研究》2024年第2期，第79-80页。

[2] P. V. Rao, “‘Development Through Connectivity’: India’s Maritime Narrative,” *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Vol.15, No.3, 2019, pp.246-248.

[3] Sreeparna Banerjee, “Shifting Tides: India’s Port Dominance in Myanmar,”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April 25, 2024,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shifting-tides-indias-port-dominance-in-myanmar>.

[4] Sreeparna Banerjee and Debashis Chakraborty, “Facilitating India-Myanmar Trade Through Sittwe Por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February 4, 2025,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facilitating-india-myanmar-trade-through-sittwe-port-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

通往印度东部的印度—缅甸—泰国三边公路如此重要。”^[1]事实上，印度积极建设恰巴哈尔港，除了要保障通往中东和欧洲的海上航线，也是为了减少印巴对抗给印度—中亚互联互通带来的负面影响，绕过巴基斯坦发展与中亚内陆国家的贸易和能源通道。

（三）打造地区弹性供应链，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

近年来，莫迪政府高度重视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启动了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框架，确定关键基础设施的七个主要部门——电信、电力和能源、银行和金融服务、交通、战略实体、政府企业、医疗保健。^[2]其中电信、电力和能源是关键中的关键，这与当今大国之间围绕通信、半导体、新能源等关键技术展开的激烈竞争有关。印度担心共建“一带一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进一步“占领”南亚的数字和能源市场，威胁印度的数字和能源安全，因此将有限的资源重点投向数字和能源部门，试图通过互联互通来吸引地区国家，打造地区可再生能源和数字产业的弹性供应链，保障战略基础设施安全。

在能源领域，印度弹性供应链战略的重要支柱是能源供应“近岸化”和建设绿色电网。莫迪政府正通过在南亚各地建设能源基础设施，结合“邻国优先”政策实现这些目标，包括在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建设水力发电厂、太阳能电厂等绿色能源基础设施，并联通这些国家与印度的能源设施，以便进口这些国家生产的多余能源。^[3]由于印度在能源基础设施、创新技术等方面均落后于中美等大国，莫迪政府积极寻求融资，一方面出台

[1] “Remarks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Dr. S. Jaishankar at the Inaugural Session of 6th Indian Ocean Conferenc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May 12, 2023,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6547>; “Keynote Address by EAM, Dr. S. Jaishankar at the 7th Indian Ocean Conference 2024,”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February 9, 2024,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7609/Keynote_address_by_EAM_Dr_S_Jaishankar_at_the_7th_Indian_Ocean_Conference_2024.

[2] Jayant Chakravarti, “India to Launch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Framework,” June 12, 2023, <https://www.bankinfosecurity.asia/india-to-launch-critical-infrastructure-security-framework-a-22282>.

[3] 《印智库：印度与南亚邻国加强能源合作》。

各种扶持性政策支持大财团“出海”，另一方面广泛与西方资本和多边开发银行合作，搭建政企商务合作平台，为印度初创企业融资，引导更多企业进入新能源产业。

相较于依靠地理优势打造的能源弹性供应链，印度在数字化领域主要依赖标准、需求、模式的“定制服务”。尽管印度享有“世界办公室”的美誉，通信、银行、保险和企业商务等现代服务业起步较早，但由于缺乏全产业链的制造业基础和自主开发软件的技术能力，印度在数字经济的大国竞争中并不占优势。为保障关键信息安全，提升在全球数字发展中的地位，印度将数字互联互通的“赛道”确定为“知识供应”，努力成为地区数字化治理的“知识中心”。另外，南亚地区年轻人口占比高，数字经济潜力巨大，西方国家觊觎这一广阔市场，又要面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竞争，因此积极拉拢印度联合发展数字贸易和通信基础设施，落实所谓“韧性数字供应链”。^[1]这给了印度“借势”发展的绝佳机会。

（四）促进国家建构和地区塑造

莫迪政府重视互联互通的经济和战略意义，也注重互联互通促进国家建构和地区塑造的工具性作用。近年来，莫迪政府在国内积极发展印度教民族主义，推广印度教文化，推动对印度历史的重新解读，强化印度教在国家叙事和民族认同中的核心地位，这是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国族塑造。此外，莫迪政府还极为重视互联互通在改善东北部地区治理和保障国家安全方面的政治作用。2021 年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印缅边境的四个邦形势急转直下，地方叛乱死灰复燃，严重影响印度的边境安全和与缅甸的互联互通合作。^[2]莫迪政府一方面进行军事和外交应对，另一方面加强央地协调，支持东北各邦在国家战略和倡议下提出倡议，以更加自主的身份参与邦际和跨境互联互

[1] 李莉：《美国的印太数字经济外交：推进与前景》，《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2-8 页。

[2] Purvi Patel and Charuta Ghadyalpatil, “India-Myanmar: Borderland Dynamics,” Gateway House, October 31, 2024, <https://www.gatewayhouse.in/india-myanmar-borderland-essay/>.

通合作。

以梅加拉亚邦为例，该邦与孟加拉国陆地接壤。在中央政府支持下，该邦首席部长不仅在印度“东向行动”政策下出台了该邦的“向南行动”政策，重点改善与孟加拉国之间的互联互通，而且提出“分区方法”（zonal approach），带动邻邦的共同参与，满足各邦需求。^[1]梅加拉亚邦还积极承办国际互联互通会议，例如与日本和与欧盟的互联互通会议。该邦俨然成为印度东北各邦对外互联互通合作的“桥头堡”，不仅提升了整个东北部参与跨境合作的国际化能力，而且增强了各邦对国家战略和理念的认同感。

在地区层面，莫迪政府借助互联互通塑造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意愿也随着印度经济实力的增强而有所复苏。与中国在东亚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来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印度历来不注重与南亚邻国的自由贸易，区内贸易规模一直不大。^[2]时至今日，南亚区内贸易仅占区域贸易总额的5%，远低于东盟的25%、欧盟的60%，是世界上地区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区域之一。^[3]南亚地区国家普遍的经济保护主义和对域外市场的依赖，使这一现状的根本性转变前景渺茫。但面对经济转型的压力和中国在南亚不断扩大的经济影响力，印度必须作出应对，以自己的方式塑造地区经济一体化。与自由贸易相比，莫迪政府更愿意选择利用地理优势促进人员、货物和电力的互联互通，作为其维持地区主导权“合理而实用的策略”。^[4]换言之，升级地区互联互通是印度“扬长避短”、重塑地区经济关系的变通之举。

[1] “India-EU Connectivity Conferenc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June 3, 2023, <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36645/India++EU+Connectivity+Conference+June+01022023>.

[2] 贺平、周倩茹：《身份悖论与印度自由贸易战略的困境》，《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1期，第35-45页。

[3] “Why #OneSouthAsia?,” World Bank Group, <https://www.worldbank.org/en/programs/south-asia-regional-integration/trade>.

[4] Henry Storey, “India Doubles Down on Regional Connectivity to Counter China,” Lowy Institute, August 21, 2023, <https://www.loy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or/india-doubles-down-regional-connectivity-counter-china>.

三、印度地区互联互通政策的发展前景

鉴于莫迪政府近年来在互联互通领域的大量投入和重要进展，以及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将“成为世界一流的基建大国”写入施政纲领，^[1] 印度预计将继续推进国内基建改革，深化地区互联互通。在此过程中，挑战与机遇并存。

（一）国内基建改革为深化地区互联互通打下基础

印度基建外交经常被人诟病的“顽疾”包括缺乏战略统筹、项目融资困难、国内基础设施薄弱、官僚体系效率低下、政策执行力不强、与邻国协调不足等。^[2] 但过去十年间，莫迪政府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国内经济增长，大刀阔斧的基建改革和持续的对外发展援助为其进一步发展地区互联互通打下基础。

首先，莫迪政府保持了对基建强劲且持续的财政投入。2014—2023 年，印度政府共投入 43.5 万亿卢比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3] 据彭博经济研究，印度还将投入使用价值 44.4 万亿卢比（约合 5340 亿美元）的新基础设施，这些支出预计到 2030 年将使印度经济增长率提高到 9%。^[4] 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无疑会带动印度积极改善与周边甚至更远地区（如欧洲）的联通。其次，莫迪政府不断推出改革基础设施建设的举措。2021 年 10 月，莫迪政府启动面向未来 25 年、总投资高达 1.3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GatiShakti 多

[1] Bharatiya Janata Party, “Modi Ki Guarantee,” p.36, <https://www.bjp.org/bjp-manifesto-2024>.

[2] 楼春豪：《印度的地缘战略构想与地区基础设施联通政策》，第 17-20 页。

[3] “Over INR 43.5 Trillion Spent on Massive Infrastructure between 2014-2023,” Prop News Time, May 27, 2024, <https://propnewstime.com/getdetailsStories/NzE0Ng==/over-inr-43-5-trillion-spent-on-massive-infrastructure-between-2014-2023>.

[4] “Modi Bets His Legacy on \$534 Billion Infrastructure Boom in India,” Bloomberg, May 27, 2024,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4-05-27/modi-aims-to-overcome-past-delays-and-blowouts-in-india-s-infrastructure-boom>.

式联运国家总体规划”。^[1]莫迪还领导成立印度数字治理平台 PRAGATI，亲自监督和审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并推动中央、各邦和官僚机构的跨部门协作。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和盖茨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发现，PRAGATI 帮助印度加速了基础设施革命。^[2]最后，尽管与邻国的关系龃龉不断，印度对邻国的发展援助近年来仍有增加。莫迪政府特别重视以信贷额度支持区域互联互通发展，价值 69.3 亿美元、总计 98 个互联互通项目在印度五个邻国启动，其中 44 个已完成。^[3]综上，尽管印度布局互联互通的能力有限，但从中央到地方、从公共部门到私营部门、从投融资到外援，印度持续发力“大基建”，迎合周边国家发展基建、数字经济和能源转型的旺盛需求，其发展地区互联互通的前景广阔。

（二）外部环境复杂与自身战略能力不足构成挑战

尽管存在进一步发展地区互联互通的若干有利因素，但印度的雄心和实力常有错配，理想与现实存在较大落差。印度发展地区互联互通的主要障碍包括自身战略能力不足、地区战略环境掣肘、大国竞争日趋复杂。

第一，“印度优先”与“邻国优先”的内在张力凸显印度战略的自限性。莫迪上任以来提出“邻国优先”政策，主张将邻国作为印度对外战略的优先方向，照顾邻国关切和需求，支持邻国发展，成为邻国可信赖的伙伴，并解决与邻国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构建“平等”的邻国关系。但与此同时，莫迪政府又对外奉行强势自信的“印度优先”政策，以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视角，强调任何大国无法定义印度，只有印度可以定义自身利益和身份。^[4]

[1] “Initiative Aimed at Revolutionising Infrastructure: PM Modi on GatiShakti,” Business Standard, October 13, 2024,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india-news/initiative-aimed-at-revolutionising-infrastructure-pm-modi-on-gatishakti-124101300122_1.html.

[2] Soumitra Dutta and Mukul Pandya, “From Gridlock to Growth: How Leadership Enables India’s PRAGATI Ecosystem to Power Progress,” December 2024, <https://ora.ox.ac.uk/objects/uuid:34268453-91fb-4dd3-b052-90fb52fe247/files/sl92g9820>.

[3] “Overview of India’s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Embassy of India in Vietnam, <https://www.indembassyhanoi.gov.in/docs/Overview%20of%20India’s%20Development%20Partnership-%20EN.pdf>.

[4] S. Jaishankar, *Why Bharat Matters*, Rupa Publications India, 2024, pp.97-98.

这看似一种战略自主性的宣告，实质上迎合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度例外论”，意图恢复印度被殖民前的“历史和荣光”。在此心态影响下，印度近年来推出“大婆罗多”构想，将当今大多数南亚国家描绘为过去一个更大的、不可分割的政体的一部分，妄图“收编”周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主权，恢复被殖民者破坏的文化统一。^[1]可见，“印度优先”的本质是延续地区结构的不对称和不平等，与“邻国优先”所宣扬的“平等”关系自相矛盾。

这种矛盾性在印度的地区互联互通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在与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的水电跨境贸易上，尽管尼泊尔是电力贸易协议的出口方，但印度才是贸易规则的制定方。印度在《跨境电力贸易指南》中严格规定“只有印度政府、印度国营企业拥有或资助的项目，或印度实体持股超过51%的私营企业项目，才有资格向印度出口电力”，^[2]要求尼孟两国必须使用印度输电线路和其他基础设施进行电力贸易，同时限制尼泊尔只能出口由印度投资开发的水电。^[3]此举达到限制中国对尼水电投资的目的，但也损害了邻国的主权利益，给印度的邻国关系埋下隐患。

“印度优先”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相叠加，还助长了南亚邻国的反印情绪，导致多个互联互通项目难以实施。^[4]其中，孟加拉国的情况最为明显。近年来，印度将孟加拉国视为地区互联互通的重要支点，大力发展双边跨境基建。2024年6月，时任孟总理哈西娜访印期间，两国签署一项连接印度东北部地区和孟加拉国的跨境铁路协议。然而，孟国内普遍担忧印度在国家安

[1] 曹冲、陈剑扬、陈子帅：《印度“大婆罗多”叙事为何惹怒多国》，《环球时报》2024年8月13日，第7版。

[2] 楼春豪、马宗绪：《“邻国优先”下，印度不断巩固“南亚后院”？》，《世界知识》2022年第13期，第20页。

[3] 此次三方协议出口的电力均来自印度支持开发的尼泊尔特里舒利及奇利梅水电项目。参见《尼泊尔开始向孟加拉国出口电力》，中新网，2024年11月15日，<https://www.chinanews.com/gj/2024/11-15/10320041.shtml>。

[4] Chilamkuri Raja Mohan, “India and South Asia: The Elusive Sphere of Influence,” ISAS Insights, January 6, 2022, <https://www.isas.nus.edu.sg/papers/india-and-south-asia-the-elusive-sphere-of-influence/>.

全、利益分配、主权等方面的控制，反对党甚至将此协议贴上“反国家”标签。同年8月，哈西娜在大规模公众抗议中被迫辞职并前往印度。这一事件引发孟民众对印度的强烈不满，激化孟国内“印度退出”（India Out）和抵制印度商品的运动，两国在建的多个互联互通项目被无限期推迟。^[1]由此可见，如果印度无法真正摆脱霸权思维，无法与邻国构建平等关系，其雄心勃勃的地区互联互通计划将难以持续。

第二，地区战略环境日趋动荡增加印度战略拓展的难度。印度发展地区互联互通的地理范围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孟加拉湾、南亚次大陆、印度洋、东南亚、中东和中亚。然而，当前这些区域的战略和安全环境均不同程度地趋于动荡。在孟加拉湾次区域，学生抗议引发哈西娜下台，缅甸军政府与地方武装持续争斗，以及印度难以消除曼尼普尔邦的种族暴力等，都说明印度在其“近东”正遭遇困局。维持该地区政治稳定从来都是印度的优先考虑，而非经济机会。^[2]

在更广泛的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印度试图构建“BBIN+”互联互通网络，增强斯里兰卡对印度的经济依赖，排除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影响力。但斯里兰卡对印度存在的主权和安全担忧、当地需求与大型基建项目的错位等问题增加了斯印合作的变数。^[3]印巴关系是印度在印度洋地区拓展互联互通的更大障碍。印度无意改变孤立巴基斯坦的政策，致使印巴僵局始终是其整合地区联通的障碍，即便是借由伊朗联通中亚和中东的项目也会受到巴安全局势外溢的影响。此外，阿富汗是印度几乎所有西向联通计划绕不开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TAPI天然气管道项目有774公里管道将穿越阿富汗，但

[1] Srinand Jha, “New Line from India to Bangladesh Postponed Indefinitely,” *International Railway Journal*, August 14, 2024, <https://www.railjournal.com/infrastructure/new-line-from-india-to-bangladesh-postponed-indefinitely/>.

[2] Avinash Paliwal, *India's Near East: A New History*, Hurst Publishers, 2024.

[3] Akankshya Ray, “Vision Versus Reality: The Promise of India-Sri Lanka Connectivity,” *Stimson Center*, December 8, 2024, <https://www.stimson.org/2024/vision-versus-reality-the-promise-of-india-sri-lanka-connectivity/>.

目前仅完工约 3 公里。^[1]

被印度寄予厚望的“印欧经济走廊”同样前途未卜。除了资金问题，2023 年 10 月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中东安全局势也给其前景蒙上阴影。作为该项目关键枢纽的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次中断，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关系再度紧张。印度曾为加入“印欧经济走廊”投资数十亿美元购买以色列海法港的使用权，而随着巴以冲突的持续升级，这一投资面临巨大风险。^[2]

此外，泛安全化趋势的加强也对印度发展新兴领域的互联互通合作构成潜在威胁。在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南亚东南亚的泛安全化现象日益严峻，影响了国家间正常的经济和科技来往。^[3]2021 年 1 月，斯里兰卡的锡兰电力公司宣布将贾夫纳沿海三个岛屿建设混合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合同授予中国信和腾飞混合技术公司，但印度以“第三方安全担忧”为由进行干预，使该项目最终被搁置。2025 年 1 月，斯里兰卡政府突然宣布取消中企在阿纳赖岛可再生能源建设项目的中标资格，并将其授予印能源企业。莫迪政府还多次在国际场合指责“一带一路”将“不可持续债务、不透明贷款行为和不可行项目”与战略意图相结合，给地区国家带来“安全威胁”。^[4]印度的做法加剧了互联互通的政治化和泛安全化，而且未来有可能在其推行的新兴领域互联互通中遭到反噬。

第三，大国竞争的复杂化削弱了印度落实合作项目的能力和效果。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世界变局加速演进，突出表现为大国竞争复杂化。2023 年以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不断在“卡利斯坦运动”、印俄关系、民主人权等问题上挑动印度神经，印度对美国的政治信任已有所下降。

[1] Catherine Putz, “Tiny Steps for TAPI in the Taliban’s Afghanistan,” *The Diplomat*, January 17, 2025, <https://thediplomat.com/2025/01/tiny-steps-for-tapi-in-the-talibans-afghanistan/>.

[2] 巴殿君、冯冠、左天全：《“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评估》，第 49 页。

[3] 叶海林、吴俊、张展毓：《泛安全化现象与南亚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演进》，《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1-23 页。

[4] “Keynote Address by EAM, Dr. S. Jaishankar at the 7th Indian Ocean Conference 2024.”

大国竞争的复杂化还加剧了印度在南亚的战略困境。自 2021 年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后，美国南亚战略被统合到以对华战略竞争为目标的“印太战略”，其对印政策也基于此出发点。^[1]2024 年孟加拉国哈西娜政府倒台，被认为是美国在南亚“暗箱操作”的最突出事例。^[2]印度难以忍受美国一方面将其拉进制华“小圈子”，另一方面却在其“后院”无视其利益。对印度而言，政治干预推翻亲印的孟加拉国政权和挑拨印孟关系是对其核心利益的挑战。尽管印美会因共同的制华目标走到一起，但双方在南亚地区优先事项的差异和对各自地区或全球霸权的维护决定了这种共同行动的有限性。

印度与美国的矛盾在印度地区互联互通合作中已引起连锁反应。2024 年 11 月，美国检察机关对阿达尼集团及包括阿达尼在内的高层领导提起诉讼，指控其贿赂印度政府官员以获取合同，并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欺骗美国投资者，引发印度强烈反应。印人党指控美国国务院试图利用“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OCCRP）为“反莫迪议程”提供弹药，破坏印度稳定，是对莫迪总理和阿达尼发起针对性攻击的幕后黑手。^[3]2023 年，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曾宣布向斯里兰卡提供 5.53 亿美元贷款，与阿达尼港口和经济特区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科伦坡西部码头，遭到美国起诉后，阿达尼公司撤回向 DFC 寻求资助的请求。^[4]此事还引发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与阿达尼集团签订电力交易合同国家的反弹，它们相继宣布严查相关合同。孟加拉国临时政府指派一个委员会，专门审查哈西娜政府与阿达尼集团的电力供应合同。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在胜选前就承诺将“取消与腐败的阿达尼集团的交

[1] Elizabeth Threlkeld and Elizabeth Zazycki, “Revive the South Asia Strategy,” Stimson Center, November 26, 2024, <https://www.stimson.org/2024/revive-the-south-asia-strategy/>.

[2] 王旭：《南亚：动荡、转型和调整不断深化》，《世界知识》2024 年第 24 期，第 31 页。

[3] “U.S. State Dept. Behind Anti-Modi ‘Agenda’: BJP,” The Hindu, December 7, 2024,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us-state-department-behind-the-agenda-of-targeting-modi-and-india-says-bjp/article68956034.ece>.

[4] “Adani Ports Withdraws DFC Funding Request for Colombo Port Project,” Reuters, December 11, 2024,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finance/adani-ports-withdraws-dfc-funding-request-colombo-port-project-2024-12-10/>.

易”，斯社会各界呼吁全面审查阿达尼在斯电力项目。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也宣布暂停对阿达尼公司的任何新投资。在美西方和重要邻国的双重“围剿”下，印度企业信誉受挫，令印度倚重美欧外援以推进互联互通的既定蓝图陡增变数。

四、结语

近年来，莫迪政府将互联互通置于其地区战略的突出地位，初步构建起一个以南亚次大陆能源互联互通、印度洋枢纽港口和海上走廊、双多边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和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为支柱的地区互联互通体系。与第一任期将“一带一路”作为假想敌，不断引入外部制衡开展竞争的逻辑相比，印度此番战略升级主要立足于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内生动力，致力于通过互联互通推动国家民族资本扩张，重构“海洋印度”身份和战略，保障关键基础设施供应链安全，以及推动国家建构和地区塑造。换言之，升级地区互联互通不仅是印度参与大国竞争的手段，更是其重新定义地区权力并利用地缘优势营造国内发展与外部环境良性互动的战略选择。

从中印关系维度看，印度升级地区互联互通意味着中国需要正视印度的发展潜力，同时要开始适应一个更为自信、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但又不得不与中国维持平衡关系的印度。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优先”外交政策的驱动下，中印在共有周边的竞争态势料将延续；但在多极化趋势和特朗普回归的背景下，中印之间也出现新的合作机会。一是在国际规制方面，由于美国倾向于破坏既有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下降，中印作为新兴大国，有机会在数字赋能、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等领域开展互补性合作，携手为“全球南方”提供领导力。二是在地区战略上，印美在地区优先事项上的分歧暴露两国战略合作的局限性，特朗普政策的不可预测性更加剧印度的担忧。印度缓和与中国的关系，维持与俄罗斯的特殊友谊，积极与中亚、东盟、中东国家开展互联互通合作，均说明印度在地区战略上不

会唯美“马首是瞻”；相反，为了对冲美国对其国内政治和地区利益的损害，印度或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此，中印有机会在实现“地区共进”^[1]的战略层面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并推动互联互通多个领域的合作。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具有超越地缘竞争的价值和意义。“一带一路”既是推进国内经济与外部市场深度融合的首要合作平台，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实现路径。对印度互联互通政策给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一方面应加强风险评估和管理，保障“一带一路”项目在南亚顺利推进；另一方面应专注于正向赋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回应南亚国家应对能源危机、通胀和经济转型压力的需求，细化合作内容，讲好现代化故事，塑造地区民众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正面认知。此外，中国应为地区国家发展多元互联互通提供平台，支持地区国家深化区域合作，欢迎地区国家参与“大金砖合作”，并为中国、印度与地区国家合力推动全球治理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吴劲杰】

[1] 蓝建学：《中印关系嬗变及出路》，《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3期，第71页。

全球深海竞争态势、影响及治理^{*}

□ 李雪威 于宗耀

〔提 要〕近年来，深海新疆域成为国际竞争新高地，全球深海竞争呈现议题安全化、空间军事化、阵营复杂化、规则缺失化等态势。这些新态势的出现，与科技进步和深海治理水平的落差、国际海洋规范的分歧争论，以及大国在深海领域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密切相关。议题安全化增加深海开发阻力，空间军事化加剧深海军备竞赛，大国博弈干扰深海治理进程，规则缺失化导致深海竞争无序。为有效应对深海竞争新态势，国际社会应凝聚深海治理的广泛共识，健全深海治理合作的机制框架，推动深海治理规则制定，并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深海科研、开发与治理方面的话语权和能力。

〔关 键 词〕深海竞争、深海地缘政治、海洋规范、深海安全治理

〔作者简介〕李雪威，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 / 边疆治理研究院教授
于宗耀，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5.9, P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5) 4 期 0088-19

深海蕴藏着人类未来生存发展所需的资源和空间，承载着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注。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深海作为资源争夺的新领域、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专项（编号：24VHQ019）的阶段性成果。

军事竞争的新空间、大国角逐的新战场、规则博弈的新阵地，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深入剖析全球深海竞争新态势，评估其影响，并探索新形势下深海治理的策略，对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全球深海竞争新态势

近年来，随着陆地矿产等资源的日益稀缺，人类走向深海的步伐不断加快，介入深海的程度持续加深，引发的深海竞争也日趋激烈，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议题安全化

部分西方国家在深海资源开发、海底电缆铺设等议题上呈现泛安全化倾向，渲染所谓深海安全威胁，侵蚀国际行为体间的战略信任，加剧深海地缘政治竞争。深海蕴藏丰富的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多金属硫化物等矿产资源，其富含的铜、钴、镍、锰等重要材料是绿色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的关键支撑。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资源的依赖，指责中国“通过生产过剩和掠夺性定价保持对全球关键矿产供应的控制”^[1]，以保障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安全为由，在深海矿产资源开发领域强化对中国的竞争态势。为此，美国与法德等欧盟成员国、环保组织、部分西方媒体将深海资源开发与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环境安全等问题深度捆绑，通过“威胁叙事”挑动部分国家和企业对事态紧迫性和自身安全利益的过激反应；炒作“中国威胁论”，将深海资源开发议题安全化作为遏压中国的工具。

海底电缆是维系全球信息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础设施，承担着全球九成以上的通信和数据流量。美国为保持在海底电缆领域的竞争优势，肆意泛化国

[1] “Western Countries Join Forces to Break China’s Grip on Critical Minerals,” Harici, September 23, 2024, <https://harici.com.tr/en/western-countries-join-forces-to-break-chinas-grip-on-critical-minerals/>.

家安全概念，炒作海底电缆安全问题，^[1]污蔑中国企业参与海底电缆业务危及商业和军事数据安全，以国家安全为由排挤中国海缆企业。2024年9月，美国联合欧盟、英国、日本等发布《全球数字化时代关于海底电缆安全与韧性的联合声明》，试图通过“联合管控”来限制中国企业。^[2]同年11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启动海底电缆许可规则全面审查，禁止华为、中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被列入所谓通信设备服务“风险名单”（Covered List）的外国公司获得海底电缆登陆许可，并禁止在海底电缆设施中使用这些公司的设备或服务，进一步操弄海底电缆议题。^[3]

（二）空间军事化

深海空间具有高压、无光、通透性差、水文环境复杂等特点，难以被全面感知，是进行隐蔽性军事行动与突然性攻击的理想场域。近年来，深海空间的大国战略竞争愈演愈烈，军事化程度与范围均大幅拓展。

第一，主要军事大国强化对深海空间军事价值的认知，凸显深海作战的重要性。俄罗斯于2019年8月修订《2030年前海洋活动发展战略》，强调开发用于监测水面、水下和空中态势的综合监视系统，为海军活动提供信息支持。^[4]美国于2020年12月发布《海上优势：拥有集成化全域海上力量》，提出发展先进装备以巩固水下作战优势，改进水下综合监视系统，建造具备监视与打击能力的无人水下潜航器。^[5]法国于2022年2月发布《海底战战略》，

[1] Daniel Runde, Erin Murphy and Thomas Bryja, “Safeguarding Subsea Cables: Protecting Cyber Infrastructure ami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CSIS, August 2024,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2024-08/240816_Runde_Subsea_Cables.pdf.

[2] “Joint Statement on the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of Undersea Cables in a Globally Digitalized World,”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26, 2024, <https://2021-2025.state.gov/joint-statement-on-the-security-and-resilience-of-undersea-cables-in-a-globally-digitalized-world/>.

[3] “US Agency Votes to Launch Review, Update Undersea Telecommunications Cable Rules,” Reuters, November 22, 2024,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media-telecom/us-agency-votes-launch-review-update-undersea-telecommunications-cable-rules-2024-11-21/>.

[4]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08.2019 г. № 1930-п,”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30 августа 2019, <http://government.ru/docs/all/123507/>.

[5] “Advantage at Sea: Prevailing with Integrated All-Domain Naval Power,”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2020, <https://media.defense.gov/2020/dec/16/2002553074/-1/-1/0/triservicestrategy.pdf>.

旨在通过自主 / 遥控水下无人系统，将法国海军的海底监视及作战能力拓展到水下 6000 米。^[1]

第二，智能化无人平台将成为未来深海作战的主角。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无人平台低成本、强隐蔽性、零伤亡、高自主程度等优势在复杂的深海环境中愈发凸显。有关数据显示，2024 年全球军用无人潜航器市场规模达到 39.4 亿美元，预计到 2034 年增长至 82.6 亿美元。^[2] 未来的水下作战方式将由以潜艇为主转变为以无人平台为主，潜艇将作为无人潜航器和其他自主系统的指挥与控制平台，发挥引导作用。

第三，深海作战概念不断创新与丰富，并在演习中得到验证和模拟。深海作战概念是在深海环境中进行军事行动的理论 and 实践框架，包括战术、技术、设备、策略和目标。美国相继提出“空海一体战”水下战、“全频谱反潜战”、深海无人“蜂群作战”等新型深海作战概念，并通过兵棋推演模拟验证其可行性，力图在攻防两端维持较大的深海军事优势。^[3] 俄罗斯则加快深海特种作战概念研究，开发出“波塞冬”战略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寻求突破美国反导系统，维持水下核威慑力。^[4]

（三）阵营复杂化

受深海科学认知、开发能力、环保诉求及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在深海采矿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立场分野日趋复杂，形成“开发霸权派”“环保至上派”“开发促进派”“开发观望派”几大阵营。^[5]

[1] “Les armées se dotent d’une stratégie ministérielle de maîtrise des fonds marins,” Ministère des armées, 18 février, 2022, <https://www.defense.gouv.fr/actualites/armees-se-dotent-dune-strategie-ministerielle-maitrise-fonds-marins>.

[2] “Military 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s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to 2034,” Research and Market, April 2025, <https://www.researchandmarkets.com/reports/6093321/military-unmanned-underwater-vehicles-market>.

[3] 况腊生：《全球深海区域军事化发展论析》，《太平洋学报》2024 年第 6 期，第 77-92 页。

[4] 梁怀新：《国际深海空间军事化趋势及其治理》，《现代国际关系》2022 年第 8 期，第 8-19 页。

[5] 李雪威、李佳兴：《国际社会深海采矿反对其之声的演变、根源与应对》，《太平洋学报》2024 年第 8 期，第 76-89 页。

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却意图在深海领域推行霸权主义，掌握深海矿产资源开发主导权，是不折不扣的“开发霸权派”。自第二任期伊始，特朗普就大力支持深海采矿。2025 年 4 月，他签署“释放美国近海关键矿产和资源”行政令，旨在强化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要求相关部门在该行政令颁布 60 日内，依据《深海海底硬矿物资源法》框架，加速审批国际海底区域矿产勘探与开发许可申请，^[1] 美国深海采矿行业有望迎来快速发展。作为“环保至上派”的主要代表，欧盟则明确反对深海采矿，其主要成员国与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环保组织和企业以环保为由，主张暂停甚至禁止深海采矿。目前，反对深海采矿的国家已增至 38 个。

与此同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在内的“开发促进派”尝试推动深海采矿的可能性。2024 年 1 月，挪威成为首个开放商业性深海采矿的国家，相关许可证的发放尽管因国内政治因素叫停，但前期准备工作仍在持续推进。^[2] 2025 年 4 月，加拿大金属公司（The Metals Company）根据美国《深海海底硬矿物资源法》，向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提交两张勘探许可证和一张商业开采许可证的申请，试图进一步巩固在深海采矿领域的领导地位。^[3] 非洲国家作为长期的“开发观望派”，近年来也在积极进行矿业政策改革，探索参与深海采矿的可能性。

更为复杂的是，即使在一国之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立场也可能有所不同。美国部分议员和采矿企业以减少关键矿产资源外部依赖为由积极推动深海采矿，但夏威夷州等却通过了禁止深海采矿的法案。加拿大与

[1] “Unleashing America’s Offshore Critical Minerals and Resources,” The White House, April 24,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4/unleashing-americas-offshore-critical-minerals-and-resources/>.

[2] “Norway Forced to Pause Plans to Mine Deep Sea in Arctic,” The Guardian, December 2,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4/dec/02/norway-deep-sea-mining-mine-arctic>.

[3] The Metals Company, “World First: TMC USA Submits Application for Commercial Recovery of Deep-Sea Minerals in the High Seas under U.S. Seabed Mining Code,” April 29, 2025, <https://investors.metals.co/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world-first-tmc-usa-submits-application-commercial-recovery-deep/>.

部分西方国家一道以环保为由反对深海采矿，而加拿大金属公司则支持深海采矿，正计划申请开采许可证。^[1] 韩国出于资源供应安全和能源转型的战略考量支持深海采矿，全球冶炼巨头韩国锌业公司是矿产领域首个公开支持加拿大金属公司推动深海采矿的企业，而韩国三星 SDI 公司则加入暂停深海采矿的请愿行列，表示拒绝采购海底金属及对其投资。^[2]

（四）规则缺失化

随着深海技术进步与实践创新的快速演进，关于深海军事行动、资源开发、利益分配、环境保护等规则的制定和供给出现严重空缺或滞后。尽管既有国际协议为深海活动提供了基本框架，但仍存在环保法规不完善、利益分配规则不明确、军事活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导致资源开发利用、公海环境保护、军事活动管控等重要议题游离于有效规制之外。

一是深海开发规章的缺失。国际海底管理局（ISA）虽已制定三份探矿和勘探规章，但开发阶段的规章仍未出台。受生态环境认知、行为体利益分歧、地缘政治意识的影响，环境保护标准的制定和执行机制、矿产开发收益的分配方案、技术转让的具体要求等核心问题尚未形成明确规范。^[3]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以下简称BBNJ协定）为海洋遗传资源利用和惠益分享提供了法律框架，但具体技术标准、技术导则、议事规则等，有待协定生效后进一步磋商确定。^[4] 这种规章缺失反映了深海治理面临的制度性挑战，凸显平衡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各方利益诉求的复杂性。

[1] “Deep-Sea Miner TMC Plans to Be Ready to Apply for Licence,” July 24, 2024, <https://www.mining.com/deep-sea-miner-tmc-ready-to-apply-for-licence/>.

[2] Yusuf Khan, “Korea Zinc Backs Trump Plan for Deep Sea Min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6, 2025, <https://www.wsj.com/articles/korea-zinc-backs-trump-plan-for-deep-sea-mining-f4b9a3fc>; K. Warner, “The Changing Tides of Deep-Sea Mining,” Metal Tech News, September 16, 2024, <https://www.metaltechnews.com/story/2024/09/16/critical-minerals-alliances-2024/the-changing-tides-of-deep-sea-mining/1916.html>.

[3] 李雪威、李佳兴：《国际社会深海采矿反对之声的演变、根源与应对》，第76-89页。

[4] 张海文：《全球海洋治理新进展及其影响——以BBNJ协定为例》，《中华环境》2023年第9期，第27-29页。

二是公海保护规则的缺失。目前，公海保护相关国际法规则碎片化，国际组织与区域协议之间的协调不足。虽然 BBNJ 协定在划设保护区时遵循“不妨害”原则，但国际海事组织（IMO）、区域渔业组织和国际海底管理局等已在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分别划设了不同类型的保护区域。在实践中，如何在相同海域执行不同规定并做到“不妨害”上述保护区的存在将是严峻的考验。^[1]此外，BBNJ 协定规定在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划设保护区制度，将进一步刺激各方围绕公海捕鱼、深海采矿、海底电缆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与博弈。上述问题需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法律框架的完善来解决。

三是军事安全规则的缺失。虽然《海床军备控制条约》《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对深海军备竞赛具有一定约束作用，但其效力明显不足。^[2]《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调国际海底区域和平利用的原则，《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旨在减少误判和避免碰撞，二者在深海军事活动监管方面都存在明显局限性。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与深海武器技术的快速发展，深海作战呈现智能化与无人化态势，研发和部署多功能无人平台成为军事大国深海角力新焦点。而在国际深海地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相关条约对人工智能自主武器等新型装备的监管严重不足。^[3]

二、全球深海竞争态势的演进逻辑

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全球深海竞争呈现的新态势，与科技进步和深海治理水平的落差、国际海洋规范的分歧争论，以及大国在深海领域的地缘政治博弈密切相关。

[1] 张海文：《全球海洋治理新进展及其影响——以 BBNJ 协定为例》，第 27-29 页。

[2] 以《海床军备控制条约》为例，该条约存在三个主要缺陷：第一，部分明确拥核的国家（如法国）或被认为拥核的国家（如以色列）并未加入条约；第二，条约条款的模糊性影响其实际约束效力；第三，该条约未能涵盖包括恐怖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参见 Edwin Egede, *The Law of the Seabed*, Leiden: Brill Nijhoff, 2020, pp.185-210。

[3] 梁怀新：《国际深海空间军事化趋势及其治理》，第 14 页。

（一）科技进步和深海治理水平的落差

科技进步是深海竞争态势演变的物质基础，重大技术变革驱动海洋实践的迭代升级，推动人类海洋活动从近海走向远洋，从海面拓展至海底。然而，深海治理水平与科技进步相比存在显著滞后性。科技进步促使人类活动向深海空间拓展，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共商共建共享”等海洋治理价值目标在深海领域得到更广泛认同。这些理念强调深海资源开发需兼顾经济效益、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但国际社会对如何平衡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权益分配与成果普惠、科技创新与技术共享等问题仍未形成共识，这种治理理念分歧加剧深海领域的竞争与对抗。

科技进步在提升深海活动效率的同时，也催生新的治理问题。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核能在深海实践中的应用，但海底核安全风险随之产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无人潜航器和海洋数据成为深海开发的重要工具，但也带来数据安全方面的挑战，以及无人潜航器的法律地位等争议。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海洋治理体系未能就新技术衍生的治理问题提出相应规制，难以有效约束日益频繁的深海实践活动。

随着科技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系统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参与深海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然而，深海领域尖端技术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科技巨头手中。这些行为体凭借资金、知识、人才等优势，掌控深海采矿、生物、环境、军事等领域的关键技术，并阻止其他行为体获得相关技术，从而垄断深海治理话语权，限制其他行为体在塑造深海议题、制定深海规则过程中的参与度与影响力。

（二）国际海洋规范的分歧争论

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进，深海领域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全球治理议题，并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场域，围绕深海权益的竞争日趋激烈，广为接受的规范尚未形成。“海洋自由”（freedom of the seas）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这两种海洋规范虽然在《联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整合,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争议和冲突。两大海洋规范之间的争论是推动当前深海竞争态势演进的内生动力,其争论焦点在于深海空间究竟应该遵循自由使用还是统一管理的原则,由此也塑造了不同行为体在深海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政策导向。

在深海军事活动上,“海洋自由”规范基于垂直延伸理论,认为深海空间是公海自由的延续,公海自由原则应垂直延伸至其下的水体和海床,并进行功能性解释,强调某些军事活动需要深海空间。^[1]“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规范则坚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百四十一条“专为和平目的利用‘区域’”规定,反对在深海部署军事装备和设施,主张限制军事情报收集活动,要求军事科研活动接受国际监督。^[2]

在深海开发上,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坚持“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强调深海矿产资源属于全人类共有,资源开发的收益也应公平分配,主张国际海底管理局是唯一有资格批准海底资源开发的机构。而发达国家坚持“多元开发制”,即国际海底管理局应只负责颁发执照,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勘探开发应由具有充足资金、掌握相关技术的国家、企业等进行。^[3]

在深海开发技术问题上,“海洋自由”规范提倡市场主导的技术交易,“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要求实施强制性技术转让政策,确保“全球南方”国家获得必要的技术支持。在深海生物基因资源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主张,国际海底区域的资源属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其所带来的惠益应由所有国家共享;但发达国家指出,深海海底资源仅指矿产资源,新发现的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应按照“海洋自由”原则先到先得,不存在利益共享。2023年通过的BBNJ协定尽管涵盖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确立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宗旨,并设立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制度,但未来还会有更多

[1] Bernard H. Oxman, “The High Sea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rea,”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 1989, p.526.

[2] Michael W. Lodge, “The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27, No.4, 2012, pp.733-742.

[3] 刘明周:《海底治理的特征与世界政治新理念》,《学海》2023年第3期,第88-95页。

资源被挖掘，围绕资源惠益分享等问题而展开的规范争论仍将继续。^[1]

（三）大国在深海领域的地缘政治博弈

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是全球深海竞争态势演进的直接动力。随着世界政治回归现实主义，海洋大国纷纷将深海视作谋求经济、军事等领域战略优势的新疆域。

深海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关键材料，特别是一些战略性元素在储量和品位上相较陆地展现出巨大潜力。^[2]在数字化、绿色化双转型背景下，大国围绕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的竞争日趋激烈，而关键矿产在两类技术必需的基础元件——高端芯片、新能源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焦点。美国与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出于对中国主导深海矿产资源开发的担忧及意识形态偏见，以舆论污名化、扩容关键矿产联盟等手段，拉拢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分化日韩等“开发促进派”国家，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中的治理权与战略新兴产业中的竞争力，迟滞中国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进程。^[3]

深海提供强隐蔽性、高灵活性、强威慑力的水下作战空间，深海作战能力成为影响未来海战胜负的关键因素。因此，主要大国加快深海军事部署以争取未来海战主动权。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认为其海上优势受到中俄所谓“反介入与区域拒止”（A2/AD）能力提升的威胁，加速制定深海作战发展规划，研发深海作战先进装备，完善深海作战组织架构，提升深海军演频次强度，谋求制深海权。俄罗斯将深海视为部署核潜艇、提高对北约核威慑力的理想场所，把核潜艇改装为多功能平台，使其能够携带微型潜艇和无人潜航器，执行多样化的深海任务。

[1] 张海文：《全球海洋治理新进展及其影响——以BBNJ协定为例》，第29页。

[2] James R. Hein et al., “Deep-Ocean Mineral Deposits as a Source of Critical Metals for High- and Green-Technology Applications: Comparison with Land-Based Resources,” *Ore Geology Reviews*, Vol.51, 2013, pp.1-14.

[3] 惠春琳：《美国对华关键矿产战略布局及其制约》，《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3期，第82-94页。

深海规则的制定深刻影响深海秩序的构建和未来全球海洋战略格局的走向。部分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优势，通过设定技术标准、生态阈值以及专利布局，意图主导深海产业的发展方向，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并限制竞争对手的发展空间。此外，部分西方国家凭借其海外小岛屿的地理优势、数据资源及监管能力，在 BBNJ 协定通过后优先从自身利益出发划设公海保护区，以合法化手段实现对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的实际管控，进而排斥其他国家参与保护区的管理与利用。^[1] 美国通过与其他西方国家签订“互惠国协议”，^[2] 压制“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海底管理局中的影响力，公开与国际海底资源开发制度相抗衡。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积极谋求参与深海规则制定，推动建立可操作的惠益分享机制。中国等新兴大国积极参与采矿规则制定和资源分配决策，推动相关技术创新和国际标准制定，通过国际合作共享技术和经验，不断提升在国际海底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全球深海竞争加剧的影响

全球深海竞争态势的不断演进，或将增加深海资源开发阻力，加剧深海军备竞赛，干扰深海治理进程，导致深海竞争失序。这势必制约国际社会深海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不利于公平、合理、有序的深海秩序形成。

（一）议题安全化增加深海开发阻力

深海议题的泛安全化与意识形态化，导致深海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转变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这将损害深海资源开发的公平性，阻碍相关技术合作项目的开展，破坏深海开发合作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一，损害深海资源开发的公平性。部分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竞争考量，

[1] 郑苗壮：《地缘政治视角下公海保护区的发展与演变》，《世界知识》2021 年第 1 期，第 19-21 页。

[2] 王金强：《国际海底资源分配制度演变与美国海底政策的转向》，《美国研究》2012 年第 3 期，第 54-76 页。

蓄意打压竞争对手，以威胁叙事夸大深海活动的安全风险，通过设置环保壁垒、技术封锁等手段，限制他国正当的深海开发活动。这种做法不仅延缓深海规模化开发进程，而且影响正常的环境保护合作。

第二，阻碍技术合作项目的开展。议题安全化导致深海安全因素受到过度关注，反而忽略议题本身的技术性、专业性特征与需求，使许多重要的技术合作项目难以开展。在深海环境监测、生态评估等领域，各方亟需通过共享数据和技术提升全球深海治理能力，但过于关注自身安全而限制数据共享和技术交流，将造成全球深海环境数据严重缺失，降低深海治理的评估科学性和决策准确性。^[1]

第三，破坏深海开发合作的国际舆论环境。部分西方国家炮制“中国深海威胁论”，企图煽动国际社会的对立情绪，削弱中国深海开发的合法性与道义基础。例如，中国的深海采矿勘探活动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无端污蔑，被指具有商业和军用双重性质。它们妄称，中国可能利用在库克群岛周边海底的准入机会，开展水文测绘任务，而这类任务对反潜作战等水下军事行动具有重要意义。^[2]

（二）空间军事化加剧深海军备竞赛

潜艇、无人潜航器、水下无人机等武器装备是大国深海军事竞争的重要工具。深海军事化态势会加剧以核潜艇为核心的核军备竞赛和以无人平台为主的常规军备竞赛。

第一，助长海底核军备竞逐。美英帮助澳大利亚建设核潜艇的举动，进一步凸显核扩散问题。用于核潜艇燃料的高浓度铀可免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审查，逃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约束，美英澳利用这一漏洞开创先例，或引

[1] Daniel F. Runde, “Safeguarding Subsea Cables: Protecting Cyber Infrastructure ami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CSIS, August 16,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afeguarding-subsea-cables-protecting-cyber-infrastructure-amid-great-power-competition>.

[2] Darshana M. Baruah, “Uncharted Territory: Deep-Sea Mining and the Underwater Domain,” March 25, 2025, <https://www.iiss.org/online-analysis/online-analysis/2025/03/uncharted-territory-deep-sea-mining-and-the-underwater-domain/>.

发其他国家效仿，寻求建造核动力潜艇，增加海底核军备竞赛风险，破坏现有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并严重威胁全球海洋安全环境。

第二，激化新型深海武器竞赛。无论是俄美等军事强国，还是军事力量相对弱小的国家，都重视无人平台在深海军事行动中的作用。发展无人平台既可被视为提升监视能力、保护本国专属经济区和海上基础设施的防御举措，也可被当作执行反潜作战、布雷和摧毁敌方基础设施的进攻行为，这种意图的模糊性将增加军备竞赛风险。与此同时，面对越发强劲的海上威慑，军事力量相对弱小的国家也将转而大力发展水下能力，通过建设海上非对称能力予以回应，客观上造成紧张局势的螺旋式升级。

第三，推高海底意外冲突风险。无人平台的涌现与广泛部署，或降低以弹道导弹为代表的海基核力量的可信度和有效性。^[1] 无人机、无人船、无人潜航器通过执行海底监控、情报收集、海底地图绘制等功能捕捉潜艇踪迹，在反潜战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无人平台的自主性虽在增强，但受制于其“黑箱化”的运行模式，在遭遇外部黑客攻击与“数据投毒”时，容易出现算法紊乱，使处于深海的无人潜航器做出超出战斗人员预期的行动，从而酿成意外军事冲突，增加深海军事危机的可能性。^[2]

（三）大国博弈干扰深海治理进程

深海新疆域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国博弈使国际社会围绕深海主导权和话语权的竞争日趋激烈，主要行为体在深海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空间利用等议题上的认知与政策分歧不断扩大，严重干扰深海治理进程。

第一，加剧深海治理过程中的摩擦。近年来，主要大国深海博弈持续升温，中小国家则因自身能力不足处于边缘地位，在大国角逐中选择追随或对冲。在深海治理过程中，不同国家在优先事项和规则制定上存在显著分歧，加剧

[1] Keir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Future of Nuclear Deterr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1, No.4, 2017, pp.9-49.

[2] 张景全、于宗耀：《人工智能军事化与海洋安全：风险与应对》，《国际论坛》2024 年第 4 期，第 27-47 页。

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国际规则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影响深海治理共识的形成，导致深海资源争夺战和环境破坏风险升级。

第二，削弱深海治理机构的权威性。大国博弈程度加深导致国际海底管理局在协调各方利益时面临严峻挑战。例如，由于美国尚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从一开始就反对国际海底管理局框架的某些部分，其绕过国际海底管理局、单方面推进深海矿产资源开发的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就成为备受争议的问题。^[1] 美国这种行为或引起他国效仿，削弱国际海底管理局权威。国际海底管理局如不能有效平衡各方利益，可能逐渐失去成员国的信任与支持，^[2] 这将逐渐削弱其决策效力和执行能力，增加深海治理的不确定性。

第三，增加深海治理的成本。主要大国在深海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空间利用等重要议题上的立场差异不断扩大，导致深海治理成本急剧攀升。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和共识，国际社会在环境评估、技术规范、军事安全等问题上难以快速达成一致，不得不投入更多时间进行协商谈判。这不仅延长决策周期，推高谈判成本，还可能因分歧加剧而被迫增加额外的安全保障资源投入。

（四）规则缺失化导致深海竞争无序

深海规则的缺失化使相关活动缺乏有效规制，这种规则真空极易导致各类行为主体的无规行动，造成军事行为失范、监管漏洞频出、信息共享受阻等不良后果，加剧深海无序竞争。

一是军事行为失范。在深海军事活动方面，现有规则无法有效规范人工智能武器和无人装备的使用。虽然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组织等非法武装团体发动水下袭击的案例并不多见，但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与无序扩散，无人潜航器等自主武器或将更易获取，并被用于攻击海底目标，如切割海底电缆或

[1] Tom LaTourrette and Douglas C. Ligor, “New Turmoil in Regulating Deep Seabed Mining on the High Seas,” Rand, April 28, 2025,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5/04/new-turmoil-in-regulating-deep-seabed-mining-on-the.html>.

[2] Guillaume Delacroix, “Politics Are Polluting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General Assembly,” Le Monde, July 22, 2024, https://www.lemonde.fr/en/environment/article/2024/07/22/politics-are-polluting-the-international-seabed-authority-general-assembly_6693218_114.html.

破坏海底管道。^[1] 自主武器的滥用将削弱道德约束，降低武力使用的门槛，毁坏民用基础设施，威胁海上活动人员的安全。

二是产生监管漏洞。在资源开发方面，某些沿海国家和地区可能成为监管洼地。部分国家和企业采取规避策略，在监管松弛的区域进行不合规的深海开发，损害全球深海生态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例如，在西非地区，由于对深海渔业活动监管不力，非法捕捞活动猖獗，全世界 20% 的非法捕捞来自该地区，尤以深海拖网渔业最为严重。^[2]

三是制约信息共享。规则缺失还影响到深海科研活动的开展和数据共享。在没有统一数据采集标准和信息共享机制的情况下，各方获取的深海科学数据难以有效整合和利用，不利于全面把握深海环境和资源状况，进而阻碍科学决策和有效治理措施的制定。这种数据信息割裂状态不仅造成科研资源的重复投入和巨大浪费，也拉大了各国在深海认知上的信息鸿沟，最终严重制约国际深海科研合作的深入开展和协同创新。

四、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深海治理

随着全球资源需求的持续攀升，人类向深海进发步伐不断加快，各国在资源分配、技术标准、环境保护以及军事竞争等领域的博弈日益激烈。发达国家为确保自身利益，凭借技术优势和规则主导权，强调高标准环保、技术门槛和军事存在；“全球南方”国家则呼吁资源公平分配、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主张通过多边合作实现深海资源的普惠共享，反对军事化倾向。中国是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进深海治理。面对深海竞争发展态势，国际社会应凝聚深海治理共识，完善深海治理机制，推动深海规则制定，提升“全球南方”的深海治理能力。

[1] “Houthi Lethal Underwater Drones Adds New Threat to Red Sea,” USNI News, February 19, 2024, <https://news.usni.org/2024/02/19/houthi-lethal-underwater-drones-adds-new-threat-to-red-sea>.

[2] Africa Defense Forum, “Six West African Countries Account for 20% of World’s Illegally Caught Fish,” March 14, 2023, <https://adf-magazine.com/2023/03/six-west-african-countries-account-for-20-of-worlds-illegally-caught-fish/>.

（一）凝聚深海治理共识

当前，西方国家的深海治理理念和价值观日益单边化、阵营化，“全球南方”国家参与深海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也因西方的排他性行为而受到忽视和限制。这严重阻碍国际社会在深海治理领域形成多边共识，导致各国在治理目标和行动上难以达成一致。

在深海治理领域达成国际共识是实现深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共商、共建、共享，蕴含共同的利害关系，倡导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统一，具有丰富的内涵与重要的实践价值，是对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创新与发展。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西方海洋实力至上的霸权逻辑与集团政治的小圈子思维，兼顾海洋生命与非生命伦理价值，为深海治理提供了新的价值导向，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在深海治理中形成共同价值观和治理目标，营造良好的深海开发与治理秩序。

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角度来看，实现海陆联通，开拓深海时代，已成为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使命。^[1] 在深海领域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既契合深海空间各行为体、海洋生命与非生命之间共生共存的现实，也孕育着深海共治共享的广阔前景。国际社会应积极在深海采矿、深海基因资源开发利用、深海环境保护等领域协调利益诉求、达成治理共识，吸纳国家、国际组织、企业、科学家、普通公民等多元主体参与深海治理。具有发展优势的国家应积极提供包括资金、技术、知识、基础设施在内更多更好的深海治理公共产品，强化深海科学探索的国际合作，使科学发现服务于深海治理政策与行动，以实现深海资源共享与公平利用。与此同时，中国应致力于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各种涉海国际性法律文件，提高中国海洋治理话语的国际法位阶。^[2]

[1] 王义桅：《理解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三个维度》，《当代亚太》2022年第3期，第4-25页。

[2] 吕鸣：《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权建构》，《国际观察》2023年第2期，第102-131页。

（二）完善深海治理机制

国际社会应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个别国家建立小圈子、小多边机制等试图垄断深海治理的行径，持续推动深海治理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为防范部分西方国家分化“全球南方”群体，应加强“77国集团+”机制的作用，提高其在深海采矿开发规章以及BBNJ协定中有关惠益分享、海洋保护区设立、环境影响评价、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等规则制定或完善过程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中国可继续推动既有合作平台下的深海资源开发合作，并拓展新的合作平台。2024年10月，中方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期间宣布建立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同月，中韩召开第十一次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合作会议，达成加强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规章制度立场协调、支持中韩海洋科学共同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等多项共识；中日举行第十七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也就海洋环保、海洋科研等领域合作进行深入沟通。2025年2月，库克群岛海底矿产管理局与中国上海交通大学、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和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等多家机构开展对话，以推进可持续海底勘探。

此外，中国致力于推动深海和平利用机制的建立，主动搭建双多边深海军事安全合作对话平台。2024年4月，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第19届年会首次成立无人系统议题研究工作组，中国担任协调国，这标志着各方开始重视深海无人军事装备的规则构建。^[1]未来，中国可在联合国框架下提出信息共享机制，鼓励各国定期报告其深海军事活动，包括海底探测、海缆布设、深海战略设施建设等内容，这将有助于消除误解，避免误判和冲突。

（三）推动深海规则制定

国际社会应严格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章制度，同时推动在其框架下补充制定相关规则。在深海资源开发领域，应根据最新科学研究成果，

[1] “China Is Committed to Resolving Maritime Disputes Through Talks, Official Says,” Reuters, April 22,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china-is-committed-resolving-maritime-disputes-through-talks-official-says-2024-04-22/>.

及时修订现有深海采矿、能源开采的法律和规则，要求行为体进行更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根据开发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风险，及时采取保护性措施，确保开发与生态的平衡。在深海军事领域，为遏止军事化势头，应制定有关深海军事行动的具体规则，规定各国军事行动的边界与底线，明确深海军事行动范围、设备使用、适用技术等方面的规则，防止军事活动对深海资源开发造成过度干扰；也可设置深海军事禁区，限制深海采矿区域、海底电缆线路、海洋数据采集等重要基础设施周围的军事化活动，避免军事行动干扰商业活动和全球通信。在 BBNJ 协定上，应确保具体实施规则的设计充分尊重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国际海洋法律规则和制度，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相平衡；海洋保护区的划设不应片面强调公海保护、盲目反对开发利用公海和国际海底资源。

（四）提升“全球南方”深海治理能力

“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经验匮乏等问题，在深海治理中处于不利地位。国际社会需通过多边合作与机制创新，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深海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建立全球深海数据共享平台，支持深海采矿、生物基因资源及环境保护相关数据的开放获取，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对深海治理现状的科学认知；建立技术转让平台，推动技术优势国家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深海勘探、监测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先进技术。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可设立全球深海治理发展基金，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加强其在深海资源可持续管理、环境监测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的投入，缩小南北治理鸿沟。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应积极通过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等平台提供国际深海治理公共产品，维护“全球南方”的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呼吁降低技术后发国家参与深海事务的门槛，推动深海治理决策民主化、治理成效最优化、利益分配公正化。^[1]一方面，充分发挥中国—国际海

[1] 杨剑、郑英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新疆域的国际治理》，《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4期，第1-16页。

底管理局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的关键作用，为“全球南方”国家培养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继续推动“数字化深海典型生境”大科学计划，通过构建智能观测系统和相关数字平台促进数据和样品共享，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获取先进技术和数据、公平参与深海科学研究的机会。

五、结语

深海作为人类尚未充分开发的战略新疆域，不仅蕴藏着支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源，更关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面对全球深海竞争日益加剧的新态势，国际社会应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指引，完善深海治理机制建设，推动深海治理规则的协商，持续推进深海治理体系改革；特别要尊重“全球南方”国家在深海领域的合理利益诉求，帮助其公平参与深海治理。同时，各方需协同努力，避免深海新疆域陷入大国军备竞赛的困境或阵营争权夺利的窠臼。唯有包容性合作，才能实现深海科学探索、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多元平衡，构建开放共享可持续的深海发展新格局，推动深海领域的合作共赢。

【责任编辑：母耕源】

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及其对 全球安全格局的影响^{*}

□ 王高阳 刘辞源

〔提 要〕从伊拉克战争到乌克兰危机，私营军事公司深度参与地缘政治冲突，其服务广泛覆盖军事安保与作战、战场情报、军事训练及军备供给等，成为安全事务的重要参与者。私营军事公司为主权国家传统军事力量提供了重要补充，重塑了战争与安全的逻辑。通过提供精准的安保服务、高效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及现代技术驱动的作战模式等，私营军事公司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及“灰色地带”冲突提供新路径。同时，私营军事公司以其市场化机制解构传统的国家军事垄断、军事行动的逐利性逾越战争发起的正当性、资本逻辑消融国家主体性权威，对全球安全格局造成范式性冲击。展望未来，全球安全市场对私营军事公司的需求将继续存在，与之配套的规范建构与制度性约束也将陆续开展；同时，私营军事公司对国家的反噬风险仍存，竞争力亦有可能被新一轮科技革命所重构。

〔关 键 词〕私营军事公司、全球安全格局、军事私营化、安全治理

〔作者简介〕王高阳，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郑州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

刘辞源，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E159, 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5) 4 期 0107-23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身联网的国家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1CGJ04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资助。

有悖于“暴力只能被主权国家合法使用”的大众认知，自14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暴力便开始走向平民化、市场化和国际化。^[1]作为非国家暴力的一种重要形式，雇用外国士兵为本国作战和“战争”自身的历史一样悠久。从古埃及到维多利亚时期的大英帝国，历史上几乎每个帝国都毫不例外地雇用外国军队。^[2]然而，现代意义上的雇佣兵与其中世纪的“前辈”们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他们专业、高度组织化、训练有素，是精通商业运作并且涉足一些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如石油和采矿的商人。^[3]历经数百年的演变，“雇佣兵”已发展为私营军事公司^[4]这一具有高度组织化、体系化、专业化的成熟形式，不仅改变了国际政治和现代战争的规则，而且对国家主权、军事行动以及国际法的理解和应用提出了新的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起，私营军事公司便积极在冷战后全球格局转换阶段的军事冲突地区拓展业务。^[5]资料显示，自1994年到2002年，美国国防部与12家美国私营军事公司签订了3061份合同，估值超过3000亿美元，^[6]有

[1] Thomson J E, *Mercenaries, Pirates, and Sovereigns: State-building and Extraterritorial Viol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

[2] P.W. 辛格：《企业武士：私营军事产业的兴起》，刘波、张爱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3] Seden Akcinaroglu and Elizabeth Radziszewski,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Opportunities, and Termination of Civil Wars in Afric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7, No.5, 2013, pp.795-821.

[4] 一般意义上，私营军事公司（Private Military Company）是指以商业形式提供武装战斗或保安服务的公司；私营安保公司（Private Security Company）则是以市场方式提供预防性安全保障服务的私营企业，其核心是“防御性安全”。与私营军事公司主要为军队服务不同，私营安保公司主要为各类非军事组织提供安全服务。在现实操作中，两类公司的服务范围常常相互重叠、界限模糊，且其行为性质（进攻性或防御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情境下的任务授权与具体执行方式。在西方如《蒙特勒文件》中也使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PMSC）的概念。鉴于此，本文采纳一种更为宽泛的、功能性的定义方式，将“私营军事公司”视为一个涵盖性术语，用以指代所有在冲突或高风险地区受雇提供传统上由国家武装力量承担之军事与安保服务的私营化商业实体。

[5] P.W. 辛格：《企业武士：私营军事产业的兴起》，第11页。

[6] Laura Peterson, “Privatizing Combat,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October 28, 2002, <https://publicintegrity.org/national-security/making-a-killing/privatizing-combat-the-new-world-order/>.

超过 15 万名私营军事公司雇员为美国国防部提供服务^[1]。2003 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私人承包商数量超过了美国作战部队的数量，在印证私营军事公司重要性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政府开展军事和重建活动能力的质疑。^[2] 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和扩张持续至今，其重要性在乌克兰危机中再次显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冲突进程。在冲突中，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使用了私营军事公司，据估计参加战斗的私营军事公司人员约为 35000 人。^[3] 甚至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危机还导致了更多新的私营军事公司的成立。^[4] 所有这些都是私营军事公司在全球安全格局中不断崛起的重要体现。

当今世界，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与以意识形态为底色的各领域竞争日益激烈，各种新旧问题与各类国家利益交织，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全球安全赤字日益加深。在此背景下，私营军事公司正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冲突动态的关键力量，对国家政策和全球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随着国家间冲突复杂性的增加，对私营军事公司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不少国家已开始重视其重要性并愿意为其服务付费。^[5] 然而，私营军事公司在为主权国家提供新的选择和能力的同时，也给传统的国家主权及其军事行动带来了诸多挑战。作为 21 世纪转包和私营化形式中的一种，私营军事公司改变了国际政治和战争的很多规则。^[6] 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复合危机时代”，私营军事公司既可能成为填补安全治理赤字的技

[1] Lindsey Cameron and Vincent Chetail, *Privatizing War: Private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mpanies under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

[2] T. Christian Miller, “IRAQ: Private Contractors Outnumber U.S. Troops in Iraq,” CorpWatch, July 4, 2007, <https://www.corpwatch.org/article/iraq-private-contractors-outnumber-us-troops-iraq>.

[3] Han Bouwmeester, “Mercenary Armies in the Russo-Ukrainian War,” Militaire Spectator, November 18, 2024, <https://militairespectator.nl/artikelen/mercenary-armies-russo-ukrainian-war>.

[4] Ryan Bauer and Erik E. Mueller, “Russian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Thriving Due to War with Ukraine,” The Moscow Times, June 14, 2023,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3/06/14/russian-private-military-companies-thriving-due-to-war-with-ukraine-a81490>.

[5] James O C Jonah, “Foreword,” in Simon Chesterman, and Chia Lehnardt eds., *From Mercenaries to Market: The Rise and Regulation of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vii.

[6] P.W. 辛格：《企业武士：私营军事产业的兴起》，第 10 页。

术方案，也可能异化为战争私营化的危险推手。

传统国际安全研究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分析单元，而私营军事公司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强势介入，既打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家垄断暴力的根本准则，又对现实主义学派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构成挑战。在私营军事公司迅速崛起的背景下，深入研究私营军事公司崛起的动因、对全球安全格局带来的影响及发展前景，并尝试回应当前全球安全格局正在出现的“私营化”转型的核心命题，对于全球安全治理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私营军事公司崛起的多维逻辑

私营军事公司在全球安全格局中的崛起反映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质变迁，这一进程深嵌于战争商业化与安全供给市场化的宏观趋势中，并对主权国家垄断暴力合法使用的共识带来深刻冲击。从本质上来说，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与国际安全局势、国家行为体的战略需求以及私营军事公司的组织形态进化有着重要关联。

（一）国际安全局势的调整与转型：大国战争的退潮与“灰色”战争的涌现

冷战结束后，大国战争退潮，推动当今世界史无前例地走向了一个“大国无战争时代”^[1]。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灰色地带”冲突的愈演愈烈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

“灰色地带”冲突取代大国战争成为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重要发展趋势。冷战结束以来，国家间因历史遗留问题和国家核心利益冲突而引发的小规模冲突持续存在，但重大武装冲突在全部冲突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2]，现代国家间冲突日益呈现小规模、多频次的特征。在乌克兰危机中，俄乌双方在各

[1] 杨原：《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外交评论》2011 年第 4 期，第 96-116 页。

[2] 唐永胜等：《冷战后全球武装冲突的特点及演变》，《现代国际关系》2008 年第 8 期，第 1-9 页。

自的军事行动中融合了传统战争和非传统战争的特点,包括信息战、网络战等。这种混合战争的形式体现了现代冲突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国家间的军事冲突不再是单一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而是包括了多种小规模、多频次、零碎化的战术和策略,这种战争形式可以通过其战略布局的分散性最大程度地减少伤亡和损失,同时也可以达到一定的作战效果。巴尔托什等人指出,非传统的“混合战争”中有非国家行为体的武装组织参与作战行动,包括国际恐怖组织、私营军事公司等。^[1] 私营军事公司为现代国家提供了一种灵活、专业且效率相对较高的军事力量使用方式,同时也为国家在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中提供了更多的战略选择。因此,私营军事公司的介入亦可被视为国家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寻求新的战略工具和手段的表现。

与国家间战争等传统安全风险相比,冷战后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近年来,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一系列新变化:对抗性加剧、冲突性上升、多样化特征更加明显,联动性、突发性、传导性空前。^[2] 2024年,全球恐怖主义事件虽然相较此前下降了22%,但恐怖主义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了22%,平均每起增加了56%,恐怖主义形势仍在恶化。^[3]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态势呈现日益严峻的趋势。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复杂性、隐蔽性、跨国性等特征及其在近年来呈现的专业化、组织化、技术化等发展态势为其治理增加了难度。国际社会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需求日益迫切。在国家积极探索非传统安全威胁新治理模式的过程中,私营军事公司因其灵活性和专业性,能够在某些情况下提供传统国家力量难以提供的服务,进而填补国家治理失能留下的安全真空。

(二) 成本—收益驱动下国家行为体的主权妥协

全球化时代推动了国家海外利益的延伸与扩展,体现在对外贸易、对海

[1] A.A. 巴尔托什等:《混合战争战略和反战略》,《俄罗斯学刊》2020年第2期,第121-136页。

[2] 傅小强、韩立群:《非传统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趋势研究》,《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2期,第88-103页。

[3]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4,”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February 17, 2024, <https://www.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24/02/GTI-2024-web-290224.pdf>.

外关键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对战略通道使用权的获取等方面。海外利益的维护与扩展具有远超于国内环境的复杂性：国际态势复杂多变，各国际行为体在某一特定地域的利益错综相连，旨在维护本国海外利益的行为可能引发“蝴蝶效应”，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对海外利益的过度干预也可能僭越他国主权，在遭受国际社会谴责的同时，亦有引发战争的风险。在此背景下，国家亟需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非政府方式来捍卫自身海外利益。相较于传统军事力量，私营军事公司能够有效帮助国家延伸其在海外的影响，尤其是在传统军事力量难以介入或成本过高的地区。基于此，私营军事公司成为国家在保护自身海外战略资源、设施及政治联盟的关键力量。国家通常通过雇佣私营军事公司来避免直接军事干预，从而降低政治成本并灵活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

首先，私营军事公司成为主权国家规避战争责任与伤亡风险的“道德外包”策略。从责任规避的角度来看，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主题的共识早已深入人心。国家的对外军事行动，除非属于自卫性战争，往往会面临国际社会谴责、国家形象受损、国家间矛盾激化等问题，甚至存在被定性为战争罪的风险。巨大的道德成本使得国家行为体正在逐步减少对战争等军事手段的使用，但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安全挑战仍然存在。国家行为体在面对此类安全威胁和冲突时，通过雇佣私营军事公司执行海外军事行动，至少可以在形式上避免直接的海外军事干预，回避了国际法中关于“国家责任”的追溯，成为一种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替代方案。另外，从伤亡风险来看，私营军事公司作为非政府机构，其行动和伤亡不需要进行公开报道，政府无需承担政治后果。^[1] 因为雇佣私营军事公司造成的人员伤亡不会计入国家官方阵亡统计，统治者也因此避免了因为战争伤亡所遭受的道德谴责，免受因战争伤亡导致的民意反噬和反战情绪，将国家的战争代价“外包”给私营军事公司，这也为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冷战结束后的裁军浪潮以及军费缩减趋势，为各主权国家转向私

[1] 蔺陆洲：《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起源、现状与未来》，《俄罗斯研究》2024年第2期，第169-196页。

营军事公司创造了时代背景。冷战结束后，高度军事化的国家经济与产业布局同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趋势相悖，由巨额军费支撑的大规模军力储备失去现实意义上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裁军与军费缩减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军事战略调整的重要方向，也为私营军事公司的发展创造了历史契机。21 世纪初，各国军队的士兵总数比 1989 年时减少了 700 多万，美国士兵裁减到冷战巅峰时期的 1/3，英国陆军的规模降到 200 年来的最低点。^[1] 在冷战后裁军浪潮的持续冲击下，全球安全格局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与供需错配：一方面，随着大规模裁军和军费缩减，传统军事领域正经历着人才、装备与技术的结构性流失，众多依附于军事化体系运作的机构与企业亦因订单锐减而陷入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冷战后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威胁有所缓解，尤其是大国间的战争退潮，但因恐怖主义、地区冲突、国际维和行动和海外利益保护等催生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需求却呈现显著增长态势。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顺应了当前全球安全格局的供需矛盾，成了弥合主权国家持续扩张的海外利益诉求与日趋紧张的军事投入之间鸿沟的关键载体。

最后，部分发展中国家存在治理能力不足与政府效能弱化等问题，这也是推动私营军事公司崛起的重要因素。在非洲、拉美等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国家机器因财政困难和军事资源匮乏难以有效履行维护安全与秩序的职能，时常面临着地方武装叛乱、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威胁。脆弱、不稳定、崩溃的国家面临着多种威胁，也为恐怖分子、有组织犯罪和其他非法团体提供了安全避难所。^[2] 此类国家的经济命脉往往高度依赖石油、矿产等战略资源开发，但其政府在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矿产开采区及战略运输通道等方面的能力又普遍薄弱，私营军事公司遂成为此类国家用来保护矿产资源开发和培训政府军队等的合作伙伴。在不少非洲国家，如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刚果（金）等，私营军事公司正与政府开展广泛合作。尤其是在效率和效能方面，（军事）私有化成为一种重大进步，其益处与过度集中的政府官僚机构的失败形成鲜

[1] P.W. 辛格：《企业武士：私营军事产业的兴起》，第 75 页。

[2] “Weak and Failing States: Evolving Security Threats and U.S. Policy,” U.S. CONGRESS, August 28, 2008,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L/RL34253/7>.

明对比。^[1] 私营军事公司通过与政府合作，为其提供安保服务、军事支持以及资源保护等，有效弥补了政府的能力缺口。例如，塞拉利昂饱受内战影响，大部分钻石矿厂多次因战争停产，一些被派往保护其生产的政府军队也纷纷叛逃，政府逐步失去对矿产资源的控制权。随后，塞拉利昂政府与南非的EO私营军事公司(Executive Outcomes)合作，建立了互惠互利的商业伙伴关系，有效地维护了当地矿石开采的秩序。^[2]

(三) 私营军事公司自身的组织形态进化

首先，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以市场为导向、资本为驱动的发展模式。私营军事公司的运作逻辑与国家主导的传统政府军事力量存在本质差异：后者以国家为主体、以政治目标为行动导向，而前者则以市场需求为核心驱动力、以经济收益为根本目标。私营军事公司的逐利性本质使其往往能够提供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安全服务方案。后冷战时期，全球安全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大规模国家军事力量逐渐向更加廉价、高效的安全服务需求转型。私营军事公司凭借对市场动态的敏锐捕捉能力和快速响应机制，逐步渗透进原本由国家军队主导的军事安全服务领域。当主权国家面临军费缩减与军事战略调整的双重压力时，私营军事公司通过提供定制化、目标明确且更具市场竞争力的军事与安保服务，满足了国家在多重情形下的军事安全需求。此外，私营军事公司是为了迎合市场而存在的，其服务效率更高，服务领域更广，从单一的战场作战到武装保卫、后勤支持、情报支援及战略咨询等，不断巩固其在国际安全市场中的地位。这种以资本为驱动的发展模式，使其与国家武装力量相比，更加灵活、更有能力、更具性价比，不仅强化了私营军事公司在行动过程中的独立性，也赋予其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战略价值，从而实现自身在全球安全格局中的迅速崛起。

[1] Christopher Kinsey, *Corporate Soldier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Rise of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3.

[2] Marika Josephides, "How Private Military Services Saved Sierra Leone: The Contracting Out of Military Duties Came from Necessity But Help Ensure Long-lasting Security," In *On Africa*, December 1, 2014, <https://www.inonafrica.com/2014/12/01/how-private-military-services-saved-sierra-leone-the-contracting-out-of-military-duties-came-from-necessity-but-help-ensure-long-lasting-security/>.

其次，灵活的作战管理模式与广泛的地缘布局也为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提供了保障。种种现象表明，私营军事公司已具备与国家军队相当，甚至在特定时候优于一些国家军队的作战与管理模式。许多私营军事公司采用模块化运营模式，根据合同要求灵活组建作战小组、安保团队或后勤支持单位，从而在低成本条件下高效率完成任务。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高风险地区中，相较于国家军队普遍存在的编制复杂、决策缓慢、响应滞后和作战规则严格等问题，私营军事公司以其精简高效的管理架构和任务导向的运作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根据需求快速调整资源和部署任务团队，迅速组建任务小组或调整策略，适应复杂多变的冲突环境。

私营军事公司在地缘布局上的广泛分布是其又一特征。非洲、中东和南美等地区常因政治动荡和资源争夺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存在大量安全需求。与之相应，这些地区也分布着大量私营军事公司，它们是获取当地资源控制权、武装保护等军事服务的重要供给单位。私营军事公司凭借其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与广泛的地缘布局，在国家军队难以介入或干预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为这些地区提供安保和军事支持。当前诸多私营军事公司已将自身的服务范围拓展至全球，同时与其他私营军事公司、地方政府、区域势力相互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编织起一张第三方军事服务的商业化合作网络。以瓦格纳集团为例，该组织是一家实体位于俄罗斯境内的私营军事公司，规模巨大，活动网络遍及世界各地，东欧、中东、非洲地区都有该公司的身影。

最后，国际法监管的空白也为私营军事公司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法律环境。私营军事公司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国际社会在私营军事公司运营的法律规制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空白。对私营军事公司可能提供的服务进行国内或国际监管方面的法律，以及它们为了获准经营所必须遵守的行政程序非常有限^[1]，这种身份界定与行为约束的法律空白客观上为私营军事公司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空间。私营军事公司以合法商业实体的形式运作，

[1] Emanuela-Chiara Gillard, "Business Goes to War: Private Military/Security Companie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863, No.88, 2006, pp.525-572.

其雇员不完全符合传统“雇佣兵”的定义，常常游走于现行法律框架的边缘。国际法中虽有部分条款涉及武装冲突中的雇佣兵行为，但此类条款或是对私营军事公司类行为体的定义过于宽泛，或是相关条款过于狭窄，无法适用于私营军事公司现代化、多样化的业务模式。这种法律真空为私营军事公司开展业务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私营军事公司甚至可以直接以“安全咨询”或“风险管理”的名义介入军事冲突和政治事务，而不必受到当地政府或国际社会的过度干涉。宽松的法律环境降低了私营军事公司进入市场的门槛，为其规避法律责任提供了空间，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私营军事公司的发展。

二、私营军事公司崛起的正面效应

当前，私营军事公司正凭借其灵活的管理方式、多样化的服务能力、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以及与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广泛合作，在应对安全威胁中展现出显著优势，已被一些西方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包括联合国）聘用，^[1] 并给全球安全格局带来了直接影响。私营军事公司可以作为赋能国家军事能力与弹性安全供给的角色。

（一）补充国家军事力量，推动国家海外利益保护与延展

全球化时代，国家海外利益呈现多元化、分散化与高风险化的特征，但传统国家军事力量的部署往往受限于国际法约束、外交敏感性以及高昂的运作成本，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保护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私营军事公司能够通过其灵活的部署机制、专业的军事能力、非国家化的身份及商业化的运作模式等，执行高风险区域的武装护卫、战略资产保护、撤侨行动支援等任务，既避免了直接动用国家军队可能引发的外交争议，又确保了国家利益相关人员与资产的安全。例如，2016年南苏丹内战爆发后当地局势混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驻南苏丹员工身处险境，德威安保（DeWe

[1] Oldrich Bures,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A Second Best Peacekeeping Optio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12, No.4, 2005, pp.533-546.

Security) 作为私营军事公司受雇承担了救援任务, 依托当地资源, 最终成功将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1] 另据华信中安集团官网显示, 其提供的海上武装护航于 2012 年 3 月至 2021 年 12 月, 为中外船舶提供了 7600 多次护航服务, 护卫和培训船员约 17 万人次, 期间共驱离海盗骚扰 190 余次, 开枪击退海盗袭击 120 余次。^[2] 此外, 私营军事公司还可作为国家军事力量的“前哨”, 以商业合作形式进入敏感地区, 为后续国家力量的介入积累行动经验。总之, 私营军事公司的存在与活动是对传统国家军事力量的有力补充, 可以形成优势互补与战略协同, 在保护国家战略利益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 提升军队运作效率, 助推军用科技创新

私营军事公司作为军事领域的专业化服务提供者, 直接面向市场的特性使其具备更加高效的运营模式与技术创新应用能力。一方面, 私营军事公司通过与政府军队合作, 凭借其高度灵活的组织结构、专业化的人员配置与市场化的运作机制, 承接军队部分非核心但至关重要的功能, 如后勤保障、装备维修、情报支援等任务, 能够为军队提供精准高效的辅助支持。这有助于提升军队运转效率, 优化传统政府军事力量的职能, 使其更加集中精力于核心战斗力建设, 也能够通过其市场特性加速政府军队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以后勤服务为例, 后勤服务是军队运转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但传统军队后勤模式成本高昂且响应速度缓慢, 私营军事公司介入后, 凭借其市场化运作机制推动军队后勤服务朝低成本和高效率的方向转变。在伊拉克战争中, 美国国防部将大量的军事服务外包给黑水国际、阿卡德米等私营军事公司, 利用它们在后勤保障、人员保护、街道巡逻、翻译、情报获取与分析等领域的专业化水平, 辅助美军提升作战效率, 同时降低战争的人力成本。^[3] 另一方面, 私营军事公司的存在本身及其积极参与全球军事市场的竞争, 也在一定程度

[1] Charles Clover, “Chinese Private Security Companies Go Global,” February 26,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2a1ce1c8-fa7c-11e6-9516-2d969e0d3b65>.

[2] 《海上武装护航》, 华信中安集团, <https://www.hxza.com/cmscontent/540.html>.

[3] 文少彪、王佳霖:《美国中东代理人战争的复合化趋势》,《国际展望》2023 年第 5 期, 第 118-139 页。

上对传统政府主导的军事力量运作效率提出了挑战，市场竞争的结果将使传统政府军事力量不得不考虑如何进一步提升效率以增强自身竞争力。

同时，私营军事公司在推动军事技术创新应用方面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私营军事公司的存在依赖于其任务完成能力，而这离不开现代化军用技术创新及其应用。作为直接面向全球军事市场的非政府实体，私营军事公司在市场竞争机制与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有着强烈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动力。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开始后，私营军事公司正在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网络空间等前沿科技领域，能够提供从无人机作业到网络防御等尖端服务，而且开发出适应现代战争形态的新型装备与方案，使其在未来的军事战略中重要性日益提升。^[1] 例如，黑水国际等私营军事公司部署无人机在冲突地区收集情报，显著提高了态势感知能力；G4S 使用配备先进通信系统和监控技术的装甲车在高风险环境中保护人员和资产。^[2] 2025 年 3 月，美国私营军事公司 Erik Prince 协助海地政府部署由简易炸药改装的商业无人机开展打击犯罪活动，造成 300 名帮派成员死亡。^[3] 私营军事公司的技术创新应用能力不仅增强了自身在全球军事市场的竞争力，而且通过参与竞争启发了传统政府主导的军事力量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加速军事现代化进程。

（三）为主权国家以外的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提供安全保障力量

私营军事公司不仅为国家提供服务，也为包括跨国公司、全球和区域性政府间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在内的其他行为体提供服务，通常是在存在武装冲突的地区^[4]。目前，私营军事公司已经为联合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1] Muhammad Hamdan, "The Shadow Army: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and Their Impact on Modern Defense Policy," October 21, 2024,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4/10/21/the-shadow-army-private-military-companies-and-their-impact-on-modern-defense-policy/>.

[2] Total Military Insight, "Navigating PMCs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Trends and Impacts," 2024, <https://totalmilitaryinsight.com/pmcs-in-the-age-of-technology/>.

[3] Demian Bio, "Haitian Forces Reportedly Killing Hundreds of Gang Members With Drones," The Latin Times, June 26, 2025, <https://www.latinimes.com/haitian-forces-reportedly-killing-hundreds-gang-members-drones-585658>.

[4] Emanuela-Chiara Gillard, "Business Goes to War: Private Military/Security Companie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pp.525-572.

等国际组织在高风险地区执行任务提供了必要的安全保障。以联合国为例，2014年5月，联合国通过《第2155号决议》，安理会决定南苏丹特派团除由12300名维和官兵以及1323名警察组成外，还将部分安保工作外包给一家注册地在南非的私营安保公司。^[1] 联合国工作人员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联合国在诸多任务中使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包括守卫办公场所和保护车队、进行风险评估、安保训练、物流支持和排雷任务等。^[2]

除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跨国公司也是私营军事公司崛起的受益者。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为获取稀缺战略资产与开拓新兴市场，而不得不冒险深入政治环境动荡、安全局势脆弱的地区开展业务，因为非洲、拉美等地区蕴藏大量钻石、黄金、关键矿产、石油等资源。不过这些地区因民族宗教矛盾、治理能力不足等时常处于冲突之中，难以向外国投资者提供可靠的安全保护，私营军事公司的存在恰好能够为此类跨国企业应对冲突风险保驾护航。^[3] 例如，由于寻求政府军队提供安全保障的流程较为繁琐，且可能承担一定国际舆论压力，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在1992年同英国私营军事公司“防卫科学实验室”（Defense Science Laboratory）签署合同，委托后者在哥伦比亚部署军事雇员，保护英国石油公司在当地的石油设施和人员安全。^[4]

三、私营军事公司崛起带来的挑战

私营军事公司在全球安全格局中的崛起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影响的反

[1] 刘波：《“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构建中的私营安保公司研究》，《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5期，第132页。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女士在利用雇佣军问题工作组组织的联合国使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问题小组讨论上的开幕致辞》，联合国网站，2014年3月5日，<https://www.ohchr.org/zh/statements/2014/03/opening-remarks-ms-navi-pillay-united-nations-high-commissioner-human-rights>。

[3] 何浩：《冷战后私营军事公司的兴起及其影响》，《国际研究参考》2017年第2期，第21-25页。

[4] 王晋、唐继安：《俄罗斯“混合战争”中的私营安保公司》，《俄罗斯学刊》2023年第3期，第64-80页。

思和批判。作为对全球安全需求日益扩张和国家军事能力局限性的市场化响应，私营军事公司既为全球安全治理带来新的可能性，也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法律监管的薄弱性，给国际和平与安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尤其是其暗含的武力市场化趋势给国际体系带来深层危机。

（一）安全供给的私营化对全球安全格局造成范式性冲击

私营军事公司在本质上是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公共产品私有化的产物。伴随着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与扩张，安全正在经历逐渐被商品化的过程，它不再被视为完全由国家垄断提供，而是可以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在这个市场中，国家只是许多潜在的供应商之一，且不一定是最有效和最可靠的供应商。^[1]私营军事公司逐步将安全这一公共物品资本化、私有化，并以市场化机制解构传统国家军事垄断，打造安全服务的供给市场。这种安全外包化趋势改变了国家间军事合作的逻辑，对全球安全格局形成了范式性冲击。

一方面，安全承诺的可逆性动摇了传统联盟体系的稳定性。主权国家在长期的交往中往往倾向于依托协议构建联盟体系以获取安全。在私营军事公司成为主权国家可选方案的背景下，构建或加入传统联盟体系这一高成本、低自由的方式不再是获取安全的唯一路径，与之相比，私营军事公司能够以更灵活、低成本的方式提供“定制化安全服务”。这种以市场机制而非国家间信任驱动的安全竞争使得联盟内的国家间承诺成为可随时撤销的商品，单个国家通过私营军事公司获取安全的同时亦削弱了国家间安全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私营军事公司的商业模式对国家安全的介入，打破了传统国家安全作为“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逻辑，重塑了国家、公民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和责任分配，促使其朝向“市场逻辑”转变。私营军事公司作为私营企业，其运作模式符合奥尔森强调的“小集团优势”：私营军事公司通过合同明确责任与报酬，规避了大集团的协调难题；通过市场化手段吸引精英人才，以选择性激励打造高效行动小组。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从“公共物品”向“私

[1] Rita Abrahamsen and Michael C. Williams, "Security Privatization and Global Security Assemblages,"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18, No.1, 2011, pp.173-174.

有化服务”转变，全球安全供给体系将不可逆转地滑向一种高度资本化的模式——安全资源的分配不再取决于国际道义或战略必要性，而是纯粹遵循资本回报率原则。

（二）暴力的伦理枷锁将被资本的逻辑打破并带来国际体系危机

私营军事公司作为一种“战争工具”，正在重构现代冲突的底层逻辑，推动战争形态向“混合性”与“模糊性”的范式跃迁。这一进程的本质是主权国家通过市场化手段将暴力实施权从政府军队体系中剥离，形成“模糊性介入”的战略优势。私营军事公司与主权国家的合作通过商业合同展开，但这种雇佣合同往往经过多层转包。例如，某私营军事公司于A国注册，商业合同由位于B国的中介公司承接并使用国籍为C国的士兵在D国开展军事行动。私营军事公司这种跨国式的合同承接方式极易引起责任链断裂，导致相关法律无法追溯责任主体。这一现象使得《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条约或法规中的“指挥官责任”^[1]等基础性定义由于主体难以判断、过程难以追溯等困境而失去实践基础，降低了国家发动军事行动的政治风险。因此，私营军事公司的运作模式为其雇主国在军事冲突中创造了一种新型“灰色地带”——冲突的发起者、实施者与责任者被精心设计的法人结构分离，传统国际法中的国家责任等概念陷入解释困境。

私营军事公司在法律条文中的模糊性加之其逐利本质，正在对传统战争伦理框架构成结构性冲击，其引发的道德困境动摇着人类数百年构建的战争文明规范。首先是正义战争理论的权威性瓦解。该理论认为：合法或胜任的权威、正义的起因、正当的意图、意图的宣告、最后手段、成功的合理希望共同构成了“开战正义”，^[2]但私营军事公司的运作机制彻底颠覆了这一逻

[1] 指挥官责任（command responsibility）是国际法中的一项法理原则，即允许对下属实施的战争罪行追究军事指挥官的责任。这意味着指挥官在某种程度上应对其下属的行为负责，且有明确的责任在其权力范围内采取适当措施，以保护战俘和平民居民免受违反战争法行为的侵害。参见“Command Responsibility,” Cornell Law School,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command_responsibility.

[2] James F. Childress, “Just-war Theories: The Bases, Interrelations, Priorities, and Functions of Their Criteria,” *Theological Studies*, Vol.39, No.3, 1978, pp.427-445.

辑。从本质上看，私营军事公司开展的军事行动是由资本增殖需求驱动的暴力行为，无关正义战争理论强调的“开战正义”。资本化与市场化的成熟发展使得对战争正义性的评估被资本回报率等指标挤压，传统军事伦理学的正当性框架在私营军事公司的逐利性面前基本无效。其次是不对称武力的使用。私营军事公司通过技术创新与成本控制，其发起军事行动中使用武力的成本远低于政府官方，且无需遵守军方复杂的交战规则审查程序，进而在其选择行动模式中倾向于以效率而非手段—目标相称性作为首要考量指标。例如，2007 年，美国黑水公司雇佣的 4 名保安在巴格达纳苏尔广场射杀平民，造成 14 名手无寸铁的平民死亡，至少 17 人受伤。^[1] 该事件凸显了私营军事公司不惜滥用暴力以确保任务效率的核心运营原则，其对暴力的使用已经超出了实现目标所需的必要限度，这背后正是资本效率逻辑对军事手段必要性的僭越。最后是战士身份的伦理异化。传统意义上战斗人员的身份建立在国家义务与荣誉准则基础上，而私营军事公司雇佣兵的“契约战士”身份解构了这一伦理根基。这种将暴力行为商品化的激励机制把战士的身份义务与道德责任简化为劳动合同中的绩效条款，势必催生出扭曲的战场行为模式。可以预见，资本因素注入战争所引起的战争伦理失效将导致连锁反应，如果战争彻底沦为明码标价的金融衍生品，人类数千年来试图为暴力套上的伦理枷锁将被彻底碾碎。

（三）国家的暴力垄断权被解构引发国家权威的“空心化”

私营军事公司对国家军事能力的渗透甚至替代，可能引发国家权威的“空心化”进程。质言之，私营军事公司使国家暴力垄断权面临被市场异化的风险。首先，军事职能外包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国家将军事情报、后勤保障等核心职能外包给私营军事公司后，短期内降低了其组织成本，但同时也导致了国家军事能力的去权威化。情报分析、战术通信等知识密集型职能被私营军事公司承包的同时，军队内部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部分自主性。外包规模越大，

[1] 《世界周刊 | 揭秘美国私人军事公司》，光明网，2024 年 8 月 26 日，https://world.gmw.cn/2024-08/26/content_37523086.htm。

重建内部能力的边际成本越高,最终可能形成“没有私营军事公司就无法作战”的外部依赖困境。其次,忠诚度稀释效应对国家主权的权威性构成威胁。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的存在,在于被支配者必须顺从支配者声称具有的权威”^[1],即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建立在“权威一服从”的垂直契约基础上。然而,私营军事公司引入的平行权力结构使其士兵陷入了一种效忠困境:国家军事力量越是依赖外部资本维持,其权威的正当性越是遭受质疑,最终加剧“金主与祖国究竟应该效忠于谁”的疑问,导致“主权保卫者”沦为“资本雇佣军”的身份颠覆。最后,一次性的作战合同可能导致战略文化断层,形成军事知识传承的系统性危机。作战经验的代际传递依赖于军队编制的相对稳定性,但私营军事公司以临时的外包军事行动替代军队长期稳定的训练体系,失去在真实冲突中检验与修正战略文化的实践场域,不仅弱化了战术创新能力,更导致军队对战争中突发情况应对能力的退化。

毫无疑问,私营军事公司对军队功能的部分取代使得资本渐进解构主权要素,侵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主权是一种以国家为范围的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权力。^[2]但在私营军事公司的运作过程中,国家领土等主权象征物被切割为由资本介入甚至被资本控制的模块,传统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被不断瓦解。此外,私营军事公司以私营暴力资本控制弱政府国家的矿产运输通道等资源,继而收买官僚体系、渗透立法机构,最终甚至可能完成从安全承包商到平行政府的质变。这种“反向国家化”的进程表明,暴力垄断权被市场化分解后,国家不再是战争的产物,反而成为战争的客体,进而导致主权国家的自主性面临系统性危机。进而,多层次、重叠的权威结构将取代单一国家主权,使全球秩序进入“后威斯特伐利亚”混沌期。

[1]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2] 王沪宁:《国家主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四、私营军事公司的发展前景

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折射出后冷战时代暴力垄断权从主权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的让渡，标志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遭遇资本全球化与安全私有化的双重解构。作为兼具军事效能与市场理性的新型安全供给者，私营军事公司将暴力转化为可供交易的商品，引发了对主权国家与跨国资本在军事领域的权力再平衡的广泛关注。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深嵌于以下逻辑中：安全公共品私有化引发的治理悖论，军事行动市场化导向对传统战略文化的侵蚀，以及暴力商品化对国家主体性假设的根本质疑。展望未来，私营军事公司将作为一支独立的变量继续影响全球安全生态与军事权力流变。

（一）私营军事公司成为全球安全格局中的刚性需求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 2024 年年鉴指出：“（全球和平行动）冲突管理中日益增多地使用私人军事和安保公司，以及采取临时性或双边行动，作为多边和平行动的替代方案，表明冲突管理正趋于碎片化；近年来，武装冲突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私人军事和安保公司的全球快速增长。”^[1] 未来，助推私营军事公司继续扩张的动力将持续存在。首先，在国家层面，弱政府国家的战略能力建设需求将长期存在。非洲、拉美等部分国家政府的社会控制力弱，且国家军队基础差、建设周期长，通过与私营军事公司合作以自然资源、货币等换取军事服务的合同式合作仍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作为此类国家获得“安全”公共物品的重要渠道存在。其次，在非国家行为体层面，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维和行动等需要武装力量的国际行动中依然面临制度性困境，相关行动囿于其身份界定、意识形态、国际法规等诸多限制，往往难以取得实际成效，私营军事公司以经济收益为目的的运作模式等特性能够巧妙规避这些限制，以低风险、小成本、高效率的形式服务于非国家行为体。再次，在战争形式层面，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迭起，技术革命正在推

[1] “SIPRI Yearbook 2024,” SIPRI, June 17, 2024, <https://www.sipri.org/yearbook/2024>.

动军事专业化分工，私营军事公司顺应了军事专业化的发展趋势。美国《2022年国防战略报告》指出将进一步加强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以利用其技术优势和创新精神。^[1] 私营军事公司正在利用这一机遇，将自身嵌入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的系统之中，成为国家安全治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技术模块，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发挥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最后，在全球安全格局层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地缘政治回归的暗流涌动之间的结构性裂隙不会在短期内消解，以主权国家为发起者的武装行为将面临对外形象受损、国家信誉下滑、国际制度制裁等风险，但国家海外利益的不断延伸与历史性冲突的持续存在决定了全球安全格局中难以出现完全意义上的和平，私营军事公司将凭借其组织与活动模式巧妙成为国家间战争与国际法规的“飞地”，成为地缘冲突中的代理人角色。

（二）新一轮科技革命重构私营军事公司竞争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在以前所未有的磅礴之力重塑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对私营军事公司的竞争力结构进行重构，其影响将层层扩散，深度渗透至全球安全格局的结构和框架之中。从新技术的发展态势看，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自主系统、大数据和网络技术的私营军事公司有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获得更强竞争力。人工智能、无人机、大数据等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驱动力，相较于洲际导弹、飞机发动机等被国家军事力量垄断的尖端技术，更容易被私营军事公司在内的各行为体获得并使用，并直接影响着私营军事公司作战能力的智能化与决策效能的精准化。这些技术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至私营军事公司的同时，亦重塑了传统的军事能力体系架构，以往国家军事力量相较于私营军事公司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被新一轮科技革命削弱，使得私营军事公司有望从单一的战斗人员供给商转变为更优安全方案的供给者。然而，这一趋势也伴随着严峻挑战，包括自主杀伤性武器的伦理与法律困境、先进军事技术扩散对全球战略稳定的潜在冲击，进而

[1]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27, 2022,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Oct/27/2003103845/-1/-1/1/2022-NATIONAL-DEFENSE-STRATEGY-NPR-MDR.PDF>.

催生对私营军事公司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进行更严格监管的迫切需求。

（三）资本逻辑对国家产生反噬并引发对私营军事公司的警惕

私营军事公司的资本化运作模式在提升其相较于军队的竞争力的同时，其商业中立性也可能对雇主国形成反噬，将忠诚于祖国的军事伦理演变为道德相对主义的温床，孕育着动摇其存在根基的风险。

一方面，私营军事公司雇员对商业契约的忠诚与雇主国国家安全之间形成结构性矛盾。当前，至少有 90 家私营军事公司在全球 110 个国家 / 地区开展业务，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总部位于美国、英国和南非，绝大部分服务向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的冲突国家提供。^[1] 此类私营军事公司在承接国家军事合同的同时，也掌握了雇主国的战术数据、作战模式与情报资源等信息。未来，伴随着私营军事公司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及其竞争的激烈化，其逐利本性可能导致相关信息形成“安全黑市”，以信息换利润的商业策略一旦运转，将构成对国家主权的进一步僭越。商业化运作模式下的私营军事公司缺少对雇主除资本之外的忠诚，在为了利润向雇主提供安全服务的同时，亦有可能为了利润而出卖雇主，为全球安全治理带来隐患。

另一方面，部分私营军事公司失控滋生主权侵蚀、社会动乱等问题，导致政治风险积累，影响其合法性与吸引力。例如，瓦格纳集团通过与俄罗斯政府的合作获得认可，并被视为合法行为者，俄罗斯政府一度尝试将瓦格纳集团纳入官方安全结构。^[2] 然而，瓦格纳集团创始者、领导人普里戈津与俄罗斯国防部长期不合，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多次谴责俄罗斯国防部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无能。^[3] 瓦格纳集团与俄罗斯国防部的权力斗争、普里戈津的个人野心及其对俄罗斯政府政策不满，导致该私营军事公司与政府间的矛盾逐渐放

[1] Laura Peterson, "Privatizing Combat, The New World Order."

[2] Karen Philippa Larse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agner Group," DIIS, January 9, 2025, <https://www.diis.dk/en/research/the-rise-and-fall-of-the-wagner-group>.

[3] Phil Helsel, "What is the Wagner Group? A Look at the Mercenary Group Led by Man Accused of 'Armed Mutiny' in Russia," NBC News, June 24, 2023,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what-is-the-wagner-group-rcna90923>.

大。2023年6月，普里戈津发起一场名为“正义游行”的行动，命令其雇员从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前往莫斯科郊区。^[1] 此次事件在严重危害俄罗斯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引发了国家行为体对私营军事公司的恐慌：私营军事公司所提供的军事服务并不是简单的商品与资本间的互换关系，作为具有独立军事行动能力的国际社会行为体，私营军事公司野心的扩张也有可能对国家政权稳定性构成严峻威胁。

（四）针对私营军事公司的规范建构与制度约束将陆续开展

在全球安全格局的演进过程中，私营军事公司的作用日益凸显，其发展走向也愈发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全球安全形势的复杂化以及各国安全需求的多样化，私营军事公司将逐步走出以往的“灰色地带”，迎来规范建构与制度约束的新阶段。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形成针对私营军事安保行业的国际治理体系雏形，它以西方牵头的软法性文件为主要形式，以提升国家层面的监管和规制水平为目的和依托，目前暂以行业性的规范和自律为主要手段。^[2] 以俄罗斯为例，出于政府意愿和现实需求，俄罗斯从2014年起逐步注重对私营军事公司的立法管制，目前通过对国内法的修补，采取行政许可的方式，逐步确立私营军事公司的合法地位。^[3] 在此进程中，瓦格纳集团的法律地位得到了俄罗斯官方的承认，从秘密运行转为公开活动，瓦格纳集团注册了实体法人公司并在圣彼得堡设立了总部，在极右翼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成为俄罗斯的重要政治力量。^[4] 私营军事公司的地位合法化进程呈现显著的“实践先于规范”特征，其在现实行动中对制度的突破不断涌现，相关制度

[1] Jack Watling, “Wagner’s March on Moscow Left Unresolved Challenges in Its Wake,” RUSI, June 26, 2023, <https://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wagners-march-moscow-left-unresolved-challenges-its-wake>.

[2] 李廷康：《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国际法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75页。

[3] 白峻楠、孟含笑：《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行业法律体系》，《国际研究参考》2021年第3期，第29-36页。

[4] 蔺陆洲：《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起源、现状与未来》，第169-196页。

伴随着私营军事公司在全球安全格局中的具体行动而不断完善。

可以预见，未来伴随着私营军事公司活动范围、领域的逐步扩展，有关私营军事公司的法律文本也将快速涌现。一方面，从身份界定来看，明确私营军事公司的性质与范畴已成为当务之急。长久以来，私营军事公司游离于传统军事力量与商业组织之间，其身份的模糊性既为其带来了灵活运作的空间，也为其与主权国家的合作以及国际法规的规制带来了诸多障碍。通过立法与国际协议等形式对私营军事公司的身份进行精准界定已迫在眉睫，明确其作为特殊军事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不仅有助于维护当下作为联合国宪章根本的国家主权的排他性，也能为国际社会建立更具针对性的监管框架提供基础依据，确保其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参与更加有序、透明，降低其成为“法外实体”或地缘政治博弈工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行为规范方面，国际法层面的约束也必将加强。由于大部分私营军事公司在海外开展军事行动，其活动范围往往跨越多个司法管辖区，其行动的跨国性特征对现有国际法规则提出了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一套具有广泛共识和约束性的行为准则，以涵盖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作战手段与方法的相称性、对平民及战俘的人道主义保护标准等维度，以规制私营军事公司参与国际安全事务。针对私营军事公司的国际法约束，既是对其全球安全市场合法参与者的角色承认，也是推动私营军事公司从“影子力量”向“合法参与者”转型的关键。

五、结语

从乌克兰危机中的战斗支援到非洲地区的维和行动，私营军事公司正凭借其灵活性、专业性与市场化的运作模式，逐渐深嵌于国家战略与国际安全体系的缝隙之中，崛起成为全球安全格局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给全球安全格局带来双重效应。从正面来看，通过提供精准的安保服务、高效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及技术驱动的作战模式，私营军事公司

可以作为补充国家军事力量、推动国家海外利益保护与延展的替代性力量；能够为主权国家以外的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提供安全保障力量；也有助于提升军队运转效率，助推军用科技创新。然而，私营军事公司的存在和崛起也给全球安全格局带来了范式性冲击：解构传统国家的军事垄断，消融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形成的国家主体性权威。更值得警惕的是，私营军事公司可能成为大国地缘政治扩张的工具——通过间接介入他国内政或冲突，既规避了国际舆论压力，又实现了战略扩张，最终导致主权概念的弱化与冲突的代理人化。

展望未来，私营军事公司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与安全治理体系的变革紧密交织。如何在国际法与现行主权框架下赋予私营军事公司以活动空间，并平衡其商业利益与伦理责任，已成为当下全球安全治理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治理倡议为规范和引导私营军事公司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前者所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有助于超越私营军事公司由资本驱动的行为逻辑，为构建一个包容、有效的监管框架奠定伦理基础，助推其作为国际社会多元行为体之一服务于全球安全治理大局；后者强调的“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多边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力求实效”的核心理念，则指向了以主权为红线，通过加强国际多边合作与对话，共同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与标准，以主权、国际法治、多边主义等为原则和规范框架，推动私营军事公司的治理真正释放全球安全治理效能。

【责任编辑：宁团辉】

Abstracts

The Global South Spirit and China's Practices

WU Zhicheng & LIU Peidong

The Global South Spirit embodies the shared values and common aspirations of Global South countries and serves as a guiding force for their pursuit of modernization. As momentous changes of a like not seen in a century are accelerating across the world and the collectiv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is gaining momentum, it is both imperative and realistic to crystallize the Global South Spirit. Practicing the spirit is essential to strengthening cohesion and agency of the Global South, making international order fairer and more equitable, addressing emerging risks and challenges worldwide, and acceler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lobal South countrie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South Spirit have been propelled by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seeking strength through unity,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the Global South's collective rise, the legacy of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and the empowering impact of China's development. It encompasses core principles such as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equality and mutual respect,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fairness and justice,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and win-win cooperation. Essentially, it represents a normative force that draws upon shared historical memory, has its root in collective empowerment, and is directed toward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As an inherent member of the Global South,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steadfast practitioner and key contributor to the spirit. Guided by the vision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China is committed to advancing a modernization path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fostering consensus and synergy among Global South countries, strengthening the bonds of shared interests, enhancing the Global South's voice and representation, building multilateral platforms

for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reinforcing the civilizational foundation for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of Global South countries. Through these efforts, China contributes its wisdom and strength to the practice of the Global South Spirit.

Asian Security Model: Civilization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LIU Qing

The Asian security model, characterized by common security for all,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and advancing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has its root in Asia's diverse yet symbiotic civilizations. It embodies the shared pursuit of common security among Asian nations and continues to be refined and elevated through practical security efforts in the region.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distinction, the model surpasses the exclusive Western alliance system with its vision of common security for all, replaces the Western demand for homogeneity with its inclusive approach of seeking consensus despite differences, and transcends the logic of power politics with its practical rationality of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thereby establishing a security governance paradigm with Asian characteristics. The Asian security model not only offers an "Eastern solution" to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but also overcomes the cognitive limitations of zero-sum thinking and represents a paradigmatic leap beyond Western-centric security theories. This is reflected in its dialectical unity of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t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grounded in civilizational inclusiveness, and its value reconstruction oriented towar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ing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globally, this security model—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sian civilizations and responding to Asian needs—will inject powerful intellectual momentum into the joint international effort to address security challenges. As Asian nations deepen their security cooperation,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Asian security model will be further enriched and refined. This will contribute to building a fairer and more equit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foster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Order in the Middle East: Dynamics and Impacts

NIU Xinchun

The Middle East is witnessing the emergence of a new regional order shaped by multiple dynamics. On the one hand, a wave of diplomatic reconcili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among certain states is reshaping regional interactions; on the other, long-standing issues, such as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and the Israeli–Iranian rivalry, remain unresolved. The disruptive effect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Middle East policy have further accelerated the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is new order, Iran’s influence has diminished due to setbacks in regional conflicts, prompting its shift to a defensive and retrenchment-oriented posture. Israel, emboldened by its gains from military adventurism, has grown more ambitious and adopts an expansionist policy. Turkey has benefited from the regime change in Syria and pursues a cautious expansionary approach. Meanwhile, Saudi Arabia, leveraging its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relatively balanced diplomacy, has enhanced its regional influence through a stable yet incrementally proactive foreign policy. Historically, power shift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often accompanied by turbulence; the region is once again at a crossroads between peace and development on one side and war and conflict on the other.

The Upgrading of India’s Connectivity Policy: Progress, Motivations and Prospects

WU Lin

In recent years, connectivity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central pillar of India’s regional strategy. India has integrated and upgraded sub-regional frameworks, while making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several key areas. These include energy connectivity within the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 developing hub ports and maritime corridors in the Indian Ocean, forging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nnectivity partnerships, and expanding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overseas. India’s connectivity upgrade largely

stems from its own developmental logic and endogenous imperatives. The Modi government has been promoting Hindu nationalism domestically and pursuing an assertive “Bharat First” stance internationally, which is complemented by a long-term vision to transform the country into “Viksit Bharat” (developed India) by the centenary of its independence in 2047. Connectivity is therefore endowed with a multifaceted strategic mandate: to propel the overseas expansion of Indian capital, rejuvenate the India’s maritime identity, safeguar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nd supply chains, and facilitate nation-building while shaping a favorable regional landscape for integration. Although India’s capacity and willingness to develop connectivity are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efforts is hampered by insufficient strategic capabilities, a restrictive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mplexities of major-power competition. Looking ahead, India is poised to elevate the geostrategic role of connectivity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networks in its neighborhood. In response, China must not only adeptly manage associated risks but also create conditions for “co-progressive” development in the two nations’ shared neighborhood.

The Global Landscape of Deep-Sea Competition: Trends, Impacts, and Governance

LI Xuewei & YU Zongyao

In recent years, the deep sea has become a new focal point of global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current global deep-sea competition features the securitization of related issu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deep-sea space, increasingly complex geopolitical alignments, and a notable lack of regulatory frameworks. These developments stem from a mismatch between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ongoing disputes over international maritime norms, and intensified geopolitical rivalries among major powers in the deep sea. Securitization has heightened the risks of deep-sea exploitation, militarization has escalated an arms race in deep-sea regions, and major-power rivalries have disrupted governance efforts, while the absence of

clear rules has led to disorderly competition.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se emerging challeng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build broad consensus on deep-sea governance, establish robust mechanisms and frameworks for cooperation, advance rules-making processes, and enhance the capabilities and discourse power of Global South countries in deep-sea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The Rise of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and Their Impacts on Global Security

WANG Gaoyang & LIU Ciyuan

From the Iraq War to the ongoing conflict in Ukraine,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PMCs) have played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in geopolitical confrontations. With their activities encompassing a wide range of functions including armed security, battlefield intelligence, military training, and arms provision, they have become consequential actors in contemporary security affairs. By supplementing the traditional armed forces of sovereign states, PMCs have reshaped the logic of warfare and security. Their capacity to deliver tailored protection, integrate resources efficiently, and employ technologically-driven modes of combat has created new avenues for addressing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nd “gray zone” conflicts. Ye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military services also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state monopoly on the use of force, while the pursuit of profit often blurs the legitimacy of war initiation. Moreover, the dominance of capital undermines the authority of states as primary security actors, producing a paradigmatic shock to the global security order. Looking ahead, while demand for PMCs in the global security market is likely to persist, there will be gradual efforts to establish regulatory frameworks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Nonetheless, risks of PMCs turning against their client states remain, and their competitive edge may ultimately be reshaped by the next wave of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